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8

1 9 7 6

上海人民出版社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一九七六年第八期(总第二十期)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上海陕西北路186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625 字数 105,000

1976年8月第1版 197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0.3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 关于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问题 •

透过社会生活看苏联法西斯专政的实质

- 上海汽车电机厂工人理论组 (1)
- 俄国人.....〔美〕赫·史密斯 (4)
- 一、人们和生活..... (4)
- 二、特权阶层..... (11)
- 三、市场 = 彩票..... (18)
- 四、腐败、贿赂、盗窃和黑市的来龙去脉..... (25)
- 五、今朝有酒今朝醉..... (31)
- 六、俄国妇女仍是二等人..... (36)
- 七、嬉皮士和麻醉品..... (40)

• 苏联农村面面观 •

- 暗无天日的苏联农村.....干 城 (43)
- 农村需要法学家.....〔苏〕B·格列博夫等 (48)
- 引起纠纷的苹果.....〔苏〕B·科瓦列夫斯基 (52)
- 厄尔布鲁士山下的烤羊肉.....〔苏〕M·拉赫诺 (60)

- 井旁……………〔苏〕Д·诺沃普梁斯基（64）
- 外高加索的土地资源……………〔苏〕И·霍赫洛夫等（68）
- 无论做什么都行……………〔苏〕О·佩特罗娃（72）
- 六号售货亭……………〔苏〕И·杰孟季叶娃（75）
- 哑场……………〔苏〕С·鲁坚科（81）
- 大理石的窝棚……………〔苏〕Г·列巴尼泽（86）
- 苏联的政治“精神病”……………〔日〕菊地昌典（90）
- 美国黑人的希望更少了,恐惧更多了
……………〔英〕莫里斯·欧文（94）

阿纳姆大桥……………〔美〕科尼利厄斯·瑞安（98）

资料 美国财团和对苏政策……………谷陵（132）

外国史学家简介 希罗多德……………（139）

关于资本主义在
苏联复辟问题

透过社会生活看 苏联法西斯专政的实质

上海汽车电机厂工人理论组

美国《纽约时报》驻苏记者赫·史密斯写了一本叫做《俄国人》的书。书中记述的，都是苏联人的日常社会生活。尽管作者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但是，从文章所触及的苏联人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大权在握，拚命吸工农的血，过着花天酒地、穷奢极侈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广大工农群众遭受无穷的压迫和剥削，陷入痛苦的深渊。作者说，《俄国人》不涉及俄国政治。这不是政治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俄国人》的作者当然不会掌握这个科学的分析方法，他虽然罗列了一大堆今日苏联社会生活的现象，但作不出科学的解释。本来，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出现一些资本主义现象，出现党内资产阶级，都是必然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本主义现象要受到批判，党内资产阶级要

被打倒，这也是必然的。但是，在苏联显然不是如此。为什么苏联的特权阶级可以横行霸道，吸工农的血而不受惩罚？为什么苏联经济生活中如此长期、普遍地连厨房用锅、调羹这一类“最基本的物品都没有”？为什么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泛滥成灾？为什么“你只靠工资吃饭”在苏联成了一句羞辱人的话？为什么吸毒、酗酒、牛仔褲、超短裙如此众多？为什么“波卡茹卡”（弄虚作假）成了人们处世的准则？……透过所有这些现象，人们不难看出，苏联今天已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天下，已成了各族人民的监狱。这同无产阶级专政下出现的一些资本主义现象必然受到批判、出现的党内资产阶级必然受到斗争，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根本的区别就是，苏联已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辟了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

在苏联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从这个社会产生的某些社会现象如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由于它不利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是要反一下的。苏联不是也成立了什么“反贪污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办公室”吗？这不过是玩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把戏，即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也。“贪污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的头目是谁？就是新沙皇，就是以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把这个反革命的阶级打倒，苏联人民就不会有出头之日。

苏修叛徒集团是当代最大的反面教员。从这个反面教员的身上，人们可以得到很大的教益。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因此，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持续进行批判，不断加以限制，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

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否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泛滥成灾。特别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官们，他们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党内资产阶级，是危害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如果放松了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认识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本质，不懂得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根源和战胜它们的方法，资本主义就有可能复辟。抓住了党内资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战胜党内资产阶级，从而就能够彻底战胜整个资产阶级。这样，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永远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前进！

俄 国 人

〔美〕赫·史密斯^①

一、人们和生活

和外国人会见的场合

任何不同的社会都想掩饰它的问题，也都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来对外宾施加影响。然而苏联社会，由于它那典型的信念，特别自命不凡。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简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没有什么能比俄国人这个戏剧性的行动更能证明我所说的话了。一九七二年夏天，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对苏联进行的那次著名的访问之前，俄国人导演了这出戏。他们企图以改变莫斯科的市容来博取来宾的好感。

这一年夏天，大批破烂陈旧的建筑物被拆掉了。几百名居民搬到了别处，许多街道也重新进行修建，整幢整幢的大楼油漆一新。就在尼克松到达莫斯科的那天晚上，没有树的地方出现了树，原来的空地也种上了树，并摆上了花盆。就连我们居住的楼房，虽然远离克里姆林宫，但唯恐尼克松的车队可能经过，因而它的外表也被装饰一新。

象现在这样的搞法，远可追溯到沙皇时代。当时俄国人把它叫作“波将金”。“波将金”是一位俄国皇太子的名字，他曾在

^① 作者曾任美国《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三年。——译者

当时叶卡德琳娜女皇的车队沿途经过的地方，建造了许多假的庄园，妄图以他管辖地区的繁荣和兴旺来博得女皇的欢心。至于今天，俄国人则把这种行为叫作“波卡茹卡”，意思就是弄虚作假，装潢门面。

没有菜的菜单

“波卡茹卡”在苏联是包罗万象的。从硬通货商店到陈列在著名的国营百货商店橱窗里昂贵的进口货（这些商品通常在店里是买不到的），从经常安排外宾去参观的典型农庄和工厂，到很小的事情，都是如此。就拿你在旅馆中看到的厚厚的一本菜单来说吧，这些印在白道林纸上的菜单，用四种语言写着几十种精美的菜名。客人只有在吃饭点菜时，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原来，实有的菜只占菜单上所列的三分之一不到。

著名的电影制片人索尔·霍罗克的同事曾对我说过，每当霍罗克先生坐上旅馆的餐桌时，领班便向他递来菜单。当他向领班点菜时，回答总是这么一句话，“别管菜单，你想吃点啥？”这时他便答道：“你直说吧！你们今天有啥菜？”

民族游戏

记得偶然有一次机会，使我能亲眼目睹“波卡茹卡”的前前后后。那时，我正在巴库游览，住在里海边的宾馆里。有一天，上面给宾馆里来了指示，说由外国使节组成的参观团已经出发前来这个地区进行正式访问。顷刻间，这一消息使得宾馆里的人如临大敌，从经理到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倾巢而出，迅速安排布置宾馆，以便应付代表团的参观。

管走廊的妇女，收起所有的房门钥匙，把它交给用金粉重新书写房间号码的人；电工东张西望，换下烧坏的灯泡；清洁女工卷起袖子，洗刷门窗，扫除灰尘；宾馆大门和通往宾馆的海滨大道，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焕然一新。

餐桌上普通的玻璃烟灰缸即刻消失，代之以又新又漂亮的烟灰缸。在插满白丁香的大花瓶旁边，放着新的菜单。它比原来的菜单更精致、更漂亮，菜的价钱也更贵。

在美国，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作“掩人耳目、弄虚作假”，然而苏联人却把它叫作“民族游戏”。

推心置腹的交谈

同许多人一样，我曾同别人围坐在铺着绿色台毯的桌子旁，进行长时间的谨慎小心的谈话，这种铺着绿色台毯的桌子在苏联每家公司里都能见到。此外，我还同苏联的一些官员进行过另一种避人耳目的谈话。他们向我诉说了内心的秘密，这样做无非是出于他们内心的哲学思想，或者出于对这种虚伪的表面现象感到厌倦。确实，谈论政治在苏联也许是不允许的，但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俄国人也同其他人一样喜欢谈论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且还会在谈话中暴露不少社会的真相。

比如有一次，我乘汽车横越高加索，作了一次长途旅行。陪同我的是一位女翻译。她一方面协助我工作，另一方面却不让我更多地了解一些苏联生活的真相。但她曾忧郁地向我诉说过作为一个参加工作的妇女的苦衷，以及一般苏联妇女的艰难生活。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商业展览会里，我曾遇到过一个共产党员，他很希望谈论当今苏联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问题。他向我谈到要把他的子女培养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实在困难，因

为他们都向往西方的音乐。

一个管理外国人旅游和外国记者事务的苏联情报部人员，在他的办公室里惊奇地向我谈论了非常文明的美国生活，他还得意地给我看他最近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套别致的西装和色彩鲜艳的宽领带。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但我不能一一提及，唯恐给他们带来不测。总之，俄国人的本质是善良的，在非正式场合，他们经常会流露出一些心灵深处的人性的东西。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吧，所以对他们的控制很严格，他们的负责人除集体外也很少单独会见外宾。

不受限制的四种人

对于接触外国人，苏联当局给官员们定下了许多清规戒律，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不受它的限制。这些人往往带有个人的动机，谈吐也比较直爽、坦率。他们就是苏联企业里的知识分子、青年、地下画家、持不同政见者和犹太移民。

一些企业里的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获得一种西方称之为自由者的声誉。他们千方百计想搞到访问美国的邀请，或者在美国使馆中喝姜汁酒和威士忌。当然，对于同使馆之间的关系，他们还是注意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在一些青年人的眼中，最向往的就是买到一条你碰到他们时穿的那种牛仔裤，或者是最流行的西方唱片。

一些画家最关心的是出售他们自己的作品。

而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和犹太移民，最重视的则是诉说他们的苦处。尽管如此，我发现在这些人中，有些人你可以倾听他们的见解，和他们交谈，他们是能够看到社会的黑暗面，并真诚地

渴望和外界联系、交流思想和经验的。

他们为什么向我诉苦

我所担任的《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的职务给了我很大的方便，使我能比其他外国记者有着更多的机会同《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苏联报纸的高级记者接触。同这些记者接触，尤其是同他们中出过国的人接触，是有益的。因为这些人比起那些不高兴西方记者在场、同时一般也很难接近的苏联官员来说，要随便多了。

当然，他们在同国外同行进行的竞争中，还很注意维护自己和职业的尊严的。正如我前面说过的，《纽约时报》分社社长的这个职务甚至对我同普通的苏联公民相处、接触都是有帮助的。因为苏联报纸经常转载《纽约时报》的消息，作为博取人们相信它的新闻报道的一种手段。更何况《纽约时报》对于俄国人来说是众所周知的。同时，我很想亲自去了解人们。我碰到过少数人，他们见到我会立刻警惕起来；但其他人，尽管他们当中有人会用防备的口气说：“哎！记者！”却常会显露出他们的关心和好奇。有些人甚至还愿意告诉我一些小秘密，或者向我诉说他们的苦处。他们感到只要不说出他们的身份——至少不对我说出来，他们就可以向我透露内心的秘密。而这类事情如果碰在苏联记者手里，便截然相反了。

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年妇女在电话里用颤抖的声音再三要求会见我，我犹豫了好久之后，终于去了。她向我叙述了她和她那个残废的丈夫和公公怎样共同住在一间房门很大的房间里，这和通常的居住常识是不相称的。但一些官员们却拒绝为他们安排一间较好的住房。说真的，她的勇敢简直到了难以置信的

程度。因为她不仅上告党中央，而且还想说服我把她的苦痛写出来。这样，苏联当局就不得不解决她家的住房问题了。而我的看法正好同她相反，我对她说，把她的遭遇和名字一起写出来，那将会给她带来很大的麻烦。

某日晚上，一个晓得我电话号码的人打电话来，用波罗的海一带的口音告诉我，他在走近美国大使馆时怎样遭到苏联警卫的虐待，但话还没有讲完，电话就突然中断了。

离莫斯科越远，控制越松

但是，最使我惊奇的是在苏联各地同人们的偶然会见。我和我的妻子发现，离开莫斯科越远，那种对苏联人心中受压抑、受原则和信条灌输的感觉就越少。比如格鲁吉亚、立陶宛、乌兹别克斯坦、爱沙尼亚、阿塞拜疆、摩尔达维亚、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的人，比起政治上过敏的莫斯科人要爽直得多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并不隐瞒对苏联当局的批评和公开的对立情绪，而问题是需要寻找合适的谈话地点和时间，不论是在饭店、剧场，还是在火车上、机场内都是如此。

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一般出远门总是比较急的，而我们在苏联则常乘火车，因为乘火车可以休息得比较好，并有机会了解人们。

有一次，我和一个国营小农场的经理在餐车里聊了两个小时，我们一起饮苦啤酒、喝罗宋汤。他向我叙述了怎样通过私养一群羊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发财致富。

又有一次，我在拉脱维亚遇到一个戴阔边眼镜的工程师。他告诉我曾在某地看到过一则消息，说美国人发明了一种眼镜，能纠正色盲，并要我帮他搞一副……最后，他向我谈起了苏联建筑

工具存在的弱点。

有一天，我在高加索山区的巴库-第比利斯一路游览，一个建筑工人向我透露了申请到国外工作的手续：先是要经过长期的安全审查和思想教育，最后才能获准出国，在国外赚钱。

我还长时间地同两个苏联战斗机司令部的飞行员一起玩过乒乓球，其中一个喝了许多伏特加和威士忌，还因为我的妻子和他妹妹同名而拥抱了她。他还不断地拍着我的肩膀说：“那么你是真正的美国人罗？”因为在此之前，除了在冷战时期被苏联人打下来的美国侦察机飞行员外，他没有再见到过其他美国人。

就这样，我和我的妻子相继了解到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一些生活侧面。那些接踵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人们，有的已成了我们比较接近的朋友。他们当中有亚美尼亚人，他们只因为有叔叔或舅舅在美国旧金山而本能地邀请我们出席婚礼或婚礼后专门为我们安排一些较长的庆祝会；还有那个神经质的爱沙尼亚画家，我们曾向他买过几幅现代画。

尽管如此，在这些会见中，还有某种东西使我们难以冲破那不信任和恐惧的障碍，难以碰到人们的热情，而这些热情本来是可以使那些会见成为十分珍贵和难得的机会的。

当然，问题不在于不能同苏联人民接触，问题在于苏联当局决心要花费许多精力来阻止那种多半没有经过事先安排的接触。我指的是那种不是为了友谊、而是为了打听内幕的接触。

二、特权阶层

苏联的特权制度有它自己的规章：根据官衔的大小决定享有的特权。

排在名单最前面的有苏共政治局的首脑、党内有相当权势的中央委员、各部的部长，以及为数不多的最高苏维埃执行委员。他们每月领取的“克里姆林宫津贴”足够供他们一家人大吃大喝。

与此相反，一个有四口人的城市家庭每月需要花费一百八十到二百左右卢布，其中花在吃的上面就得占去收入的一半。

最高级领导人享受送货上门的待遇，或者可以到设在克里姆林宫及党中央内部的专门商店领取他们的物品；部长和最高苏维埃执行委员在政府大楼专为他们设立的商店中领取物品，这是一幢座落在别尔谢涅夫斯基大街上的灰色建筑；那些一九二〇年以前入党、现已退休的老布尔什维克，则可到库米苏姆大街上的一家三层楼的专门商店里领取克里姆林宫特别供应的物品。这些物品的价格、质量则按享有者的地位高低而分成若干等级。

特殊商店、食堂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卖减价食品的商店。它专向元帅、海军将领、高级科学家、宇宙航飞行员、经济管理人员、获得高级勋章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获得列宁奖金的作家、演员、芭蕾舞明星、

《真理报》和《消息报》或其他重要刊物的高级编辑以及莫斯科市的领导人销售廉价食品。

一个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告诉我，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分成三种等级，因而要分别在三家不同等级的商店里买东西，到设在党的总部的食堂吃饭，饭菜也是严格地按等级制度供应的。

党的机关和主要部委、武装部队司令部、秘密警察机构的中层干部都在奢侈品较少一些的中级商店里买东西，而他们付的钱却要比大头头多。

配给卡上的“限额”

许多政府机关还发给高级官员“特殊配给卡”，凭卡可以到首都的特殊商店里买东西。一个官僚对我说，在这种商店买东西的官员，可以购买的钱数，都按照级别有一定的规定，并标明在卡片上。但限额的钱数对他们的部属是保密的。

在莫斯科最大的商店——“国营莫斯科百货公司”的三楼上，开设了一个代号“一〇〇”的柜台，专门供应特权阶层时髦的服装。

加里宁大街上的“陆海军大厦”里，有专为军官开设的秘密销售柜。

在莫斯科，有一大批秘密地为首都的特权阶层服务的裁缝铺、理发馆、洗染店、照相馆等等。一位能在这些地方进出的人告诉我，这些店铺，倘若加上食品店的话，总计可达到一百家之多。

一名借了她有权势的朋友的光而刚秘密走访了一家特殊商店的中年女记者对我说：“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觉得我

要把商店里所有的东西都买下来。”这时她丈夫接过话题，讥讽地说：“共产主义嘛，对于他们来说，早就实现了。”

卢布证券

苏联社会还有另一种特权：在莫斯科开设了八家硬通货商店。持有“卢布证券”的俄国人能在这里买到廉价的进口货或俄国的稀有商品。

“卢布证券”通常发给那些在国外工作挣了钱而把外汇兑换成卢布的苏联人，如外交官、受信任的记者和诗人等。有特殊门道的政府官员的部分薪金也用这种证券支付。在黑市上，一个“卢布证券”可以换八个普通卢布。

几乎所有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苏联人，如旅游向导、政府部门的翻译、陪同外宾的记者、教外国使馆人员俄文的教师，他们的部分工资也用“卢布证券”支付。这样就可买到进口围巾、考究的衬衣、阔气的领带或皮鞋，来为自己一般的苏式衣着添上一点优雅的色彩。

不少俄国人对于这些不收苏联货币、专门销售奢侈品的商店感到极其恼火。我曾听到一位知识分子这样讲：“在我们国家内，竟有如此不收国币的商店，简直是一种耻辱！”可是实际上，这种商店还不仅限于不收国币，而且不接待俄国人民，警卫人员阻止没有出入证的俄国人进入任何一家这样的特殊商店。特权阶层独占特权的制度，已引起了许多俄国人的愤慨，因为它违反了确认的社会主义平等的原则。

格兰诺夫斯基大街上的特殊商店，不仅是特权制度的标志，也是它的一个缩影。它专门向政界首脑，或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开放，而对普通公民则摈之门外。

通常,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里,无论是铸工,还是屠夫,只要他愿意付钱,就能买到一部卡特勒克大轿车,吃上一顿佳肴,包一套豪华旅馆中的房间。但是在俄国则不然。用一位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米伯鲁夫·迪杰莱斯的话来说,任何一种高档品,都属于那些“享有特权、领取高薪的阶层,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国家的权力”。

超阶级的阶层

在苏联有一大批享有特权的新贵,他们的人数有一百多万,如果算上他们的亲属,则有几百万,但它的确切人数在苏联是难以捉摸的,因为俄国人不承认存在这么一批人。照官方的说法,苏联现在只有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此外,还有一个包括职员和知识分子在内的雇员阶层,其人数据西方学者估计,约在一千万到一千七百万之间。正是这一知识界的上层,构成了实际上的特权阶级,其核心是管理国家和政府的官僚,再加上高级经济管理人员、科学界有权势的行政官员、党报及宣传系统的主管人。

这种制度的神经中枢,苏联人管它叫“诺明克拉托拉”。这个词无法翻译出来,它实际上就是“花名册”,就是那些被党的首领先来担任大部分主要职务的人员的名单。在苏联,从乡村到克里姆林宫,各级组织都有这种“花名册”。

特权名单

“花名册”的前头是政治局成员的名单,他们的职务是由苏联最高统治者直接指派的;接着是各部的部长,科学院院长,《真

理报》和《消息报》的主编，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领导人，最敏感的一些部的部长，驻美大使和另外几个主要大使以及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这个比华盛顿白宫班子的权力还要大得多的书记处，它指派大批人担任一些看上去地位似乎并不高，但却是异常重要的职务。按照这一程序，一级指定一级，直到各加盟共和国、各州、市、区以及各个村庄，形成了一个任意授与官职的庞大的系统。

“花名册”也是秘密制定的。小职员不能沾光，只有那些领导人或在党内有职务的人才能享受这种特权。

在俄国，还有另一条通向上层地位和享受特权的途径，那就是在增强国力、为国争光上施展出显著的个人才能，如大科学家、芭蕾舞明星、宇航员、奥林匹克冠军、闻名的小提琴家、有名望的军事将领，他们都能在上层占有地位，但仅仅是地位而不是权力，这就是政界的上层同其他阶层的基本区别。

虽然文化和科学界的著名人士在显示苏联的力量和成就方面效力不小，但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和特权，还必须表示忠诚。党独揽奖赏大权，既可以给他们大量奖金，又可以授与他们保证过舒适生活的勋章和头衔。

党 在 惩 罚

党还行使惩罚之权。它能随意撤销以前的正式决定。不许索尔仁尼琴获列宁奖金就是一例。它也能收回已赏给的特权，倘若触犯了它的利益的话。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辩护者——有名的大提琴演奏家罗奇斯拉夫·罗斯特鲁布斯基出国旅行以及在国内演出的权利就是一例。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为了表彰所取得的成就，和收买那些已成名的人，党的官僚机关总是授与文化科

学界的名流以“人民艺术家”或“列宁奖金获得者”的桂冠，并且赐给他们享有舒适的乡间别墅这样的特权。这种做法和当年俄国沙皇的做法如出一辙。对于那些为沙皇效力的上流人士，沙皇赐给他们庄园和头衔。

也许，头目们的地位和特权最明显地表现在拥有配备司机的小汽车上。这种小汽车用灰色的窗帘遮住车窗，使行人无法知道乘坐的是哪位显赫人物。它行驶于马路中央，警察看到它们开来，马上就得指挥其他车辆让路。

当一辆载着某一头目的汽车开出克里姆林宫大门，穿过那条通往勃列日涅夫寓所的马路，驰向这些头目们居住的绿树成荫的别墅区的时候，一个站在捷列姆诺夫斯基大街边上的警察便鸣笛向交警示意，阻止其他汽车通行。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指示通过无线电相继传到下一个岗亭。

“吉尔牌”和“海鸥牌”

上层的精华大约共有二十人——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他们使用黑色的“吉尔牌”小轿车，每辆约值七万五千美元。一次，我对一辆停着的“吉尔牌”的车内扫了一眼，但是马上就有一位保安人员前来要我离开。这种轿车的车身是长形的，样子象“林肯大陆牌”轿车，里面非常豪华：有软垫椅、长毛绒地毯、空气调节器、无线电话以及其他奢侈品。

一位工程师告诉我，当时斯大林乘坐的六辆车中就有五辆是“吉尔牌”，另一辆是老式但豪华的“巴卡尔”牌轿车。为了使人们搞不清他到底坐的是哪一辆，所以他每次外出时都换乘不同牌子的轿车。到赫鲁晓夫执政时，他把自己的车队改成四辆。自从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一个心怀不满的陆军中尉从克里

姆林宫鲍罗维茨基门向勃列日涅夫的轿车开枪射击以后，勃列日涅夫出行时车队也改由四辆轿车组成。

对于那些资格还够不上坐“吉尔牌”轿车的二流人物来说，“海鸥牌”轿车是牌子最好的了。它车身大，象五十年代“巴卡尔”牌的载重车。在一些主要街道上，专门划出了中间行车线，供主要人物的轿车行驶，人们常把这种行车线称作“海鸥牌行车线”，因为“海鸥牌”轿车经常在这条线上行驶。

能坐“海鸥牌”轿车的人是：政府部长、元帅以及来访的重要外宾和代表团。有些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和企业家也用每辆一万三千美元的价钱购买了这种轿车。通常，俄国人在举行婚礼时也租用“海鸥牌”轿车。

三、市场 = 彩票

俄国人几乎都是这样：女的拿着网兜，男的手拎提包，大家都经常随身带着足够的钱。他们这样外出不会是徒劳无益的。一看到什么商品，马上就排队。

不管市场上排什么队，谁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向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借钱。

俄国人是慷慨的。在他们眼里，花钱的好机会比钱还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艰难困苦依然存在，人们为购买商品而疲于奔命。

凡是到苏联来的人，最先问的是有关生活方面的比例数；而最觉诧异的是听到廉价的房租、食品和服装。

在前往塔什干的飞机上，我曾遇到一位嘴里镶着九颗金牙的妇女。她和她的丈夫同在一个纺织公司里工作。记得她曾对我说：她和丈夫两人的薪水总共是二百一十卢布（合官价二百八十美元）。他俩和一个三岁女孩的膳食要花去三分之二，一套两间的住房要付将近十二卢布（十六美元）的房租，剩下的五十六卢布（七十五美元）全花在服装、车费、旅游、香烟以及一些少量的税捐上。

然而这些数字还说明不了苏联消费者生活的真面貌，也反映不出俄国人去市场购买物品时所遭受到的折磨。为了购买面包、乳制品、肉类等食品，苏联妇女每天要步行到商店，而且常常要跑许多路，兜好几家商店。

空荡荡的市区

在市中心寥寥无几的几家大商店里，商品较多也较好，所以一些居民爱到那里去买东西，然后搭乘公共汽车或地铁回家。可是有不少人到市中心来购买必需品是迫不得已的，因为俄国商业和建筑业之间的搭配太糟糕了。许多居住区的商店开设到现在，已经二、三年了，里面仍空空如也，连最基本的物品都没有。

除食品外，倘若能在市场上买到其它物品，这对苏联居民来说，简直就象中了头彩一样。

在我首次来到莫斯科担任新闻工作以前，耳闻许多关于苏联消费品匮乏的情况，来到莫斯科后，开头我感到这些传闻并不真实，因为商店里似乎摆满了货物。然而只有当我作为一家之长踏进这些商店购买物品时，才真相大白，确信我以前所听到的传闻并非夸大其词。

厨房的烧锅和皮鞋

起先我们想给在苏联上学的孩子买些课本。经过一番努力，我们才发觉小学六年级的课本已经卖完。后来我们想为十一岁的女儿搞一双芭蕾舞鞋，但是我们又发现在这个以芭蕾舞家著称的国度的首都莫斯科，竟然连八号码的芭蕾舞鞋也奇缺。

红场上著名的大型国营百货公司的中央，是一个喷水池。百货公司内部，装饰豪华，雕梁画栋，点缀着各种色彩的画和装饰品，把它美化成近似上个世纪盛行一时的某种市场。但是，就在这样的公司里，我想买双皮鞋，竟找不到一双合脚的，而面前摆的全是些凉鞋和便鞋。营业员用目光向我示意，不要买这种鞋

子。

一些俄国人还告诫我们不要买钢精锅和锌锅，因为用这种锅子烹饪食物会影响味道。但不锈钢锅、铜锅和电镀锅又完全无货。于是我的妻子只好去买一种搪瓷锅。她跑了四家大商店和一些小店铺，结果是大失所望，空手而归。

原来，在我初抵莫斯科时看到商店里塞满的那些货物，不过是些式样过时、粗糙低劣的外衣和制服，以及连苏联家庭主妇也不要买的锅子和器皿。

计划商品，不是销售商品

尽管苏联经济作了各种改革和修补，然而这一经济仍然是为上层制定的各种计划效劳，而不是为满足下层消费者的需要服务的。生产商品不是为了销售，而是为了填满计划的各个项目，因此造成了商品不同程度的积压。这些矛盾往往令人十分惊愕。例如在列宁格勒，你可看到商店里的滑冰器具多得要命，但整个城市却好几个月买不到洗餐具用的肥皂。与此同时，报刊又提醒人们在使用洗衣皂和卫生皂时要注意，因为这些肥皂含有的物质可能对人体有害。

有手风琴，没有调羹

在亚美尼亚首府埃里温，我看到商店里有大量的手风琴出售，但我也听到居民们抱怨说：几个星期以来，他们就过着没有调羹和茶壶的生活。

我还了解到莫斯科有一户人家，为了买一只小孩的便壶，而奔波了整整一个月，而当时收音机在市场上到处都是。

六月某一天,气温达到华氏九十度(摄氏三十二度),而罗斯托夫的冰淇淋商店,下午二点就关门了,因为它已卖完了全部货色。一位旅客对我说:每天都是如此,大家早已习以为常了。

我认识的一位来到莫斯科访问的美国记者告诉我,有一次他去买打火机用的电石,可是俄国的烟友告诫他,不必自找麻烦,因为在莫斯科,电石两个月前就无货了。

哪里有肉?何时吃肉?

在俄国的精美绝伦的货单上,商品是应有所有的。可是许多商品经常无货,而且在市场上何时出现,也神秘莫测。有些商品缺货连苏联自己的报刊也报道过,例如:牙膏、毛巾、斧头、锁、吸尘器、瓷器、地毯,从烤面包的电炉和照相机到汽车的电器零件,精制的服装和考究的皮鞋等。

在一些地区的旅游中,我还注意到缺少诸如肉类等基本食物。例如,在下通古斯卡和布良斯克等一些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于冬季无肉的生活,肉铺实际上已关闭。我认识的一位青年,他家就住在约有三十八万人口、距离莫斯科西南一百五十英里的加里宁城附近。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没有一次回家探亲而不带一些肉的。因为在加里宁城,除了红肠和调味品外,买不到任何东西。

八双中有一双

质量问题犹如缠着苏联消费者的又一个梦魇。消费品质量的低劣程度是众所周知的,需要彻底加以纠正。对这种用最低劣的原料制成的许多消费品,连俄国人都不屑一顾。这些商品

简单可归纳为一无色彩，二无式样，三无花色，四不华丽。

由于某种原因，鞋子问题使苏联消费者伤透了脑筋。一九七三年底，《文学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一些检验员否认国产的鞋子平均每八双中有一双是次品。

“碰巧袋”

上面谈的是往日旧事了，至于俄国七十年代的革命新事，那就是俄国消费者已开始成为百般挑剔的顾客。不错，乡下人也许什么都买，但城里人可不一样，他们只要更好和更时髦的东西，而且身边携带的货币也比以往任何时候多。可是他们考虑使用货币的余地，却比以前更少了，因为一有东西，就必须马上买。

由于苏联消费品在市场上的出现，完全象气候一样，变化无常，难以捉摸，加上很少刊登有助于消费者的引人注目的广告，所以苏联居民只好靠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方法来打听。例如，他们知道苏联某些工厂，尤其是波罗的海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工厂在生产诸如精巧雅致的妇女服装，吸引人的男衬衫，床上用品，收音机，汽船等一级商品。这些商品只要一出来，顷刻之间就会销售一空。所以苏联居民不断到这些工厂来打听，希望当这些工厂抛出一些好东西时，能够不失时机地买到它。这也就反映了俄国居民在这一方面的想法。

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俄国妇女都随身带着一个网袋。她们把这叫做“阿伏斯卡”，意思是“碰巧”。她们携带这种网袋是为了万一碰巧遇到出乎意料物品供应时，好派用场。因为在俄国，商店里不提供任何包装购买品的纸袋。

男人的提包里是什么？

同样，绝大部分苏联男公民也经常随身带着手提包，跑到哪里，带到哪里。看到这一情景，起先我很感动，感到他们的样子象一本正经的实业家。一天在公园里，我和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坐在一起聊天。我看到他突然把手伸进包里，开头，我以为他要拿出什么材料来证实他谈的观点，于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手，结果发现他在包里翻动着用一张沾着血的报纸裹着的一块肉。

原来这位科学家不住在莫斯科，这次他买了块肉，想带回家去，他打开提包，想看看肉上的血是否还在渗透。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才发现男人的提包里，往往被柑子、牙膏或者鞋子塞得鼓鼓的，而不是书籍和材料。

此外，为了保险起见，苏联人身边经常带着足够的货币。因为苏联的规章制度规定买卖不用支票，不赊帐。除了商店里积压的没人买的收音机、电视机外，其它商品一律不能分期付款。

一位脸色红润、身体结实的俄国妇女说：为了应付可能碰到紧张商品这样一件幸运的事情，你就必须随身带着一大笔钱。假设你看到商店在出售价值八十卢布的“鲍蒂”（一种长统靴）时，你马上就得排队，因而也就没有时间回家拿钱。否则，等你回来时，什么也买不到了。

十分慷慨的人们

这种环境在俄国居民身上产生的可嘉特点之一，也许就是

随时准备同朋友和同事来分享身边的钱，以帮助他们克服类似这种购买物品时出现的困难。普通俄国居民同大多数美国居民相比，就显得不如美国居民有钱，可是他们对待朋友却要比美国居民慷慨得多。向别人借钱，或者借给友人和同事二十五卢布、五十卢布甚至一百卢布，到下次发工资时再还，只要苏联居民能够做到，他们都是满不在乎的。因为对大多数俄国人来说，花钱的好机会比钱更为重要。

他们仿佛处在世界大战之中

在市场购买商品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一种精神和身体的竞争，完全象纽约居民在高峰时间搭乘地铁的那种情景。但令人诧异的是苏联人看待整个事情是那么漠不关心，毫不在意。他们争先恐后地拥入商店，铁板着脸，相互碰撞，语言刺耳。对给他们开门和让路的人，谁也不想道谢一声。

特别是那些莫斯科居民，他们在城市的居民中是颇享蛮横粗暴的名声的。你可以不时读到作家谴责他们举止粗野的评论。尽管这样，那些俄国人在同亲友相聚时，你还是会觉察到他们的一片热心。

我还听到一位灰头发、好心肠的文学评论家对我这么说：“你必须懂得，对于我们来说，购买是斗争，生活也是斗争，而排队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当家里小孩睡过了头，排不上队，买不到面包，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时，整个情景就好象在战争时期那样。不错，现在的状况是有了好转，但是当人们去购买东西时，仍然存在这种感觉。”

四、腐败、贿赂、盗窃和 黑市的来龙去脉

俄国的腐败和非法的私人活动——一些俄国人欣然称之为“蔓延着的资本主义”的增长，是货物匮乏、质量低劣以及服务行业中骇人听闻的糟糕现象的必然结果。这种弊病不仅造成了类似西方的黑市的大量出现，而且还使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每个地方，都产生了同国营经济相抗衡、重新崛起的私营经济。这些私营经济，以那些为企业和个人都不可缺少的隐蔽或半公开的贸易形式大规模地进行交易。

实际上，在苏联，任何事情都能私下成交：租借度假的乡间住宅，在国营商店购买质地优良的大衣、皮鞋，从裁缝手里搞到一件时髦的连衫裙，从别的城市运来长沙发，在公寓门前安装隔音器，到医术高超的牙医那儿治疗，送孩子进专门学校，请著名外科大夫来家中诊断，在集体农庄建造房屋，以及铺设管道等等，真是无所不包！

这种私营经济已经成为苏维埃制度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根深蒂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它包罗万象，从小额贿赂、黑市交易，到大笔贪污公款、建立地下工厂（此类地下工厂规模之大曾导致共产党内的大人物、一位政治局委员这样的靠山倒台）。这种私营经济泛滥成灾，无可争议地引起了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深恶痛绝。

为了对付“特权阶层”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把私营经济当作既成事实，就象国营经济机器上必不可少的润滑油一样。苏联新贵们凭借他们享有的特权，通过冠冕堂皇、合法的途径，从专门为他们开设的商店里弄到手的东酉，普通公民却不得不通过私营经济的非法途径得到它。——在这方面，我曾听见一位搞化学的朋友说过：“这玩意儿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更有人情味了。”

有一天，我向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问及私营经济的规模，他很有把握地说：“依我看，占国营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或更多些，大约有五百亿卢布（合六百六十亿美元）。对这个数字，众说纷纭，或大或小。”

苏联的经济学界（甚至他们之中承认事实上私营经济规模巨大的人）都拒绝提供具体数字。一位最近迁居国外的莫斯科大学原经济学教授告诉我：“私营经济规模相当庞大，尤其是在零售贸易部门。但没有认真进行过统计，所以任何人也无从知道它的精确数字。”

但是，他们被驱向死亡

鉴于在俄国人人知道存在着私营经济，报刊就腐化堕落、贪污盗窃、非法经营的现象发表了一些文章。尽管这些文章只字不提能够表明非法活动程度的任何数据，然而每年却有大量消息报道经济罪犯被判处死刑。他们参与了牟取数十万、甚至百万以上卢布的非法活动（对经济罪犯判处死刑，是在这些犯罪活动日渐猖獗后，于一九六一年重新实行的）。

一九六六年新闻公报提到，侵吞国家财产的犯罪活动，占全国作案率的四分之一。据一九七二年九月《真理报》透露：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相当于半个苏联）发生了二百起大规模盗窃国家资财的案件。报纸指出：大部分情节严重的案件，特别是长期的作案活动，都是职业罪犯干的。

贿赂和“反局”

非法活动的严重性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迫使内务部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美其名曰：“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简称“反局”——译者），它的活动范围涉及全国。

然而，这个办公室不仅无法制止贪污盗窃活动，甚至发生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收买的事件，正重演着西方毒品贩子收买禁毒人员的丑剧——这是我从一些熟悉的俄国人那儿听到的。此外，一些报刊评论指出：为保护商店、工厂、农庄所采取的一系列大规模措施均告失败。其原因是，执行检查措施的人员本身就是一伙营私舞弊分子。

富裕散发着贪污腐化的臭气

当然，贪污腐化并不是件新鲜事。我听到一些俄国人说：早在斯大林时代就有此事。但他们承认，贪污腐化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随着苏联经济的畸形发展而急剧地蔓延开来的。

记得一位在莫斯科交际很广的阿拉伯朋友说过，当他重返阔别已久的莫斯科后，向一位朋友及其妻子问起苏联在过去十年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时，他俩异口同声地答道：“贪污腐化……”

男的说：“贪污腐化的蔓延实在令人吃惊！”

他漂亮的妻子讲：“你真想象不到，这种贪污腐化到了什么程度！过去，只是一些人之间的互行方便。如：用香烟换芭蕾舞票，或把鱼子酱作为礼物送给女裁缝……，而现在呢？不花钱就无法办事，而且要花大钱！”说着，她用手势做起了众所周知的点钱的动作。

“你为我搔背，我就为你搔背”

在苏联，私营经济有其独特的行话、诀窍、方式和规矩。这一切人人皆知，几乎天天使用着。它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而最为时髦和通行的，要算是俄国人所说的“普拉沃”，意思是开后门或巴结上司、头头。

在物资供应严重匮乏、特权等级森严的情况下，这种“开后门和巴结”就成了生活中的方便之门。谁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开后门的本领也就越大。然而，不管谁，同样都可以对其他人施展开后门和巴结的本领。如对门房、搬运工、食品店里的女清洁工、营业员、技术员直至教授，他们都能给人以方便，提供别人很难搞到的东西。当某人要求对方给予方便并暗示他将由此得到相应的好处时，开后门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就开后门这个字眼本身来说，并没有花钱的意思。有一位女演员对我解释道：“开后门实际上不等于堕落，只是你为我办事，我就为你效劳的意思。换句话说，你为我搔背，我就为你搔背。”

受贿最多的是营业员

开后门不过是冰山露头，但贿赂却到处泛滥。阿拉伯人把

贿赂称之为“巴格西西”，墨西哥人叫“摩里达”，美国人说成“手中的油水”，而俄国人称它为“符齐亚特卡”，它字面的意思就是：“贿赂”。而最能捞到这些油水的是薪水微薄的营业员（每月八十到一百二十美元），他们暗藏商品，私下卖给行贿者和支付小费以换取他们效劳的人。

一位电子计算机专家告诉我说：“这里，没有一个人靠固定工资为生。也许你不知道敖德萨是怎么说的，要是一个人对另一个发火，他就这样破口大骂：‘你只能靠工资吃饭’……这是多么可悲的命运……简直不可思议！”

当我抵达莫斯科时，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俄国人的衣着比我想象中的要考究得多。而当我把他们穿的和橱窗里放的一比，就清楚地感到两者之间的差别何其大也。

显而易见，有许多东西的买和卖是看不见的。顾客们为了买到罕见的、被俄国人称为“缺档商品”（即市场里短缺的商品），早已暗中贿赂了营业员。方法极为简便，营业员只要留下一部份进货的“缺档商品”，私下卖给那些已经塞钱给他，或者他相信在取货时会向他行贿的老主顾们。通常，买一件价值六十卢布的雨衣，就得花十到十五卢布作为贿赂。

类似这样的贿赂已广为蔓延，以至成为苏联报刊经常抨击的一个方面，而这种抨击实际上是徒劳的。我记得一九七三年二月，在莫斯科附近的地方性小报《列宁的旗帜》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揭露了谢里夫城郊（在那里居住着赫赫有名的宇宙航行家们和国防科研人员）的一家以商品繁多出名的商店，同样也出现了藏匿商品这类事情。

文章指出：一些调查员发现有三十五种缺档商品被非法藏匿，如皮帽、皮领、女式流线型高帮鞋、皮鞋、毡靴、冰岛毯子、头巾、地毯、手套、整套茶具、皮拎包，等等。

针对这种丑事，幽默杂志《鳄鱼》写了这样一段讽刺小品：“亲爱的主顾们，……五百只女式进口皮包已到本店皮货柜。四百五十只被店员买去；四十九只藏在交货柜下，这是卖给预先订购的朋友们的；尚留一只，陈列在橱窗里，请各位莅临本柜观光购买！”

女厕所里的市场

黑市并没有特定的活动场所，其交易可以在买者或卖者的家中进行。由于它只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买卖，似乎在每一个地方都发现不了它，可它又到处活动，有些还在人来人往的地方进行。

一位莫斯科公民对我说：口红和化妆品最著名的黑市是在莫斯科，就在布尔什维克剧场那条支路上的女公共厕所里。黑市商选中这个地方是因为男的警官不能入内。又如短波收音机、录音器材的黑市集中在莫斯科的中心街道上出售旧电子器材的商店对面。

五、今朝有酒今朝醉

如果向一位苏联官员打听他的国家的业余活动情况，你马上会被告知：业余活动遍及数百万人（不管这是事实还是仅限于纸上的数字），他们参加各项体育活动，或者在过由工会组织并担负部分费用的休假活动。

然而，官方的措施和计划只不过涉及到一小部分的业余时间，绝大部分的活动则同官方无关，且颇为简陋。

收集纪念章的狂热

在公园和娱乐场所的那些固定椅子的周围，常常聚集了许多俄国人，有大人，也有小孩。起初，我以为他们在下棋；后来才弄明白，他们是在玩骨牌赌钱。

俄国人还热衷于彩票。

目前那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是驯养鸟兽的爱好再度出现。这种现象在鸟市显而易见。那是一个泥泞的露天市场，每逢星期日开市，除出售各种鸟类外，还出售供人们饲养的淡水鱼、兔子、猫、狗和猪，附带还有他们为这些动物自编的笼子。

然而，盛行于俄国青年中的狂热，则是收集佩在胸前（别在男式外套、衬衣或女式羊毛衫翻领上）的纪念章。这股狂热大大超过了俄国人对收集邮票和各种钱币的爱好，结果是城市、俱乐部、机关和企业竞相生产几百万只带有城市或俱乐部等标记的纪念章。

小孩子们常常挡住游览者们的去路，向他们兜换各种纪念章。那里的人把这叫做“纪念章换口香糖”。

我记得加拿大冰球运动员和为他们一路助威的陪同人员，也遭到过收集纪念章爱好者们类似的包围，向他们索取有可能作为奖品获得的加拿大纪念章。

这种爱好的流行达到了这样的地步：职业收藏者们常偷偷地聚集在高尔基公园附近，互相合作、交换和倒卖各种稀有的纪念章。他们把纪念章小心地装在用透明塑料盖罩起来的盒子里，拿给人看，盒子则放在手提包里。一批利用这种爱好的剥削者已应运而生，以致《真理报》曾发起攻击，不仅抨击那些收集纪念章的成年人，而且指责耗费巨款去设计和生产这些纪念章的国营企业。

更有甚者，《真理报》还对“车里亚宾斯克”狗俱乐部表示极大愤慨，因为这个俱乐部按军事大勋章的样子制造纪念章；该报还攻击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铸造企业，原因是该企业在纪念章上铸造了一种“厕所”的小模型，上面写着：“阿塞拜疆卫生技术企业之最佳产品”。

人伴熊舞

娱乐时间一到，你便会看到传统的俄罗斯热情达到了顶点，他们围成圈子同马戏团的熊一起跳舞，或是参加紧张的比赛，其中包括各种剧烈的杂技项目。而且，即使他们离城外出，到索菲亚饭店这样一个全是女招待员的地方，他们也决不忘记显示自己的体育天才。不错，他们中有的去那儿喝酒的，有少数人还精于西方舞蹈，但大多数人跳西方舞的方式，与其说是在跳舞，还不如说是在搞体育。

“蘑菇”风席卷全国

俄国人最大的露天爱好则是采集蘑菇，这往往使西方人惊讶不已。这种爱好到了秋季，成为一股席卷全国的狂热。爱好者们把他们选中的第一茬蘑菇的地区当做“绝密区”。甚至他们中兴趣不那么大的人，也接连几个小时在古老的森林里钻来钻去，用手指挖地，把手帕或帽子，当作盒子，盛放采到的蘑菇。

到蘑菇旺季，竞争就剧烈非凡。爱好者们组织集体探索旅行，星期五下午乘车出发，在汽车里面或者在随便那条路上过夜，喝茶或喝伏特加以取暖，以便天一亮最先上路去寻找蘑菇。

事实上，这种活动的意义远不能一望而知。采蘑菇的爱好者们肯定：“每一种蘑菇都有其独特的风味。”他们说：“乳白色的蘑菇是伏特加中的名牌——褐色的‘比特鲁伏卡’酒的最好下酒菜”，说“红头小蘑菇最好配纯净的伏特加，喝前要好好冰镇。伏特加不会影响蘑菇的滋味”。事实上，有许多人采集各种蘑菇，乃是为了寻找各种理由来喝伏特加酒。

给我伏特加，工资无所谓

西方没有一种酒可以和伏特加相提并论，也找不到俄国人喝伏特加的方式。伏特加犹如腐蚀剂，它是“滑出”和逃避俄国生活方式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

你要看俄国人眉开眼笑，只要在他面前提一下伏特加这个名字就行了。

对俄国人来说，伏特加可以减轻他们生活中的极度紧张，有助于人们了解彼此的真情。你会听到他们中许多人说：“你不能

相信任何人，除非你先同他痛饮一场。”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拉维·马特维迪夫曾对我说：“乌拉尔有一位年轻教师，一天他在村子里转，鼓励村民们送子女上学，但是村民们不听他的，也不同他交谈，只是在他同他们坐在一起喝了一小桶伏特加之后，他们才认为他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工人和农民同样普遍地爱喝伏特加，他们宁可不要四美元八十美分的工资，而要一瓶半公升的伏特加。

伏特加瓶里滴酒不剩

一个不知道俄国人喝酒方式的人，是估计不出俄国人嗜饮的厉害程度的。一六三九年，霍尔斯坦公爵驻莫斯科宫廷的大使亚当·奥林斯写道：“俄国人酒瘾之大，世界上独一无二。”一八三九年，法国的一位贵族德科斯金侯爵写道：“喝酒是俄国人的一种享受。”事实上，目前情况依然如故。但这并不是说俄国是一个由酒鬼醉汉组成的松散联邦。俄国人只不过是懂得适可而止罢了。伏特加酒在他们面前一打开，把它喝个一干二净，这已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他们不知道把剩酒放回榭架。

俄国人喝酒主要是为了忘却生活中的烦恼，为了在寒冬腊月温暖身躯。酒在他们内心产生的解脱之感使他们快乐异常。

国家还在增产伏特加

你不时会在报纸上读到或从政治领导方面听到对喝酒危险的严重警告。苏联的高级官员谈到，酗酒是大部分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造成了百分之九十的凶杀案，一半以上的交通事故，百分之四十的离婚案，百分之六十三的溺水事件，莫斯科教

护车接到的紧急要求的三分之一。

酗酒也是工人旷工的首要原因，它严重影响了苏联经济。尽管如此，但我很怀疑这些旨在制止酗酒的警告是否有效。我知道国家每年都在提高酒的生产。消费量同一九四〇年相比，已增加了五倍。农村小店可以没有别的商品，但伏特加是决不能少的。

我曾在假日里目睹大街的人行道上堆塞着醉汉的身躯。我不是指那些偏僻的街道，而是指到处。星期日大白天的狂饮同星期五、星期六晚上喝酒一样普遍。妇女比男人喝得少，但比西方妇女喝得多。我亲眼看到十四岁的姑娘也在喝纯伏特加。

让来宾酩酊大醉

同样，长期耽在俄国的外国人，他们的肝脏没有不受到伏特加威胁的。多少世纪来，俄国人一直用伏特加来灌西方人，作为一种盛情款待。而这却常常影响西方人的工作。一五二六年哈布斯堡王朝驻伟大的伊凡王朝的大使西格斯蒙德·哈勒·查顿男爵回忆说：“俄国人为灌醉来宾是不遗余力的。”即使没有正当的理由喝酒，他们也会编造请酒的理由和借口。要是一位客人显示出犹豫的神情，或是仅仅呷啜一下而不同主人们一起一饮而尽，俄国人就会恼怒地说他瞧不起主人。我可以自信地说，我在俄国三年中所喝的酒超过了我有生以来喝酒的总量。

六、俄国妇女仍是二等人

俄国的妇女，仍然是同一等人男人有巨大差别的二等人。如果在社会各阶层中有受剥削的或成为剥削的牺牲品的，那就是妇女。俄国妇女至今仍然肩负着繁重的劳动和列宁所说的家庭奴隶的双重担子。毫无疑问，她们有理由抱怨紧张的劳动和繁重的家务，搞得她们疲惫不堪。这方面的主要原因用她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同列宁的教导相反，人们获得职业的途径无论是从列宁的观点还是从欧洲妇女运动的观点来看，应该实现的都没有实现。

在许多方面，苏联妇女的处境使她们的生活更加艰难，她们中有一个人对我认识的一个美国妇女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是男孩而不是女孩，因为男孩的生活要好过得多。”这是因为尽管公布了马列主义关于男女平等的原则，但是在苏维埃制度中，重男轻女的旧习根本没有改变。

这种习以为常的男尊女卑，你从俄罗斯的笑话中便可一目了然。

我记得看过这么一出戏，是列宁格勒剧团演出的。剧情大意是：有四个妇女坐在其中的一个家里打牌，她们喝醉了酒狂热地唱着歌，大讲以前的战争故事。与此同时，女主人的丈夫在一旁服侍她们，听她们的使唤。四个女人的喧闹越发狂热，简直无法控制她们的感情。而这个胆小的丈夫则诚惶诚恐地在旁边转来转去，忙个不停。为了不让她们再喝下去，他递上了茶和三明治代替伏特加，但她们严厉斥责他，坚持要伏特加。当聚会结

束，客人准备回家，一个个在舞台上蹒跚行走的时候，这个软弱无能的丈夫给她们穿上了大衣送她们出门。人走楼空，就剩下他们夫妻俩了。于是他想帮她脱鞋脱衣服，但她却拧他的耳朵说：不要碰我。接着就开始了一场围绕着由谁来付酒钱的大吵大闹。

象这类的故事引起了群众的惊奇和捧腹大笑。因为他们很快就晓得这同俄国家庭的情况恰恰相反，正是男人们喜欢读报、看电视、同朋友们坐在一起谈天说地。

在我动身到莫斯科前不久，我碰到一位美籍俄国妇女，她给了我两本有关俄国谚语的小册子，其中对男人过分的倚重使我很惊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女人不是陶器，随你什么时候打她都坏不了。”另一句是：“如果你捉羚羊抓尾巴或者听信女人的话，那么你将一无所有。”第三句是：“狗都比女人聪明，因为它不会在主人面前叫。”

不酗酒，不打人，就不是男人

俄国女工直到现在仍然把男人酗酒和粗野待人作为习以为常的两件事。我从一位西方外交官的妻子那儿听到，她那个俄国女佣有一天曾向她问起她丈夫的事，当女佣知道他不常喝酒也不打她时，便断定他不配作男人。

在俄国如同在西方一样，女的通常要听男的，并为他服务。她们起的作用也不如男的重要。她们还抱怨男的负责人没有象对待她们的男同事那样认真地对待她们。

有一次，我问一个搞人权运动的持不同政见者：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妇女在宣言上签字？他回答说：“如果妇女签了字，人们就将要讥笑它。你要知道，我们还生活在中世纪。”

党的首脑中没有一个女的

在国家的真正权力机构——共产党内，俄国妇女的命运并不佳于她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命运。也许还不如西方妇女在政治生活中那样幸运。在决策机构——政治局的十五名委员中没有一个女的。同样，在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九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也没有一个女的。仅仅在二百四十一名的党中央委员中有六名女委员，这个比例略少于美国国会女议员的比例。即便有这六名女委员，其中有二名是徒有虚名的，她们不象其他中央委员那样享有实权。这种情况就跟美国一样。苏联在这个领域中落后于印度、斯里兰卡和英国，这些国家是妇女当政府首脑，担负着主要的政治角色。

在苏维埃生活的将近六十年中，只有一名妇女能够进入政治局。她就是赫鲁晓夫的红人叶·阿·福尔采娃。但没多久她就被撵了出去。不过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为止，她一直是部长会议中唯一的一名女部长。

妇女年委员会的主席是男的

在俄国和在西方一样，经常发生一些用尴尬的方法来反映重男轻女的情况。但是任何尴尬的情况都抵不上公布一九七四年妇女年委员会名单的官方公告，它宣布委员会的主席是个男的。

自私自利地成长的俄国儿童

有一位俄罗斯艺术史学家——她是一个女孩的母亲，在解

释俄国人对儿童的溺爱和美国人有何不同时说道：“你们让孩子随心所欲，而我们却引他们高兴。”她还说：“我们的儿童自私自利地成长着，这种原因往往要归于他们父母的苦难生活。他们想给孩子们一种优裕的生活条件来补偿这种苦难。而他们的孩子呢，也巴不得如此，毫不在意。”

我还认识一个妇女，她同时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工作，以便挣得足够的钱为她的女儿买最好的衣服，而她自己仅买些简单朴实的衣着。可是她的女儿却认为她母亲应该为她买所有最时髦的东西。也许她会因此而感谢她母亲。在其他一些家庭，孩子们得到家里最好的食物，如果有吃剩的好菜，那也留给孩子以后吃。

我认识一有钱人家，男的在部里当大官。他们每天给不满六岁的男孩子吃黑鱼子酱。虽然孩子们习惯上不喜欢鱼子酱的味道，而大人们又对它垂涎三尺，但他们还是愿意让孩子们经常得到最好的食物。

除了宠爱，俄国父亲还过分地爱护他们的孩子。也许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孩子们出门时所穿的一大堆衣服。当时，看上去活象包了一层层的活动卷心菜。毛衣一件比一件大，再加上一件比他大两号的皮大衣，最后还在脖子上围条大围巾。

在俄国家庭里，大人不要小孩从事家务。我认识的一位女记者说，她“十六岁的女儿在学校和在家庭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学校她自己洗衣服，自己在食堂里端食盘和其他同学轮流值日、扫地、擦窗、打扫教室和游戏厅。但是，玛莎在家却不做任何事，只管坐在桌子上等人伺候。我要我母亲让她自己洗盘子，而我母亲却找借口不让她洗，说：‘玛莎洗碗的方法很糟，还是我自己洗便当。’”

七、嬉皮士和麻醉品

毋庸置疑，俄国青年对西方音乐感到的饥饿和对民间色情文化的极大兴趣，足以证明俄国存在着一种差距，即使就中年阶层和青年来说，也反映着辈份上的差距。

在美国青年把穿“牛仔”裤看成象是革命，把出走以及和同类结伙成帮看作是拒绝和对抗父辈影响的时候，俄国青年所向往和追求的，确切地说，却是富裕和舒适的生活。在现代，这代表了新唯物主义的先声。

青年人准备夏天到西伯利亚去，在建筑工程中找个工作，这样，他一个月便能获得一千卢布的收入。而年轻的女秘书则省吃俭用，攒钱买紧身裤、假发、高帮皮鞋和超短裙等西方流行的穿戴。

嬉皮士不足挂齿，长头发无伤大雅

在莫斯科有一小批“嬉皮士”。但大部分青年知道，穿龌龊衣服意味着招来当局的麻烦，他们不敢冒这个风险。俄国的主要倾向，立足于赶上西方传统的不那么刺眼的“时髦”。不过，我们在莫斯科度过的三年里，这种倾向已变得严重了。一九七一年我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大学生们诉苦说，他们去领助学金的时候不得不把头发剃到脖子以上，要不然负责人就不发钱给他们。当我们离开莫斯科时，反对留长发依然存在，但程度已减轻。我们看到留长发的青年不时地出现在电视——俄国最保守

的宣传工具上。

麻醉品市场的兴起和扩大

麻醉品也登上了舞台。确实，它不象在美国那样的广泛，但尽管范围有限，却足以引起苏联当局的不安，迫使他们不止一次地强化禁毒法令，对贩毒和吸毒严加惩处。

据一九七四年五月公布的一批材料披露，盗窃医务所和利用过期的“处方”，乃是非法麻醉品流传的主要原因之一。敖得萨的一位医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曾多次面对大笔贿赂，要他开出麻醉品来，这些款项“足以购买一辆崭新的汽车”。他虽然拒绝了这些提议，但他对我肯定，这种交易在敖得萨是到处都有的，这座城市早在革命前就以腐败城著称。他还说，这类买卖，大多是通过生产麻醉品的国营工厂的技术人员和能从医务所盗窃麻醉品的医务人员那里得到满足的。

药物所制造迷幻剂

比方说吗啡，他们有时可以从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治疗创伤而染上吗啡瘾的老战士那儿搞到。苏联当局给这些老战士定期免费注射吗啡“针剂”的证件，这些证件和“针剂”往往落到毒品贩子的手里。

一九七二年，一位生理学家向我讲述了发生在莫斯科药物合成所的一桩丑闻：研究人员私自配制的 LSD 迷幻药片被查获了。尽管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但对此类行为严加监督的指令却已发到其它研究所。

不过，这制止不了吸毒和贩毒。一年后，不少熟人告诉我，

他们参加过莫斯科大学的一个晚会，有些与会者就在会上服用毒品 LSD。

莫斯科的大麻烟市场

大麻烟是俄国最为流行的毒品。他们是从苏联的中亚西亚或高加索山区搞到大麻烟的。在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一个青年向我兜售大麻烟，并给我过目。我在莫斯科认识的许多人说：“在莫斯科，距伊兹马依洛沃公园不远的祖国电影院，是尽人皆知的大麻烟买卖中心。”他说：“能过一次瘾的一小块大麻烟卖五个卢布。”

尽管有这些讳莫如深的毒品轶事，但俄国学生和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外国留学生的印象是：毒品在俄国的流行如同在西方一样，是抵制不了的。

（摘译自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至十四日埃及《金字塔报》 上海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专业师生译）

暗无天日的苏联农村

干 城

苏修叛徒集团把农业搞得一团糟，不得不吃进口粮过日子，这一点，现在想要掩盖也掩盖不住了。所以，许多外国报刊记者猜测，在苏修“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一伙虽然一定会给人们画“一幅颂扬苏联共产党的画”，但总得“设法用寥寥几段文字”描述这方面的“巨大困难”。今年二月二十三日，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说，勃列日涅夫之流在“二十五大”上的报告“将精确地选用形容词”，以便“把苏联的成就描绘得尽可能好”，不过他们在农业遭到“灾难性的收成”的情况下，“肯定会按照现实主义的方针行事并指出这些弱点”。

然而，记者们猜错了。勃列日涅夫是世界上最大的吹牛家。他站在“二十五大”的讲坛上，声嘶力竭，唾沫横飞，作了一个长达五个半小时、使五千名代表听得“精疲力尽”的吹牛报告。报告对于农业搞不好，只用“空前的干旱”，“如此不利的情况凑在一起”这样简简单单的两句话一掠而过；接下去，就大吹特吹其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强有力的步伐”在农业方面的表现。什么“农业物质基础的加强”呀，什么“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高涨”呀，什么“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大大好转”呀，吹到最后，连

勃列日涅夫自己也陶醉起来了。他说，在苏联，“有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普遍说法：‘欣欣向荣的边疆’。”

好一个“欣欣向荣的边疆”！看来勃列日涅夫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自己。但是，吹牛毕竟是吹牛，谎言并不能改变现实。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的农村现实状况倒底怎么样呢？且看本刊这一期发表的《苏联农村面面观》的一组文章：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消费合作社的领导人在农村称王称霸，欺压农民，贪污盗窃，侵吞农民的劳动果实；新贵们大发横财，农民死活无人过问；在这样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下，农民生活艰难，只好借酒浇愁，或者离开农村，流入城市；农民大量外流，造成土地荒废，耕地一年年减少；如此等等。这一组文章，从各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农村全面复辟以后农民的悲惨遭遇，也彻底揭穿了勃列日涅夫吹嘘的所谓“欣欣向荣的边疆”原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揭穿了谎言，并不能难住厚颜无耻的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很善于给自己辩护。他在“二十五大”报告中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活动是生气勃勃的和高效率的。在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政治局举行了二百一十五次会议。政治局定期研究了工业、农业……等问题”，“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在过去这段时期中召开过二百零五次会议”。你看，开会开过了，要研究的问题也都研究了，而且研究得又是“生气勃勃的和高效率的”，这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勃列日涅夫的意思很清楚：农业上出问题，责任不在他。谁该负责呢？照勃列日涅夫看来，是那些该死的老百姓，不愿意在农村里老老实实地劳动、劳动、再劳动。于是，《真理报》、《消息报》、《农村生活报》、《农业经济》等苏修御用报刊的一帮记者都出来帮勃列日涅夫讲话了。为什么食品供应发生困难呢？一个原因是农业用地减少。为什么农业用地减少

呢？“主要原因是最近几年来农村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为什么农村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呢？是因为农村里有安娜大婶那样“固执”的人，他们总是喜欢把孩子送到城市，“希望获得侥幸的‘成功’，争取个人的‘飞黄腾达’”。就是集体农庄庄员“酗酒”，责任也在那个女售货员塔兰佐娃，因为正是她不但现卖，而且赊销，所以庄员才喝了过量的伏特加。一句话，安娜大婶不好，塔兰佐娃该死，是老百姓把苏联农业搞坏了。

既然是安娜大婶、塔兰佐娃这些老百姓不好，就得整整老百姓。在苏联农村，整老百姓的办法已经够多了。现在，整老百姓又有“创造性的发展”：以狗整人。莫斯科郊区的“列宁国营农场”场长里亚勃采夫把走进果园的老百姓都看成是小偷，专门花十五万卢布，成立了一个警卫队，养了一群恶狗，来对付所谓偷苹果的人。有一次，莫斯科林业管理局五十名工作人员到这个农场帮助果园收苹果，想不到当劳动结束时，警卫队竟要他们排成纵队，然后逐一进行搜身。最后搜到尼古拉，尼古拉不服从他们的命令，就被他们推进狗棚，叫一条没有拴住的丹麦种短毛大猛狗在他面前跑动，进行威吓，还被摔倒在地，毒打一顿。以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国营”农场，豢养一群恶狗，用希特勒法西斯的手段来对付到农场劳动的人们。光是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修叛徒集团，背叛列宁的事业，已经堕落到何种程度！

苏修叛徒集团这样凶狠地整老百姓还觉得不够。《农村需要法学家》这篇文章甚至给人们发出信号：要更广泛地运用法律的力量来加强对苏联农民的法西斯专政。据这篇文章说，“农村法学家的的工作范围广阔而包罗万象”，“法学家常常帮助根除盗窃、破坏集体和国家财物的行为，监督在农庄和农场里遵守劳动法的情况”。文章举了一个州的材料：一九七一年没有农村

法学家的時候，農業單位僅收到罰款六千盧布，後來配備了農村法學家，一九七四年就收到罰款一百萬盧布以上，短短三年，罰款增加了一百六十多倍，既整了老百姓，又發了一筆橫財，真是“卓有成效”。既然這種辦法這樣妙不可言，大力推行就是了。不，還有困難。文章作者抱怨說，因為農村法學家是一個整老百姓的“新事物”，目前正在“探索”怎樣剝削壓迫農民的“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所以有些領導人還“不理解法學家的作用”，“低估其工作”。作者最後大聲疾呼：“在农村，法学家还太少。”

策劃進一步加強法西斯專政的頭子是勃列日涅夫。他在“二十五大”的報告中，就大肆叫嚷什麼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呀，什麼“改進對經濟活動的法律調整”呀，什麼“出版蘇維埃國家法典的時刻已經到來”呀，什麼要“不斷注意完善民警、檢察機關、法院、司法機構的工作”呀，等等，等等。勃列日涅夫還凶相畢露地說，“必須充分利用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手段”，包括“法律力量”，同蘇聯人民作鬥爭，說這樣做“將有助於提高我們整個法律秩序的穩定性”。一個“穩定性”，就洩露了天機。所謂法律，原來是“穩定”蘇修叛徒集團反動統治秩序的，是“穩定”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的，是保護以勃列日涅夫為頭子的大官們欺壓老百姓的。

在蘇聯廣大農村，目前的情況正是這樣。例如，以基洛夫州消費合作聯合社區間供應站站長格蘭金為首的那個盜竊集團，盜竊和侵佔了價值八萬九千盧布的商品，但是，這個州的反盜竊社會主義財產和投機行為局和民警局對格蘭金一伙盜竊犯根本不聞不問，相反，卻傳訊了揭發盜竊集團罪行的公民，要他們交代寫揭發信的動機和背景。還有，靠養狗咬人的“列寧國營農場”場長里亞勃采夫，對警衛隊隊長米朗諾夫的工作也極為欣賞，他說如果沒有狗，農場的利潤“連一半也保不住”，因而給了

警卫队十五万卢布的报酬；至于那个因参加劳动而被狗咬人打的尼古拉，当然只好自认晦气了。苏修叛徒集团的所谓“法律”，倒底是保护谁，镇压谁，不是一清二楚的吗？！什么“农村法学家”？对苏联劳动农民来说，农村法学家只不过是丹麦种短毛大猛狗和格兰金、里亚勃采夫、米朗诺夫这群恶狗以外的又一种凶狗。他们统统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走狗。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统治下，苏联农村是暗无天日的农村，苏联人民是苦难深重的人民，他们的斗争是非常艰苦的。这更使我们体会到正在我国开展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多么必要！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反攻倒算搞得很凶。在右倾翻案风刮得厉害的少数几个地方，走资派弹冠相庆，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挨整受压。不难设想，如果让他的阴谋一旦得逞，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就会吃苏联人民现在正在吃的苦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农村需要法学家

〔苏〕B·格列博夫

A·盖尔特^①

编者按：本文竭力鼓吹农村法学家的重要性，从这里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复辟后的苏联农村，处处都是一片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那批所谓农村法学家，则是苏修法西斯专政的打手。

我们面前有数十件由在农村执行任务的法律部门要求审理的诉讼案。举一件为例：据说由于卸货时车辆的耽搁，在契尔努申区生产肉类和禽蛋的庄际联合企业的帐单上损失了一万多卢布。企业的处境尴尬：这一切都发生在支付工人工资的前夕。综合体的领导人企图消除误会和“心平气和”地解决与铁路部门的冲突的努力毫无结果。于是，区农业局的法律顾问出面干预。他对铁路员工们提出诉讼，并能够证明，罚款是非法的。因为驶往不拥有专线的农庄、农场和其他农业单位的车辆是由运输部门本身的工作人员负责卸货的。根据人民法庭的判决，钱归还给了庄际联合企业。

目前所有的区都设立了庄际和场际法律工作组，而州农业生产管理局设有法律工作处。

^① 作者一个是苏联彼尔姆州执委会司法处副处长，一个是州的首席法律顾问。——译者

农村法学家的工作范围广阔而包罗万象。

在农庄和农场里，“清除”债务人的欠款是农村法学家的主要任务之一。许多法律顾问当上了区农业局平衡委员会的成员，这使他们能够对农业单位的经济起积极的作用。

农村法学家在执行任务时，同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会计密切合作。这些联系是极其有益的。例如，一九七一年农业单位仅收到欠款六千卢布，而去年则收到一百万卢布以上。要知道，这笔如此可观的款子，说实在话，是由数目多寡不一、在农业单位里早就认为没有希望收到的欠款汇成的。这仅仅是一个州的情况。如果再援引几个州的例子，情况将会如何呢？根据俄罗斯联邦司法部情况通报的报道，在法律顾问的帮助下，非黑土地带的农庄在一九七四年收到的罚款达一千三百多万卢布。

更为突出的是，法学家不用诉诸法庭就工作得卓有成效。去年春天，“卡马”木材流送托拉斯的奥辛伐木场临时利用昆古尔区“伯尔明”集体农庄的场地。木材流送完毕后，场地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伐木场不肯清理场地。于是法律顾问P·加利亚莫夫收集了必要的文件，然后以农庄的名义要求托拉斯赔偿二十万卢布。伐木场只得自己清理场地了。

法学家常常帮助根除盗窃、破坏集体和国家财物的行为，监督在农庄和农场里遵守劳动法的情况。例如，伊里英区的“华西里耶夫斯基”农场对畜产品生产监督不严，产乳量登记得马马虎虎，不测定牛奶的含脂率。当地的乳制品厂多次拒绝接受农场的产品，但是这一情况却没有正式记录。各项工作的单据开得不合规定，因而农场工资基金超支了二万五千卢布。仅仅由于法律顾问的果敢的干预，这种浪费行为才得以制止。

农村中的法律部门是一个新事物，目前正在探索最有效的

工作方法，然而这一切并非完全取决于法律顾问本人。这里就有一个例子：不久前，在察斯金区，因为建筑单位没有按时移交牛栏，法律顾问B·绍赫林提出诉讼，要求课以违约金四万二千卢布。然而，区农业局局长P·弗里克从法院撤回这份材料，并不准提出类似的诉讼。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导致的结果是，建筑安装局将远未竣工的综合养猪场移交给“先进分子”集体农庄。法律顾问的处境如何呢？一方面，付给他工资的农庄领导人坚持要维护农庄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区农业局局长所持的不法立场而无法履行这一职责。这种立场不仅使国家纪律松弛，还有损于法律顾问的威信。

遗憾的是，象这类不理解法学家的作用和低估其工作的事情经常可以碰到。

同样重要的是干部问题，在农村，法学家还太少。在农业部长的命令里规定：一个法学家服务的农业单位不得超过六个。然而今天有许多法律顾问要“伺候”十多个农庄和农场，这极大地降低了他们的工作质量。实践表明，把农庄用以雇用法律顾问的合股基金集中于区农业局，往往不能促进法律工作的加强。有些地方竟然用这笔基金任意雇人，只是不雇法学家。因此最好把全部合股基金集中于州农业局。

农村的法律工作自有其特殊之处。法学家除了通晓法律学的基础知识外，还必须掌握同农业生产，首先是同农业经济有关的综合知识。目前法学院还没有着手培养这样的专家。因此我们建议，俄罗斯联邦的高等和中专教育部应该认真考虑，对分配到农庄和农场去工作的毕业生进行专业训练。

随着农村法律业务的发展，正在出现新型的法律工作，这就要求不断提高法学家的业务水平。然而，萨拉托夫农学院现有的课程不符合必不可少的要求。教学大纲因堆砌着一般理论问

题而烦琐不堪，对农村中法律顾问工作的方法和先进经验的交流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看来应该重视出版关于在农业方面进行法律工作的专门书籍。

在农村里，法学家已成为象农艺师、经济专家、兽医和机械师一样必不可少的专家了。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苏联《真理报》 上海市
房屋材料储运站青年工人张祖谦译）

引起纠纷的苹果

〔苏〕B·科瓦列夫斯基

编者按：本文主角米朗诺夫，完全是苏联农村特权阶级的看家狗。

苹果园在平静如镜的池塘后面。这个受到人们精心照管的巨大果园，占地近一千公顷。

我跟警卫队队长伊·米朗诺夫一起到果园去。米朗诺夫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神秘的人。关于他的情况，我只知道他住在莫斯科，而果园里的工作则是他的兼职。

在汽车里，伊·米朗诺夫以主人的身份坐在司机的旁边。他的眼神疲乏，略略露出不安的神情，声音镇定而又自信。

“你们对我们发生兴趣，这使我感到高兴。”他说，“报纸上的广告是最好的广告。”

“难道您需要广告？”

“那当然，”米朗诺夫回答，“我们还拍了一部关于我们的狗的电影哩……”

米朗诺夫靠在吱吱作响的座椅背上，用细细的手指划着一根火柴，很快就把自己裹在一缕轻盈透明的烟云之中。

“请您想象一下：我们到某一个农场去，表示愿意为他们服务。场长听得津津有味，但是，他对我们的狗不大放心：它们不会把谁咬伤吧？那时我就说：‘劳驾，把灯关了。注意，现在放映

电影！’十五分钟以后，一份签了字的合同已经在我的口袋里了。哟，我们到了……”

我们走向一座长长的、用未经刨平的木板钉成的兽棚，隐约可以听到那里有汪汪的叫声。一些名种的丹麦狗、哈叭狗、牧羊狗、狹狗的眼睛在昏暗中闪闪发光，这些狗曾在各种展览会和博览会上赢得优胜奖和荣誉奖，现在却被关在很挤的窝棚里。

“不可惜吗？”我朝着板棚那边把头一扭向他示意，可是米朗诺夫扬起眉毛，似乎感到惊奇。

“把这样的狗关在这样的笼子里，不可惜吗？”我把要问的意思重复了一遍。

“原来您说的是这个。”米朗诺夫发出不自然的笑声，“为公嘛，为公嘛……”

米朗诺夫的妻子加利娅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用“安东诺夫卡”苹果喂一匹枣红马。她一边挑选比较熟的苹果喂马，一边把坏的扔在一旁。寂静中只听见清脆的马嚼苹果的响声。

“您对我的本职工作的地点感兴趣是吗？”米朗诺夫把我们在办公室里就开了头的谈话继续下去。

我肯定地说：“是的。”同时不由自主地注意到：那匹马已经吃了十来个苹果。

他说：“是这样的，具体地点我不能告诉您。您只要知道我是莫斯科某研究所的研究员就行了。”

“您既要从事科学活动，又兼警卫工作，不是太辛苦了吗？”

“一点儿也不。在果园里工作，这是我的业余爱好。再说……这里有非常丰富的材料供我写学位论文。自动化控制系统与警卫工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没有人研究过类似的课题哩。”

使我去找米朗诺夫的原因是苹果园里发生了又一次非常事

件。前一天，警卫队里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把莫斯科林业管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尼古拉痛打了一顿。这个管理局与列宁国营农场挂钩，经常支援后者。最近，农场向他们求助（“请来帮助我们收苹果吧”），就有五十个人兴冲冲地前往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当义务劳动结束时，突然要那些前来支援的同志履行一道极不体面的手续：要他们排成纵队，然后放肆地逐一进行搜身，把这五十个同志弄得目瞪口呆。尼古拉是最后一个被搜身的。当一个警卫队女队员加利娅·莫沙科娃命令他：“把苹果抖出来！”时，尼古拉把一只皮包放在她面前（里面除了衣服，什么也没有），便走向汽车。

在警卫工作期间，那些姑娘已经习惯于别人对她们毕恭毕敬，唯命是从。有时候，一些彪形大汉也会恳求她们不要把狗放出来。而姑娘们偏要摆出一副架势，好象要解开狗的脖套，然后看着人家吓得张口结舌的样子，自己却哈哈大笑，把眼泪也笑出来了……

这一回，加利娅·莫沙科娃是头一次遇到有人不服从她的命令。她大声叫喊小伙子们，小伙子们立刻来到。“他想用皮包打我！”加利娅指着尼古拉说。于是，把尼古拉从汽车上叫下来，将他往狗棚又推又搯。那里，有一条没有拴住的丹麦种短毛大猛狗在来回跑动。林业局的同志们嚷了起来，纷纷赶去营救自己的伙伴，但是，警卫队嗾使一群狗把他们挡了回去，而把尼古拉拖到板棚后面摔倒在地……

伊戈尔·米朗诺夫那时并不在场，不过，当我去走访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了。

“我不允许任何人损害我的人的尊严。这是第一点，”他说。“第二点，您想必知道有所谓的生产费用这么回事。就拿类似的冲突来说吧，那正是这样的费用。不付出这样的代价是不行

的。”

“冲突的结果如何？”

“有各种各样。有时候也咬上几口。”

“狗咬人？！”

“不是咬人，是咬破坏者。”米朗诺夫略带一点儿着恼的口气纠正我的说法，“凡私自进入果园的人就是破坏者，就可能是贼。”

“这么说，你们有权放狗去咬任何破坏者喽？”

他缓了一口气：“不，不是任何破坏者，除非是向警卫队进行袭击的破坏者。”

这时，我掏出笔记本，把摘自向全农场发布的命令中的一段念给他听：

警卫队员С·卡恰洛夫和Г·马特维耶柯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用警卫犬扣留公民，结果使人们的肉体受到严重损伤。我命令：对С·卡恰洛夫和Г·马特维耶柯给予警告处分，并取消他们的奖金。

场长 彼·里亚勃采夫

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认真地听完后，毫不在乎地说：“这道命令等于废纸。场长只是为了保住自己，意思就是说：已经采取了措施，对肇事者已经给予处分。”

然后他想了想，又补充道：

“您对人的心理不够了解。要记住：戴上嘴套的狗已经不成其为狗了。它吓唬不了任何人。咬人的狗——这才是我的拿手好戏！”

那末，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究竟是何许人呢？

在列宁国营农场的人事科长А·耶德里科娃那儿，关于米朗诺夫的材料一点儿也没有。人事科长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抱

怨说：“他老是说要从本职工作单位开个证明来，可是始终没拿来。里亚勃采夫说：‘就让他没有证明在这儿工作吧’。”

读者可以看到，是米朗诺夫自己迫使我通过民警局才找到他的家……

……开门的是加利娅，我没有马上认出她来：她穿着非常讲究的连衫长裙，一点儿也不象用“安东诺夫卡”漫不经心地喂马的那个自信而又傲慢的加利娅。

我看到各种各样小巧的飞机模型差不多摆满了房间的一面墙壁，心想：“很清楚，他确实是个飞机设计师。”

“这些都是玩具飞机，”加利娅发现了我好奇的神情，就说，“这些玩意儿是伊戈尔平时收集的。”

“加里娅，请问，”我转换了话题，“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在哪儿工作？”

“您明明知道。在国营农场。”

“我指的是他的本职工作。”

她看看我的笔记本，回答道：

“伊戈尔以前在建筑工程函授学院教书。可是在那儿他总觉得格格不入。现在他是莫斯科一个研究所的研究生。”

“据他自己介绍是研究员。”

“不，伊戈尔还是个研究生。”

我就到研究所去。我急于知道，这位研究生兼警卫者的学位论文写得怎样了。

米朗诺夫的科学指导人埃拉·伊万诺夫娜·萨方诺娃听我说明来意后，脸色变得苍白，带着并非做作的惊讶表情说：

“太可怕了！简直是讹诈！怪不得有一次他到我家里作客的时候，对我们没有兴趣养狗表示遗憾。”

“他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挺奇怪的，”她继续说，“您想想，他至

今连必修课程的考试都还没有通过！总之，一年来他根本什么也没有干。夏天一开始，他忽然不知哪儿去了。不久前才又出现，原来他病了。但是，即使是生病也不能解释他为什么不认真对待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这个课题是不是《自动化控制系统与警卫工作》？”

“什么警卫工作？”埃拉·伊万诺夫娜莫名其妙。

所谓“学位论文”的说法破产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研究生米朗诺夫追求的目标完全不是学位（埃拉·伊万诺夫娜恍然大悟地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他需要研究生的身份！”）是的，他需要空余的时间“经营果园里的业务”。

这样，只剩下一个业余爱好了……

“业余爱好？”列宁国营农场的财务科长H·格鲁季宁绷着脸说，“米朗诺夫一个队到收获季节结束时可以得到大约十五万卢布……”

我本想请财务科长算一下，“警卫队每个人”的平均工资，但是……竟然谁也不知道农场里共有多少警卫队员。钱是由米朗诺夫根据他自己订的“工分制度”分的。还得注意到，米朗诺夫的妻子和岳母也在警卫队里，而在比邻的一个农场里还有他的一个“分队”在担任警卫工作……苹果园给予这名科学的逃兵待遇可不坏啊！

然而，事情怪就怪在这里：场长彼·里亚勃采夫极有把握地对我说，今年农场从浆果和苹果获得的利润将达五百万卢布。这是任何时候都没有过的！不错，今年是个大年，收成好，但是（彼得·齐诺维叶维奇着重强调了那个“但是”），“您要知道，没有狗，连一半也保不住……”

如此说来，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苹果园里有盗窃行为……场长的意思可不可以理解呢？可以理解的。他

从一个口袋里掏出十五万卢布，而在另一个口袋里放进了整整五百万卢布。对国家有利吗？有利。是谁帮了忙呢？米朗诺夫。既然如此，那末请问，为什么要骂他？究竟哪个好：一个不用功的研究生好，还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称职的警卫者好？

好吧，要概括我们就来概括。先撇开苹果园不谈，说老实话：“拿东西”的现象不仅这儿有。甚至连办公室的回形针，车间里三戈比一枚的螺帽也有人“拿”。倒不是因为需要才“拿”，而是这些东西没有放好。既然问题存在，难道真的要借助于米朗诺夫之流，用他们的办法、他们的“法律”来求得解决吗？难道就应该说：“我们太客气了，老是怕违法乱纪”，是吗？

但是，我们的法律维护的不仅是国家财富。法律实行公正的惩罚，但法律也坚定不移地保护个人不受丝毫不公平的待遇。这正是我们的法律的力量所在。

农场场长彼·里亚勃采夫从他的办公桌里拿出一张已经很皱了的纸，我看到上面写着：

警卫队在其职责范围内拘留闲人和破坏者时，如因必须采取行动而使拘留者遭致咬伤，警卫队概不负责……

放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刑事法典的条文，而是农场场部与有学问的警卫者兼养狗专家签订的合同中的一项内容。

我翻了翻这些年轻的养狗专家的劳动手册。一个是万能车床的车工，一个是机床工人，一个是五级冲压工，有一个本来是大学生……这些年轻人中间还有共青团员，但是，他们的组织关系在哪儿，农场的共青团组织却不知道……

是什么促使他们抛弃学业，撂下本职工作来当警卫员呢？整个夏季，有上百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呆在苹果旁边守卫别人的劳动果实。

那些不怀好意溜进苹果园的人贪图的是“垂手可得的苹果”，而警卫队员们贪图的则是“垂手可得的卢布”和举止行动的完全自由。

……苹果园里空荡荡，狗和它们的主人回到过冬的住处去了。学位论文仍然没有写出来。但是，米朗诺夫倾向于认为，“研究生必修课程的考试”已经顺利通过。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朱文娥译）

厄尔布鲁士山下的烤羊肉

〔苏〕И·拉赫诺

徒步旅行有一个毋庸置疑的优点，是乘车所及不上的。你可以尝试一下，抵达捷别尔达后，不去赶长途汽车，而是背上旅行包，轻松地 toward 多姆鲍伊进发。美丽的处女地上的雄伟的山峰，能使你百看不厌，心旷神怡。当你听到欢腾的舒姆卡小溪的潺潺流水声时，一股令人垂涎的烤羊肉的香味突然扑鼻而来，诱使你离开大路走向那密林深处。对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说，这种强大诱惑力是无法抗拒的，在到达多姆鲍伊之前，你别想找着一家食堂或小饭馆。

……羊肉铺犹如神话般地出现在禁伐林中绿草如茵的草地上。你还没来得及取下讨厌的旅行包，殷勤的烤羊肉者已把一根一米左右长、上面串着一块块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烤羊肉的铁签塞到你手里了。啊，这烤羊肉太好吃啦！简直是梦想不到的好东西！连款待的高昂价格也不去计较了。

吃后，你总会把烤羊肉者魔术师般的手艺赞美一番。回答你的话说得又急又快：

“亲爱的，给你吃的利勃日耶夫烤羊肉可不是一般的羊肉。山地的小绵羊！在厄尔布鲁士山下养大的小绵羊！”

……有两个人来到了厄尔布鲁士山下。他们向一个神气十足地坐在花岗岩上的中年人走去。

“阿斯拉·穆萨·别克，利勃日耶夫村长的儿子，”山地的主

人傲慢地自我介绍道。“就叫我穆萨吧，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牧羊人，亲爱的穆萨·别克。来找工作的。听说这儿需要牧人。”

“不错，看见吗？我脚边就有着一大群羊，这是集体农庄里最好的羊群！另外还有一群是卡拉恰伊山区最好的羊！然而，一个牧人总不能同时看管两大群羊，就象不能同时骑在两匹马上疾驰一样。因此，我准备把自己的最好的羊群让你们来放。”

“报酬多少？”两个人中比较年轻的卡兹别克问。阿斯兰打断了他的话：

“哦，我是山地最好的牧人，从集体农庄所得不过一百五十卢布。你们每人每月拿二百卢布吧。好在你们还没长胡子，又不用掏钱抚养子女。我来办理合同，钱就在我这儿领。”

“这样做合法吗？”

“瞧你说的，好一个守法的人！”穆萨打断了他的话。“那么，你去放集体农庄那些长疥的羊吧……”

“何必说那么多呢，亲爱的阿斯兰·别克，”年岁较大的外来人插话道，“这是我的羊鞭，你的羊群在哪儿？”

在“主人”的严密监视下，两个新手逐渐熟悉了高山草地。利勃日耶夫决定由卡兹别克一个人去放牧，而岁数较大的一个，则赶了十二头肥壮的阉割过的绵羊前往旅行者必经之路，去筹备上述的烤羊肉铺了。

这是谁的绵羊呢？集体农庄的吗？错了。

“如果我拿了集体的一小束羊毛，就让我的双手烂掉吧！”有一次，喝醉酒的阿斯兰情不自禁地这样说道。

这是实话。烤羊肉铺的羊是他阿斯兰·别克的私人财产，每个熟悉利勃日耶夫的山里人都这样说。

有时，一件纯粹偶然的事会使一个人毁灭。真想不到人民

检查员恰巧碰上了由卡兹别克放牧的利勃日耶夫的羊群。

“胡狼真走运，竟把它的猎获物给抢走了。”穆萨伤心地说。

不仅在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山谷里，而且在卡尔梅克牧羊区的辽阔草原上，也在猎取象烤羊肉和优等细羊毛这样的猎获物。当检查员稍许指责一个机灵的放牧人，说他私自出售的羊毛和绵羊过多时，后者就朝草原的方向把手一挥，说：“那边有我自己的羊群呢。”这位精明的牧羊人共有一百三十二头羊。

查明情况后，检查员认为“太多了一点”，但未再干涉，因为他们忙得很，还有两三个放牧点需要去检查，那儿也发现了同样的迹象。因而他们就没有注意，放牧人手中集体农庄的母羊没有一头是一胎生三只羊羔的，而私人的三十二只母羊却产了一百只小羊羔。

的确，他拥有的已不是一个羊群，而是一大群羊，每年的收入达到五千卢布。牧羊人同国家收购站进行着合法贸易，所以他高枕无忧。而且，不成问题地还应该受到奖励，因为他的每只羊能产六公斤优等细羊毛。一百三十二只就是七百九十二公斤。至少可以织三百九十六件高质量的毛线衣呀！

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图尔克萨特”国营农场，吉兹布雷·布拉托夫的放牧队里有不纳入计划的绵羊六百只。农场领导建议妥善地解决这件事情，一心想把这些羊按国家收购价格买下来。然而布拉托夫可不是个缺心眼的人，他才不愿意廉价出售自己的优种细毛羊呢。

当农场还在议论如何处理这件极其慎重的事时，布拉托夫的羊大大减少了。最后，农场果断地没收了剩下的一百四十只绵羊，并要牧羊人赔偿“他的”羊群一年内所吃掉的集体农庄的饲料。

“救命啊，抢劫啦！”布拉托夫号叫起来。

涅弗特库姆区人民法院听到了他的号叫声，急忙赶来帮助“遇难者”。法院的决定是明确的：必须把羊还给“合法的”所有者——布拉托夫；或者付钱给他，但不是按国家收购价格，而是按市场价格。

布拉托夫的伙伴马戈麦德·马戈麦多夫、阿勃陀拉·古谢伊诺夫等人听说检察长对法院的决定提出了异议，不知结果如何；于是，他们便认为现在应该明智地、主动地……不，不是去认罪，而是把“自己的”羊群按照已定的收购价格卖给农场。这样，“图尔克萨特”国营农场的纯种羊便一下子增加到了二千七百只。

春天，在皮亚季戈尔斯克市附近的涅兹洛勃诺伊，瘟疫侵袭了当地的家禽。兽医忙得疲乏不堪。这是闹着玩的吗？要注射三万多次！仅库兹玛大爷家的鸡忙一天还应付不了。因为他有七百只左右生蛋母鸡，一百五十只火鸡和鹅。

这是怎么搞的呢？原来私人养家禽的数量没有限制。愿意养多少就可以养多少。反正目前是供不应求。附近有个疗养区，那里有许多爱吃鸡的人，即使是非常瘦小的鸡也很受欢迎。

（摘译自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苏联《真理报》
复旦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于桂林译）

井 旁

〔苏〕И·诺沃普梁斯基

以下是米丘林农场的来信：

“亲爱的编辑部！池塘村原来属于集体农庄，而现在属于国营农场。村庄取名于我们前辈挖的池塘。在建庄的最初几年里，他们拿着铁锹，套上马，在这里挖了几个简单的池塘和一口二十米深的井。这些池塘成了村庄美丽的点缀。但是，一九六五年塘坝倒塌了，水流失了。怎样修复呢？农场有现代化的机器。于是，村里多次请求援助，但毫无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池塘村居民便每户出十个卢布，费了很多周折，雇了一台推土机清理、修复了一个小池塘。

但是，农场的牧畜群在增长着，要给它们饮水。这样，水就不够了。没几年，我们的池塘就完全干涸了。池塘干涸，井中也没水了。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于是，管理处安排了拖拉机运水。夏天，好歹运来了水。可是一到冬天，就不得不从雪中取水了。全村人实在吃足了苦头。然而，要保证供应池塘村村民用水和农场牲畜的饮水，应该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只要在春天派一台推土机，花几天时间修一条牢固的水沟就可以了。这样，池塘就能获得新生，井中也能有水了……”

现在，塘底杂草丛生，塘边是一些孤伶伶的小屋。几十年来，这儿的塘水哗哗作响，人们在塘中洗澡，洗衣服，钓鲫鱼。而现在呢？一片干土。于是，人们在窗下准备了积水用的空器皿，

大桶,小桶,生了锈的自卸卡车的车身。说好运来的水,三、四天都不能运到,有时要等更长的时间。当拖拉机手把大家望眼欲穿的水运来时,有的人给他三个卢布,有的给五个卢布,有的请他吃饭。要知道,一切要看他的高兴。如果他不高兴的话,甚至要请你等上一个星期。

全村的居民早就在为水奔忙了。一九七三年一月,村苏维埃在一封信中指出:“二十五户七十个人的池塘村,年复一年地受着饮水困难的煎熬。现在,井已经完全干涸了……。”在这些信之后,自然,区、农场还不断接到恳切的请求,希望采取措施。

这一切与其说是贫困造成的,倒不如说是富裕和浪费造成的。农场每年的纯利润是四十到五十万卢布,今年预计有一百万卢布。这样的单位早就能用最合理、最经济的办法来解决水的问题了。但是,没有经过仔细考虑,却开始用拖拉机运起水来了。年复一年地往过去有水,现在也应该有水的池塘村运水,难道不是浪费吗?村里的一个大池塘本来能够供应农田和牧场用水,可就是拖了十年不去修复它,难道这情有可原吗?农场领导至今没检查过地槽和堤坝,也没派土壤改良专家来看看,没考虑怎样更好地使池塘复生。老住户们一致认为:池塘一旦修复,很快就能收回全部费用。

不仅农场需要池塘,而且池塘还能使村庄凉爽宜人,绿草如茵,具有一种独特的诗意的美。池塘村的几封来信都表达了村民要恢复这一迷人景色的愿望。当然,最紧急的还是饮水问题。离开水,人是一天都不能生存的。即使把运水的问题安排好,也不能摆脱缺水的困境。因为水的需要量大大超过运送能力。除此之外,起早摸黑干活的人们很少能“抓住”那台运水的拖拉机。要是天气不好,道路泥泞呢?代价就更高昂了!农场领导对饮水问题的争论,时起时落,不知有多少年了。这种争论,抱歉得

很，不禁使人想起那种毫无意义的、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井旁闲谈。

农场场长奥列索夫列举了各种解决方法。根据他的意见，最好是用自来水。场长说：“如果允许自来水管跨越铁路路基的话，农场马上把自来水干线延伸到池塘村。”为什么不见行动呢？问题只在于许可。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铁路当局给村苏维埃的答复说：“一旦施工图纸绘制完毕并经审核批准，将允许你们跨越铁路路基接自来水干线。”那以后已过去将近一年半了，但是施工图纸却还没开始绘制。一向以精力充沛、精明强干自夸的场长，在这时却如此消极了。所有的解决方法实际上都被借口特殊情况、客观原因而一笔勾销了。区领导对此是默认的。

如果说，过去几年区里确实不能解决的话，那末，就应该如实地汇报所遇到的困难，州里无疑是能够解决的。但是，区党委书记克柳奇科夫、叶戈罗夫、区执行委员会主席科斯佳科夫却不好意思提这一伤脑筋的事实，似乎没有必要汇报那些正当的要求，没有必要汇报那些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情绪的事实。农场属于州果品加工工业托拉斯，说实在的，我本来预料托拉斯的领导一定会回答说：“我们知道了，知道了，会采取措施的。”哪知道，他们看到池塘村的来信，却感到很惊讶。

对于这一切，还有着各种各样的辩白。在区中心，有人意味深长地提醒道：池塘村是没有——前途——的村庄。的确，有些村将扩大、发展，而另一些小的村将淘汰。这是合乎规律的。但要懂得，关心人们，关心他们的居住、生活、休息不应取决于他们居住在哪里。否则，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在有“前途”的村庄里有商店、电影院、自来水。在其它村庄居住的也同样是人，但是这一切却都没有。对于他们的要求，经常置之不理，借故推托。比如，我曾经到过萨拉托夫卡村。根据当地的条件，它不算是一个

很小的村庄；有三十二户人家。那儿的一口井完全不能用，另一口井快要干涸，因而饮用的水就不够了。有一个池塘由于长久没有清理而干涸了，另一个也受到了威胁。然而，在池塘村、萨拉托夫卡村和其它没有“前途”的村庄里，现在居住着农场的一半居民。若是不把这些村庄迁走的话，它们还将一直在这儿。当然，如果现在要为池塘村铺上柏油马路或者建造文化宫，那是不现实的。但怎么能把他们的井扔掉，池塘抛弃呢？一个好的池塘过几十年也是有用的，它将永远点缀着家乡，它是作业区、生产队、田间宿营地的幸福和自豪。

人的生活和家庭问题是非同小可的。这完全不是琐事，一切都涉及到重大的原则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忽视池塘村来信所讲事实的道理。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苏联《真理报》 复旦
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范毓民、王雪荣、张惠珠译）

外高加索的土地资源

〔苏〕И·霍赫洛夫

С·杰米陀夫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理和节约地使用土地资源。这对外高加索各地区来说十分重要，因为这些地区的特征是，按人口计算，它们的土地资源比其他加盟共和国少。但正是在外高加索这儿，由于某些地方对土地经营不善，有较大面积的沃土正在变成盐碱地、沼泽地，土壤受到侵蚀或起着其他不良的变化。结果，这些土地的土质变坏，不再适合作农业用地。例如，由于土地受到侵蚀，阿塞拜疆每年约有四千八百万吨沃土流失。只要想一想这个共和国有三百三十万公顷的土地受到侵蚀，就不难算出土壤侵蚀对阿塞拜疆的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

不合理地占用原来的耕地、多年生果林、饲料地以供建造城市、工人村、工业工程、公路和架设输电线路之用，这也是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土地资源减少的原因。

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外高加索的农业用地和耕地面积正在不断减少，而这两者在外高加索土地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本来就不大，各占百分之四十五和百分之十三点六。与一九五〇年相比，一九七三年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农业用地的面积减少九十六万一千九百公顷，即减少百分之九点八，耕地减少六十七万六千四百公顷，即减少百分之二十二。格鲁吉亚的耕

地面积锐减。该共和国一九七三年的耕地面积比一九五〇年减少四十八万六千四百公顷，即减少百分之四十一。一。

如果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以上述速度减少各农庄和农场的农业用地，而人口的增长又保持现有的速度；那末，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地区的食品供应就可能发生困难。各农庄和农场毫无理由地减少农业用地的现象必须中止。同时，应该更为合理地利用适合农用的土地，努力把沼泽地、盐碱地、灌木丛生地、荒地和其他土地变为农业用地。

根据外高加索各共和国农业部的资料，在一九七三年，上述一类的土地面积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共计九百六十万公顷，即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二，其中受侵蚀地八百二十万公顷，灌木丛生地六十万公顷，盐碱地四十万公顷，荒地三十万公顷，沼泽地十万公顷。此外，在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的土地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山地、山麓地带或其他不适合农业用的高地。由于缺乏特种农机和其他生产工具，上述土地目前利用率极低。今后山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将有可能使耕地面积大大扩展。

为了阻止土质变劣和迅速减少土地资源的损耗，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保护已开垦的土地，特别是灌溉区的播种地，使它们的生产率获得根本的转变和提高。下列事实说明了这样做的必要性：根据一九七四年的资料，占外高加索各共和国各种耕地总面积百分之六十八的灌溉地，已有一半左右在某种程度上盐碱化，从而需要采取改良土壤的补充措施。

土壤经过改良的土地在迅速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格鲁吉亚，正在解决排干科尔希达低地的大问题。这个低地是茶叶、蔬菜、柑桔类植物和其他农产品的独一无二的天然产区。目前科尔希达低地已有八万四千公顷土地排干，占其全部沼泽地的百分之四十。

排干科尔希达土地的过程应该同对它的有效利用结合起来。但正是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缺点。问题在于：对土地采取技术改造措施和开发新的排干地为农业用地这两者之间缺乏严密的制度。结果，排干地区的农业生产计划每年都完不成。按照计划，科尔希达的排干地区每年的总产值应为一亿九千万卢布，而实际的产值仅三千七百五十万卢布。每公顷经过改良的土地的产值不超过四百四十七卢布，这就是说，差不多只有原定计划的六分之一。

彻底重订开垦科尔希达的整个制度，把制度建立在综合科学的基础上，是合适的。巨额投资应该促进生产的集约化，使每一公顷土地获得最大限度的产量。

在用作农业生产的土地上，应该改进农业技术，增施矿物和有机肥料，完善灌溉技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各农庄和农场掌握和运用有科学根据的轮种制，并培植农作物的高产品种，这将促进耕地生产率的提高。在这方面，外高加索正在进行一定的工作。然而，许多农庄和农场还迟迟不能掌握轮种制。

为了提高使用土地资源的效率，极有必要消灭葡萄园出苗过稀的现象。这一类葡萄园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平均约占百分之三十五。根据初步预计，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的农庄和农场如果消灭葡萄园出苗过稀的现象，那末，它们就能每年至少多收三十万吨葡萄。

详细编制土地册是合理地使用和保护土地的重要前提之一。目前已拟定了基本的方法论上的前提。但是，制订土地册中的许多实际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因此，有必要着眼于以复杂的地形和变化无常的气候（这造成土壤的多样性）为其特征的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的特殊条件，采取具体措施，对土地进行鉴定，对农业用地实行登记制，在农庄、农场内部制订耕地规划和对土

地进行经济上的估价——这是编制土地册的组成部分。

在编制土地册的同时，还有必要对土地进行计价。按照我们的看法，根据各部门内部和各部门之间使用土地的设想，对土地进行计价是合适的。这样做，一方面能消除各农庄和农场不经济地使用土地资源的现象，对农业经营活动进行客观分析；另一方面，还能在把适合农业用的土地划给非农业部门使用时起重大作用。对土地进行计价，就使工业和其他企业不得不对划给它们的土地承担一定的费用。

目前，外高加索各共和国正在进行一定的工作以改进农业用地的经营，加强对遵守土地法的检查，消除把土地过多地划给非农业部门的现象。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还刚开始。必须特别注意大规模地开展使变劣土地重新恢复肥力的工作，并拟定有效地使用这一类土地的措施。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第八期苏联《农业经济》杂志 朱文娥译）

无论做什么都行

〔苏〕O·佩特罗娃

“……只要住在城里就行。”普斯科夫州锡戈里查村的安娜大婶就是这样决定她儿子将来的工作问题的。

“列宁”集体农庄主席和党小组长在讲此事时，不止一次地说到“安娜大婶”、“安娜大婶”。这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妇女，一张黝黑的脸和一双晒黑的手，眉毛和睫毛由于太阳晒而变色了。她象当家人一样精力充沛地大步走着。安娜惊奇地打量了一下想同她谈谈的“莫斯科来的人”，然后把我请进了一间宽敞、凉快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只涂上白色的炉子，靠墙有几条长凳，还放着一架发亮的最新牌子的电唱收音两用机，不知怎的，它和屋内的摆设有些不协调。

最初的拘束马上就消失了，因为谈到了孩子们。你见到过对孩子们的事漠不关心的母亲吗？帕维尔和托利克的父亲是个机务员，可能由于这一点，也可能出于常有的、孩子对铁片和发动机的爱好，她的孩子从小就在拖拉机、康拜因和汽车旁边转。他们入迷地注视着司机的每个动作，自豪地坐在闷热的、充满泥土气味的驾驶室的皮革座位上，怀着好奇而又害怕的心情看着仪器的指针、操纵杆和脚踏板。最后，好奇心获胜了。今年春天，十岁的托利克代替父亲用圆盘耙耙地，两个星期后，他一本正经地请求父亲让他耕地。十四岁的大儿子帕维尔第一次到莫斯科的亲戚家去做客，他很欣赏陌生的大城市，但又感到莫名其妙；

为什么莫斯科的许多街道这样窄？在这里驾驶卡车是很困难的，而在普斯科夫那广阔的地方，就截然不同了。

大儿子，当然还有那个小儿子，对于将来做什么，都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仿佛这个问题已经理所当然地解决了，因为机务员在村里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是，唉，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孩子们将不会留在农村。不妨听一听他们的母亲是带着怎样热烈而坚强的信念谈论这件事的。她真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她说的话是不允许反驳的。人们从她每句话的语气中不难听出：这是最后的决定，任何理由也无法使它改变。是什么动机促使她作出这个决定的呢？

回答是出乎意料的：“我不愿别人把我的孩子们看成傻瓜，不愿全村人闲谈什么加夫里洛夫兄弟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显然是父母没有尽力帮助他们。我们这里甚至这样吓唬小孩：你不好好学习，只有到农庄去。”

客气点说，这是独特的逻辑。只要到城里去！既不是为了特别有趣的工作，甚至也不是为了城里舒适的条件，而是为了满足父母的虚荣心，为了某种莫名其妙的威望。为了使孩子们能成为象那些远亲近戚一样，每逢休息天乘着拥挤的公共汽车和“日古利”牌汽车从普斯科夫和列宁格勒到这里来游玩，因此，要给孩子们们在城里找个工作，不论什么工作都行，只要能在城里，既不考虑他们对家乡的留恋，也不考虑对工作的爱好，甚至也不考虑他们想和亲人生活在一起的愿望。

今年，在奥斯特罗夫市第一中学的毕业生中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时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小伙子们都不愿意到农村去工作？回答是千篇一律的：那里缺乏文化生活条件。看来这套说法掩盖了真正的理由。要知道，大部分来自农村的青年都在区中心奥斯特罗夫安家落户。但是，奥斯特罗夫在满足调

查中提出的这些要求方面能提供什么呢？它能提供的条件和大村庄一样。沿着这个小城的街道走一走，您所看到的是一些坚固的木垒墙和长满杂草的小院子里的柴垛，沿街的自来水龙头和屋顶上高高的电视天线架。奥斯特罗夫的大部分地方就是这样的。三家叫作俱乐部的影剧院，一个图书馆和吸引近郊男女青年的公园里的舞厅，这里算不上怎么繁华。图书馆、俱乐部、电影院，所有这一切在锡戈里查也有，村里人熟悉的电视天线大概要比奥斯特罗夫市里更密。

显然，一定要离开农村的真正理由，毕竟不是那一套社会学指标。在这方面起着巨大作用的是家庭“对城市的向往”，还有那古老的生活理想，希望获得侥幸的“成功”，争取个人的“飞黄腾达”。

是什么东西遮住了人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也不能正确评价明显的事实。劳动性质和生活条件根本改变了。安娜·斯捷潘诺夫娜自己也讲了这一点。可是，同时，她又带着由衷赞叹的口气谈起城里来的兴高采烈的客人们：“他们总是那样愉快，无忧无虑，显而易见，他们生活得很轻松。”她的论断之缺乏根据是那么明显，以致使人不好意思去反驳她了。

离开乡村的人们，并不是为了去寻找大城市热情的极乐鸟。但是，为什么那些在自己的家乡找到了自己爱好的工作和幸福的人也要离开呢？

“只要在城里，哪怕搬砖头也行……”“只要我的孩子和大伙一样，不比别人差……”对这种出于固执本能的没有根据的逻辑真是毫无办法。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

复旦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 余菊芬、戈培丽译）

六号售货亭

〔苏〕И·杰孟季叶娃

在太阳光下，我和女售货员塔兰佐娃坐在商店台阶上。妇女们在闲谈时管她叫达什卡，可能是由于习惯，也可能是出于对她的反感。她差不多已经是个老太婆了，态度和蔼可亲，说话细声细气。她白晰的脸庞上那对明亮的小眼睛，经常流露出温和而好奇的目光。要不是她的工作服弄得那么脏的话，准会被人看作是站在贴着拉丁药名的药品柜台后面的女药剂师。

玻璃门里面半明不暗，柜台看不清楚，它被许多箱子挡住了：左边堆着三十箱伏特加，右边是十箱“烈性苹果酒”。

“有柠檬水吗？”

“没有，没有柠檬水，”女售货员老实地回答道，“只要柠檬水一到，半个村子的孩子和妇女立刻都跑来了。男人可不喝柠檬水，他们爱喝伏特加。”

在丘尼科沃村，人们通常不说“喝酒”，而是说“去挂一笔账”。在温和的老太婆塔兰佐娃的柜台上放着一本漆布面的账簿。所有男人欠的账，如果不是整数的话，照例可以用三卢布六十二戈比或四卢布十二戈比除尽。除不尽的话，可以用一卢布十九戈比去除，这是“烈性苹果酒”的价钱。达丽娅·塔兰佐娃的手法非常简单，只要看下面的情况就知道。谁偶尔来喝“一份”酒——一百五十克伏特加，这还算不上顾客。但他喝了以后，还想继续喝，这时她就会拿着账簿出现在他的面前。

有一次，几个康拜因手把领奖证抵押在她那里，她收下了。她对那些有固定工资和奖金收入的殷实可靠的人是很尊重的。

可是也常有这样的事：男人欠了账，得问他的妻子去讨。她不敢马上就去讨，在挤奶员骑着自行车上班去的时候，她一会儿拦住这个，一会儿拦住那个，低着头哀声讨钱：

“这钱可不是我的，是公家的啊！”

挤奶员们避而不答，其中一个没好气地冷笑说：

“谁还，谁就是傻瓜。”

另一个接着说：

“你去问他的孩子要吧，问他的五个孩子……”

一星期后，她毕竟还是把安娜拦住了，向她讨二十四卢布。

“还欠你什么钱？”

“是瓦西里生前欠下的。”

“可惜，他没欠你二百卢布！”安娜大叫起来，“你连他下一辈子的债都讨清了。”

最后这笔债只得由瓦西里生前的几个好友分摊。

瓦西里死于伏特加。他约朋友一起到邻村弟弟那里去聚饮。夜里三点钟，弟弟叫他起来再喝一点醒醒酒，但他已停止呼吸了。的确，他经常狂饮无度，但他还只四十二岁，身体一直是很健康的。

关于这个瓦西里，人们还记得什么呢？在他上小学的时候，达丽娅·塔兰佐娃就已经在店里作买卖了。他在军队里服役过，后来当了机务员，起先拿现钱买酒喝，后来就赊账了。

老太婆一双柔软的手把男人们紧紧地抓住了，通过男人还控制住他们的妻子。她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她们奖励或惩罚。妇女们是丘尼科沃村真正忌酒的一部分居民，她们要求塔兰佐娃不要“大量地”把伏特加赊卖给她们的孩子和男人去聚饮。塔兰

佐娃似笑非笑地回答说：

“出售电视机可以分期收款，伏特加就不行吗？”

谁如果坚持要求，瘦小的塔兰佐娃就会说：你没法控告我。同时，这个最善良的塔兰佐娃乘机对她的丈夫挑唆说：

“你家里的来过了。她要管教你了。”

于是，执拗的妇女们往往很快受到了惩罚。丘尼科沃村所有不幸的家庭都有同样的不幸。

丘尼科沃村有一百六十户人家，最近，当地邮局证实：实际上只有一百五十户。村庄渐渐地荒芜了，村里的人渐渐地变老了；一百五十户人家就有一百五十人拿养老金。据队长说，在集体农庄里经常参加劳动的只有一百人：四十个男的，六十个女的。尽管近几年收入相当好，但青年人还是不断地离开。周围是一片肥沃的、黑油油的土地，村子很美，它坐落在枝叶纷披的绿荫中，还有两个池塘。

丘尼科沃村是“五一”集体农庄的作业队的所在地。在丘尼科沃村的四十个男人中，大多数是康拜因手、拖拉机手、饲养员和电焊工。他们中间有优秀的专家、门门内行的技术能手。

但是，许多家庭都是靠妻子，那些现代化农村中能干的妇女们（挤奶员或甜菜种植员）的工资来生活。她们得料理家务，还得赶到学校出席家长会。

丘尼科沃村离学校总共才几公里，学生上学、放学还用车子接送。但是去年冬天，丘尼科沃村的十个女学生却因父亲酗酒，都要求在校寄宿。

不，妇女们不会沉默的。她们造反了，她们起来为自己的丈夫而进行斗争。“我的丈夫是非常爱孩子的”——那个给编辑部写信的丽达·什坦柯对我说（从她的语气中可以听出，她的丈夫不仅是爱孩子）。她对村里的人并不隐瞒，她曾经向报社反映

过，她向塔兰佐娃公开宣战了。

“人们已经写过一百份控告信了，”塔兰佐娃冷静地说，“让她们去写第一百零一封吧。”

丘尼科沃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村消费合作社和区消费合作总社那些知情者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们对情况似乎很熟悉，微笑着说：

“妇女们诉苦了吗？噢，妇女们要讲的话可多啦！现在大家都识字，大家都会写。可是，塔兰佐娃是个有经验的人。她工作已三十四年了。她是个直爽的人，心里什么也藏不住。她心地善良，所以才允许别人欠账。主要的是她能够基本上完成计划，从来没有缺少过钱。”

计划她总是完成得很好。在一个月的五、六千卢布的营业额中，单是出售伏特加的收入就占二千至二千五百卢布，竟达到了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而且，“烈性苹果酒”还不算在内呢！

为什么塔兰佐娃这样有恃无恐？这里没什么秘密。“她会念经……”丘尼科沃村的一个妇女话刚说到一半，另一个妇女立刻纠正道：“就是会念生意经……”

确实，丘尼科沃村的妇女和区消费合作总社的工作人员不同，她们根本不承认塔兰佐娃是完成计划的热心人。这个塔兰佐娃不知是从哪个时代冒出来的：从前把这种人叫作酒馆的掌柜、酒保、农村小酒馆的老板。但是，在现代有发展前途的区中心布图尔利诺夫卡（离丘尼科沃总共只有二十公里）的那些现时代的领导人是怎样想的呢？

“如果有违法乱纪的现象，”布图尔利诺夫卡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说，“那么就应该取缔。《消息报》记者同志，你为什么如此不信任我们呢？为什么当地能解决的事，非要麻烦记者不可？需要撤换售货员吗？那就撤换好了。”

当然，他们要撤换丘尼科沃酒铺的掌柜塔兰佐娃是最简单不过的事，立刻就可以办到。真要那么办倒也好……但是，丘尼科沃村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丘尼科沃村发生了灾难。许多家庭正在遭到破坏。母亲怕自己的儿子变成酒鬼，迫使他们离家出走。拖拉机撞坏了，二辆汽车相撞了——区里发生了“非常事故”。人的幸福遭到了破坏，人的性格遭到了摧残，该由谁负责呢？当然不会叫塔兰佐娃负责的。

人们可能会说：村消费合作社、区消费合作总社的使命不是树立忌酒的风尚和高尚的道德。它们有自己的职责，它们的工作是根据完成计划的情况来评定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不择手段这类事在我们国家里是决不允许的。在商店营业额里，伏特加占到百分之五十，这是个足以使人不安的危险数字。毕竟还有着区执行委员会、区党委、各种社会组织，最后还有民警局，对人们的命运，对整个村子的命运他们决不能无动于衷吧！

区里一位领导这样解释道：他第一次听到塔兰佐娃这个人。他说，妇女们知道我是个毫不相干的局外人，所以才对我讲起这件事，但她们一直没有向当地领导反映过。

不，不是这样。她们早就反映过了。她们不是到这儿告状，就是到那儿告状。塔兰佐娃不是嘲笑过“第一百零一封”控告信吗？……

早在五年前，布图尔利诺夫卡区人民法院就作出裁决，责成区消费合作社对塔兰佐娃采取措施。

一年前，区特派员波利亚科夫同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的检查员菲奥德诺夫一起，骑着摩托车来到了小店，没收了塔兰佐娃那本闻名的、记有赊账人名字的漆布面的账簿。塔兰佐娃的书面检查，结尾是这样的：“我意识到，我粗暴地违反了

苏联贸易章程，今后决不重犯类似的错误。”但在消费合作总社收到了报告以后，对达丽娅照样不采取任何措施。

今年春天，同塔兰佐娃进行毫不妥协斗争的丽达·什坦柯又到区检查员那儿去要求接见。检查员传讯了塔兰佐娃，听取了千篇一律的检讨，然后对申诉者说：“售货员已受到警告”。那又怎样呢？

“小店门前象游艺场似地经常聚集着许多人，往往当着小孩的面大打出手。翻开报纸可以看到许多谈论各种法律的文章，可是没有一条法律是针对我们女售货员的。你们也许会劝我跟她评评理，她就是当你的面，对你吐唾沫。请求你们给予帮助，要知道有这么多的家庭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丽达·什坦柯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这样写着。这不是信，简直是心灵的呼声。于是我被派到丘尼科沃村进行采访。我一走进小店就见到了那本宝贵的账簿！你要轻易地逮住塔兰佐娃是不可能的，她站柜台不是几年，而是三十多年了。

任何一个区组织，包括区消费合作总社在内，都有同酗酒——这个社会祸害作斗争的计划。但是这些计划里就没有对付塔兰佐娃这样人的。丘尼科沃村所发生的祸害，在计划的任何一个项目中都列不上。在布图尔利诺夫卡和其它一些地方经常可以听到：是啊，哪个地方不喝酒。是啊，猪总能找到它的泥坑，酒鬼不愁没地方喝酒。对于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是多么好的幌子啊！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消息报》 复旦
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王海萍、叶建晨、张玲儿译）

哑 场

〔苏〕C·鲁坚科

按照古典主义的规范，钦差大臣应当突然来到。那时，被检查的一方就会惊慌失措，于是，便出现了富有表情的哑场。

如果检查机关的工作只服从戏剧规律的话，那末，迄今为止的检查就只能是出人意料的。但今天这基本的一条变了，检查是有计划的——年度的、季度的，严格按照图表执行，选择的时间对双方都方便。

在进行有计划的检查时，可能不会出现戏剧性的场面。被检查者平静地等待着检查员的来临，有机会作好适当的准备，以接待后者，这种接待照例同那种哑场毫无共同之处。

好罢，现在你们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哑场了：它发生在基洛夫格勒州消费合作联合社区间供应站，紧接着平静的检查，来了一次计划之外而且又是突击的检查。检查的起因是“下面的反映”。

但站长格兰金之所以目瞪口呆并不是由于惊慌。他才不在乎下属的抗议呢！对违法行为的反映早就从供应站到达上级机关、合作社内外了，譬如说，大批地毯、毛织品和其他许多商品，就根据站长的一张纸条或一个电话，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供应站“溜走”了。并且在站长给好处的那些人中，怎么也找不到农村的入股者，所有的货物都按非法的途径在省中心卖掉了。

还有这样的情况：供应站的采购员跑到了邻近的敖德萨。他们在那里弄到了进口皮鞋，还一本正经地在提货单上签了字，但

从敖德萨回来的时候，带的却是现款。那么鞋子在哪儿呢？“在路上跑掉了”，去领鞋子的人不乏幽默地对一切都明白的格兰金报告说。

总之，格兰金之所以目瞪口呆不是因为人们向共和国机关告了他的状。他并不把这样的事放在心上。甚至当检查员发现缺少价值八万九千卢布的商品，也就是说，发现大规模的盗窃和侵占行为时，站长也没有皱眉头。好吧，让他们着手侦查吧，要知道这种事情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的，何况什么东西都可能丢失，都可能象他的助手们俏皮地说的那样，在路上跑掉了。

真正使格兰金痛心的是：尽管他作了巨大的努力，属于他管辖的供应站还没有成为这样的无声戏台，在这个戏台上只能听到他格兰金一个人的声音。因为如果有任何人发出不合格兰金心意的声音，那末，这个人立即就会被赶出供应站。可是信里所反映的却是收信人过去所没有听到过的事。

即使这些反映全部得到了证实，即使检查组行动保密，即使乌克兰消费联合社管理委员会一次又一次作出解除格兰金职务的决定，格兰金还是会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可是那些反映者和批评者在哪里呢？他们会把一切告诉留下的人员：只要格兰金一个电话，上告者就很难在新地方找到工作。

但是在所有执拗而任性的人似乎都已被解职的时候，关于盗窃的反映重又出现，而且还到了高一级的机关里，这使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不得不出来过问了。

它确实出来过问了，是省一级的高级机关，并且还搞得很积极。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机关是为国家的利益活动的，凡是他们应该做的，通常都做得不错。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他们转变了方向，开始传讯……发信人。发出传票，派出信使，用汽车把他们接来。要结束十分棘手的有关八万九千卢布

盗窃案的侦查工作，大概只要花这种精力的一小部分就足够有余了。

第一个用汽车送到州民警局长沙夫希同志办公室的，是供应站里年长的商品检查员库特利克同志，她在自己的信中讲到了站长的卑鄙行径。顺便说说，由州人民监察委员会进行的检查证明了库特利克同志所报告的情况属实。

于是沙夫希同志开始询问她：她为什么写这封信？是自己想写，还是受人指使？除了这封信，她还写信到什么地方去过？

在搜索网里还有一些和站里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有一天晚上，州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的全权代表加夫里格夫来到高龄的女公民别尔季切夫斯卡娅的住宅里，他问：

“你写过申诉书到莫斯科去吗？”

“写过。”惊奇的老太太回答说，在她一生中从来没有和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打过交道。

“知道了。准备一下，跟我到民警局去，”加夫里洛夫命令说。

“我不能去民警局，”老太太回答，“我的手和脚都有病。”

全权代表惶惑了一下，但他没有失去职业上随机应变的能力：

“如果你的手有病，你又怎么能写申诉书呢？”

“是女儿写的，”老太太回答。

“啊哈，女儿……那末让她明天到民警局来一下，”加夫里洛夫要求说。

第二天，别尔季切夫斯卡娅的女儿来到了民警局。全权代表一看到她就盘问道：

“你自己要写申诉书还是受了别人的指使？”

“自己要写，”别尔季切夫斯卡娅回答。

“你从哪里知道，供不应求的地毯从柜台下到了格兰金的庇护者那里去了？”

“什么地毯？”

“这你知道——供应站的。”

“我的申诉和地毯有什么关系？我写的是我妈妈住在这个地区已经三十年了……”

“那又怎么样呢？”

“那里所有的医生都知道她……”

“那……”

“而分配给她的房子却在郊区，那里甚至没有电话。”

“那，你就写电话好啦，不要去写供应站。”

“我就是这样写的嘛：写到房子和电话。”

“那末你没有写过别的申诉书？”

“没写……”

“那你坐下，写个声明，说你没有写过别的申诉书。你写完后就可以走了，”加夫里洛夫命令说。

这个妇女写了一个声明。现在她反问全权代表：“请问，我们关于房子的申诉和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有什么关系？”

“这你没有必要知道，”加夫里洛夫回答。

他在传票的反面写道：

“已查明。女公民С·И·别尔季切夫斯卡娅于九点到十点之间来过民警局。”日期，签字。

这样，别尔季切夫斯卡娅根本就不知道她为什么被叫到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去。

而传讯和审问这位女公民，只是因为怀疑批评信是出于她的一个同格兰金有职务上联系的远亲之手。没有直接的证据，

于是他们便决定转弯抹角地搞，从而扩大了搜寻来自区间供应站的申诉书作者的范围。

“您总知道，别尔季切夫斯卡娅关于房屋的申诉不可能同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的活动有任何关系吧？”我问加夫里洛夫。

“知道”，全权代表流利地回答。“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局长沙夫希同志叫我去，当着另一位省的工作人员切连特尼克同志的面，命令我传讯那个写申诉书到莫斯科去的别尔季切夫斯卡娅，并且要她写个声明。您要知道我是他的部下啊……”

这样，基洛夫格勒州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的工作人员不去搜寻窃贼和骗子并揭露他们的庇护者，而是，客气一点说，在干不该干的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使检查员的来到远没有对格兰金及其同伙产生古典主义式的影响。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苏联《真理报》

李伟国译）

大理石的窝棚

〔苏〕 I·列巴尼泽

在阿赫麦特地区,谁不知道林务区管理员、好猎手米霍爷爷呢!他突出的一点就是保守。他从不带盛早饭和午饭的旅行冰箱,对装热咖啡的暖水杯也不感兴趣。米霍爷爷进进出出时,肩上总是搭着一个布袋,袋里装有非常好吃的、味道很香的硬大饼和他喜欢的羊奶干酪,他心满意足地喝着冰凉的泉水……

有一天,米霍爷爷本着自己的保守特性察觉到,威胁笼罩着他俭朴的生活。

“同志,在我们时代,再也不能象家庭手工业者一样,孤独地在森林里生活下去,既没有舒适环境,又很不方便。”格鲁吉亚部长会议林业委员会的活动家们对他这样说。他们还拿出国立近郊建设研究所搞的林务区房屋设计图给米霍看。从设计图上看,新的生活环境大致是这样的:

劳动一天之后,米霍爷爷和他的同事来到了住宅,跨进了宽敞的前厅,随后又走进陈设漂亮的客厅。大家紧紧围绕在壁炉旁,听着狩猎的事迹,充分享受着快乐,尤其是闻到厨房里的野猪和烤羊肉味,令人十分垂涎,该吃东西了。客人和主人们可以在宴会厅、或是在具有特种风格的、装饰着模压花纹和雕刻的酒窖里,尝着手艺高超的厨师所烹饪的菜肴。

米霍心里在盘算,酒窖的面积有九十平方米,不仅能设宴请朋友喝酒,还能给子孙后代举行婚礼。

当然，吃饱晚餐后，该好好地休息。现在请进入宽敞的摆设了最新式样家具的、有个人盥洗室和浴室的豪华卧室吧。

但当米霍从设计图中读到了“建筑物的价值十三万零六百卢布”时，他的两眼都发黑了。

“这是不公正的！”邻近的克瓦雷利林务区领导人说：“为什么不给我们的依西多尔爷爷建造这种舒适的房子！他哪点比别人差？”

又来了一份林务区的一幢住房设计图。只有一个地方不同：这次格鲁吉亚国立近郊建设研究所的设计工程师们特别偏重楼梯和浴室的地板用大理石。为了能在吃饱晚饭后活动活动，这里设计了四十七平方米的台球房和九十五平方米的客厅。

“的确，这里不仅可接待客人，而且还可以赶马。”林务区管理员挖苦地说道，他的目光凝视在设计图上的“建筑物价值十三万七千七百卢布”这一行字上。

“这是不公道的！”鲍尔若姆林务区管理员们喊叫起来，“我们……差些什么。”

格鲁吉亚其它许多地区也开始设计这样的房子。不久，在建筑师们的努力下，一幢幢新颖的房子相继而立。房子都是严格地按设计图建造的，只有一件事例外：无论是米霍爷爷、依西多尔或其他林务区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跨入房子一步。地区领导的许许多多客人们在这儿吃呀喝呀。

“让假面具和各种诡计统统见鬼去吧！”共和国国营农场部大胆作出这个决定。

过了不久，极其露骨地开始把指定用于建造住房和生产建筑的资金……建造了许多旅馆。虽然房子象雨后春笋似地出现，然而国家花的钱并不便宜。在戈里地区的瓦里安国营农场，造旅馆花了六万二千三百卢布，而在霍勃地区的科尔里季国营农

场,更花了两倍多的钱。

英古国营茶叶农场的旅馆预算价值超过了八万卢布,在阿纳克利国营农场的建筑花去的钱几乎要贵一倍。

“我们哪点比别人差?”共和国消费合作社联合会管理委员会里人们说,其中包括前主席H·贾瓦希泽。他亲自布置了建筑营业性别墅的任务。

不久,格鲁吉亚合作建筑修理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为了不使别人认为他们是吝啬鬼和没有灵感的人,在格鲁吉亚的古老首都姆茨赫塔城墙旁开始建筑自己的“农舍”。他们拚命地努力,要证实曾经在这儿创造出世界建筑艺术杰作的古代建筑师还远不如他们。现在,这儿建造起了有许多窗子的巨大建筑物,它们目空一切地、傲慢地俯视着就在身旁的几世纪前的堡垒和教堂。用于新建筑物的拨款是非常可观的——三十五万卢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供四个人住在两套特别讲究房子里……为了满足这四个人对中央消费合作社联合会所赞扬的房子在艺术装饰方面颇有精细的审美感,花费了……十五万八千卢布。

办合作社的人是些捕鱼爱好者,他们在赫拉马河岸建筑了价值超过十万卢布的私人饭店。这儿侧身躺在沙发上,从饭店房间透过窗户就能捕……鱼。这事的主谋者们认为,捕鱼者这种劳动是合理的,并将会得到应有的评价。

“上世纪的各种各样窝棚和与它们类似的建筑物都见鬼去吧!”共和国猎人和捕鱼者管理委员发出号召,并在向小农舍宣战后,就急忙开始在格鲁吉亚地区建筑花岗岩、大理石和玻璃的猎人住宅。

是的,所有这些住宅都具有各种各样名称,但它们的用途只有一个——除了野猪和肥胖野鸡外,接待那些不懂任何图案装饰的猎人们和天之骄子。他们的狩猎到了幻想的境地。假如没

有命中,也无所谓,由于阿谀奉承的人的关心,未被打伤的野物会直接落到煎锅里去。窝棚呢?得了吧!那些用混凝土、玻璃和大理石造的、由模压花纹、木刻和石雕装饰的坚固的房子,在那非常讲究的房间里,家具摆设得非常精巧,墙上分别悬挂着窗帘和狩猎的女骑士和服装漂亮的骑士的画像。所有这些都是极便宜的……可以说,是靠国家和社会的资金负担的。

多年来,在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和共和国部长会议直接纵容下,由于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家建筑局的默认,这些地方的设计和建筑蓬勃发展着。

“嘿,猎人们走了。”米霍爷爷伤心地说,“猎人们……发国家之财。”米霍又悲痛地说:“我的儿孙们上半日制学校,而我的曾孙们在幼儿园和托儿所没有名额,国营农场的工人们需要住房,这些好象与他们都无关。要消灭这些侵吞国家财产的人!”

(摘译自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苏联《真理报》)

复旦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郑修虹译)

苏联的政治“精神病”

〔日〕菊地昌典^①

苏联知识分子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现在正面临着寒冬时期。

成千上万的政治犯

莫斯科人权委员会(大赦国际苏联支部的前身)对于权力机关所采取的最拿手的镇压方式——强制的精神治疗，不断提出抗议。如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人权委员会曾发出呼吁，例举了巴柯夫斯基因为揭发御用医师滥施诊断而获罪，被判处七年徒刑。多数的情况是：“为了采取强制的精神治疗措施，不需要任何医学根据……关于病症的证据，虽经鉴定医师的审查，但只要认为有可以相信的口头证据，就不需要其它任何东西。”这样，被强制送入精神病医院的人们，就“受到非客观的精神鉴定，除了接受毫无根据的、没有保障的精神病院生活和专横、残酷和屈辱的待遇以外，再没有保全身体的办法。”这个呼吁对于两个数学家的遭遇深表忧虑；并提议保证病患者的父母有选定精神病鉴定医师的权利，医疗处理应有国际的调查和设立监察机构。

现在苏联的政治犯究竟有多少人是很难以计算的。据伦敦大学教授彼得·雷达渥依在一九七三年写的《苏联的强制劳动》一

^① 菊地昌典是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译者

书中比较保守的估计，约为一百二十万人，其中除被流放者外，包括劳动营、监狱和精神病院的全部犯人（并不全部是政治犯）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

又根据萨哈罗夫最近写的《我的祖国》一书中估计，属于政治犯一类的有两千到一万。反正确切的数字是难以知道的。从幸运地溢出于地面上的点滴之水，可以察知被淹没于深渊的地层之中的巨大泉源。问题不在于政治犯的人数，而在于被暴露出来的少数事例——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政治犯，如何在日日夜夜经受着残酷的拷问、如何被强制“治疗”的实际情况。

收拾“狂人”的措施

从精神病院九死一生中拯救出来的人们，为什么对他们下了精神病的诊断？例如，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和他的孪生兄弟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在一九七一年合写的珍贵的文献：《谁是狂人？》一书中指出，对他们诊断的根据是“患有对自己的科学研究必须同宣传相结合这个观点所显示出来的分裂症；对自己作过高的估价，对社会环境不相适应”。这也就是说，生物学家若列斯不致力于生物学的古典领域的研究，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还有极端的情况，把苏军侵入捷克看作“侵略”，也就是“过分追求真实的偏执狂”。总之，按照自己头脑所思考的、把整个社会现象适合于自己所想象的，持有这种思想而化为行动的人，一律诊断为精神病患者，这种事例也是不少的。

当然，一九七〇年五月若列斯被监禁于精神病院，是经过当权者精心策划的。先是若列斯接到他的儿子所在学校的通知，以他的儿子品行不良为理由，要他以家长身份去学校谈话，追究责任。接着，又把他同出版批判李森科的地下刊物事件联系起

来。有一个青年，他被监禁在若列斯同一个病院里，因为他建议把已经官僚主义化了的共青团改组为比较倾向民主主义的青年组织，就被强制进行定期胰岛素电震治疗；他的罪名是：患有“修正主义者的狂想”病。

还有一个事例：一个中年教师，被加卡卢加市党委撤职，经过三个月的时间仍然找不到职业，于是他行使被夸为世界上最民主的苏联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街头宣读了他自己所写的批评党委的文章。这样，他就被逮捕，送入精神病院。为了彻底改变他的精神状态，对他进行强力的降血压注射。在这里，就提出一个是“正气”还是“狂气”的问题。凡是按照当权者的戒条，忠实于自己的职务的都被认为是好的；如果在自己的职务之外怀有任何不满情绪，抱着批判的态度，是绝对不容许的。超出这个框框，就被看作不是正气的，不是正常的。从不正常的角度来看，本来正常的事物，便成为不正常的事物。可是，占压倒多数的人民却保持沉默，而对任何事情不持异议的“正常者”却占绝对少数。因此，从这个数字关系来看，很容易被打上“狂气”的烙印。

打开俄国的历史来看，当权者要收拾不顺眼的人的最巧妙的办法就是给他戴上狂人的帽子。因被戴上狂人帽子而死亡的决不是少数。索尔仁尼琴说过，斯大林时代的刑罚，远比现在来得温和，宽容。事实可不是这样吗？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曾尖刻地挖苦说，如果把超越专门领域的框框而思想正常的人判处为“狂人”，那么当牧师的遗传学家孟德尔，磨透镜出身的哲学家斯宾诺莎，以至于明斯克畜产大学毕业的葛罗米柯外交部长不是也成为狂人了吗？他又指出，照此说来，有任何癖好的人都有被当作精神病患者的危险。在亚里士多德、达·芬奇和罗蒙诺索夫所处的时代也有这种危险。“但所幸的当时还没有所谓精

神病学,因此只按照常识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狂人。”

“第六病室”的铁格子

我每次读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被送入精神病院的报道,就不由得想起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契诃夫的作品《第六病室》所描述的、那个用铁格子围隔起来的病院院长安德列·叶菲密奇同病人伊凡·德米特里奇谈话的场面:院长虽然渐渐地被病人的人性所吸引而显示出安详的神情,但在进行谈话时,院长给对方穿上青色条纹衬衫,那就意味着肯定他是一个病人。正当院长倾听病人谈话的时候,突然站在铁格子这一边的、安于庸俗生活的人们却把院长推到铁格子的那边去了。这究竟谁是“正气”,谁是“狂气”呢?若列斯用他亲身体会写的一篇题为《谁是狂人?》的文章,实有其极为深刻的哲学意义。

上述的那样新型的折磨方式,还仅仅是点点滴滴的。但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那些有勇气进行内部揭发的人。苏联的精神病学者自己,他们对于精神病房里所进行的颠倒“狂气”与“正气”的决定提出抗议;也有一些医生揭发他们的同事“玩忽对待精神正常者”的事例;也有一些医生把病患者的情况透露给地下刊物。当然,采取这种正当行为的人,等待他们的将是“狂人”的帽子,遭受的将同“第六病室”那样、被投入铁格子那一边的命运。

(摘译自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的日本《朝日杂志》 若莲译)

美国黑人的希望更少了， 恐惧更多了

〔英〕莫里斯·欧文

十年前，在一次震撼美国的流血的暴动中，洛杉矶的瓦兹黑人区被烧掉了，后来掀起了一场帮助黑人发展经济的新的运动。清理出来准备重建的空地象累累伤疤，而重建计划却已取消了。今天该区拥有一个市场，名称十分费解，叫做“一日——十五日”。对于难得涉足这个地区的少数白人，这个名称确实莫测高深，但对于瓦兹居民，它是再也清楚不过了：每月的一日和十五日就是领取福利和社会保障支票的日子。

据估计，在瓦兹以及在国象瓦兹那样的地方，如果把就业不足的和再也不到没有职业可以介绍的职业介绍所去找工作的人都计算在内，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五十。“这就是此地的问题所在，”瓦兹劳动集体行动委员会的发言人、身材魁梧的黑人特德·沃特金斯先生说。“暴动之前，我们的景况就是如此。我们看到捐款拿来了，用掉了，但我们的景况依旧如此。我现在看到的是希望更少了，罪恶更多了，工作更少了，恐惧更多了。”

在二千三百七十万美国黑人中，瓦兹究竟具有怎样的代表性呢？它似乎是极其典型的。过去十年内，数百万黑人已经跻身于美国富裕生活的主流，但是仍有很大一部分下层阶级，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摆脱不了受救济的地位。

美国参议院唯一的黑人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说，官方认

为，大约有八百万黑人(约占黑人人口的三分之一)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个数字从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变过，那年正是尼克松政府接任并开始削减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计划的时候。人口普查局最近的统计数字也不是令人振奋的。几十年来，直到一九六九年，黑人和白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在缩小。而在过去的五年内，差距却扩大起来。一九七〇年，黑人中等家庭的收入是白人中等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一·三，去年下降到百分之五十八·八。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因素是，黑人的收入比起白人来，分配得更不公平。据研究这个问题的黑人作家奥德·库姆斯先生说：“你不妨说存在着两个民族。一个相当大的少数已成为殷实的中产阶级。可是他们和下层阶级之间差距悬殊，简直象两个不同的世界。”

许多黑人家庭的不稳定，在这里有直接的影响。户口调查表明，只要黑人家庭的家长是男性的，这个家庭的收入就会逐渐赶上白人。不幸，以单身妇女为户主的黑人家庭的数目正在增加：一九六九年以来，从百分之二十八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而在白人中间只有百分之十。这种情况看来一部分是由于黑人男子的失业率高(就全国来说，是百分之十，即是白人失业率的两倍)，跟某些研究报告所暗示的那种荒诞不经的福利制度也有关，该制度鼓励了家庭的分裂。父亲搬出去住，妻子才有资格得到更多的帮助——福利救济、食品券和其他补助。

这一切并不否认黑人取得的例如在教育 and 政权方面的重要利益。为了这种利益，他们经历了漫长的、往往是流血的道路。在那些日子里，他们看电影被指定坐廉价的“楼顶座位”，在公共汽车上座位按种族隔离开来，还有，一九四七年前一直禁止黑人参加白人的体育运动。黑人在火车上不能订一个高级座位，在商

店里不能试穿衣服。他们在电影银幕上总是作为卑躬屈膝的人、黑鬼、保姆或者淫棍的角色出现。

因此而产生的愤怒和隔阂远没有消除，尽管一度是黑人战斗精神的凶猛象征的埃尔德里奇·克利佛先生现在却要使美国人确信“黑人景况已经根本好转”。这位前黑豹党领袖和《冰冷的灵魂》一书作者，也许想到的是政治领域中所取得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进展吧。今天，三千多位选举出来的黑人官员，正在管理国内的社团、城市、学校和警察部门（这人数是十年前的十倍）。在国会中，黑人占十八个席位，在州的立法机关中占二百七十八个席位。

在加利福尼亚，副州长、教育局长（他控制该州的预算的最大部分）、最大城市洛杉矶的市长和许多其他的官员都是黑人，虽然黑人在人口中仅占百分之十。

黑人资本主义也有很大的发展；可是在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的日子里，总的图景并不引人入胜。例如在六十年代，黑人只控制了十来个银行；今天大约有五十个黑人管理的银行，可是它们都经常处于金融危机之中。它们的资产没有一所超过七千万美元的，比起那些美国银行界巨头来，实在微不足道，它们仅仅代表美国一万四千所银行中的一小部分。经济衰退带来了大批企业的倒闭和破产。一个大问题是为数极少的黑人银行，却要替因经济衰退而损失惨重的黑人企业挑起投资的重担。不过黑人银行的出现毕竟为缓和金融方面的种族歧视做了一些事情。例如，在六十年代，白人银行拒绝把可以允许的最高利息给予黑人存款户。在几十个黑人银行建立了起来，并向黑人存款户付出了最高利息之后，白人银行这才开始照办。

黑人在大公司、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担任董事的寥寥无几，尽管有些大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塞罗克斯公司，

已经带头给黑人以负责的职务。“然而,大多数只是装装门面而已,”一位为洛杉矶某家电视公司工作的黑人经理抱怨道。“他们白人心里想的是,每当他们提拔一个黑人到较高的职位上,他们就是降低了标准。”不管是真是假吧,目前,据《幸福》杂志说,已有大约三十七万九千名黑人(即一九六九年的一倍半)在经理的岗位上。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主要的人口中心出现了新奇的隔离形式,白人外流到郊区,把最贫穷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留在城内的死角里。今天,黑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都居住在那些破落的城市中心区。这种地方再也无法为象样的交通、教育和其他事业筹措基金了。由于雇主们都跟着白人中产阶级外流到郊区去了,工作越来越少。过去几年中,市内黑人人口增长了三百五十万,而二百万白人都迁往新的牧场。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下去。

白人中间通常有种看法,即这么许多黑人得到成功的事实意味着美国已经解决了种族问题,至少是朝着那个方向在稳步前进。上面谈到的所有情况究竟是“根本好转”呢,还是克利佛先生在他的七年的流亡中,已经成为白人的这种看法的俘虏?到瓦兹去访问一下就会茅塞顿开了。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英国《金融时报》)

刘士杰、晓光译)

阿纳姆大桥

〔美〕科尼利厄斯·瑞安

原编者按：一九四四年九月，欧洲战争似乎快要结束了。英美武装部队横扫法国和比利时，德军防线处处都在崩溃。盟军司令官们觉得只要一次出奇制胜的袭击，就能打开通向柏林的道路，结束这场战争。

因此，盟军极为乐观地开始了“菜园行动”——一次规模巨大的空降袭击，目的在于夺取荷兰境内位于下莱茵河上的阿纳姆大桥。这次战役虽然不太为外界所知，但它却是盟军遭受的一次最严重的挫折，伤亡人数大大超过了诺曼底登陆。

离布鲁塞尔市中心几英里，在设于皇家花园的简朴帐篷的总部里，伯纳德·蒙哥马利元帅正焦急地等待他发给“艾森豪威尔亲阅”的密电复文。随着英军到达布鲁塞尔并进入安特卫普，这场战争已经到了决定性的转折点。蒙哥马利确信，德军已濒于崩溃边缘。他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发出的几段密电，清楚地说明了他的信念，以“雷霆万钧之力，长驱直入”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样，他不仅可以到达工业基地鲁尔，而且可以直捣柏林。

在瑟堡^①半岛的西端，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将在他的格林维尔别墅卧室里，正读着蒙哥马利的密电，又生

^① 法国的港口城市。

气,又怀疑。在这以前,为了这个“挺进”计划,蒙哥马利已经三次和他唠唠叨叨而使他气恼了。艾森豪威尔同意的是“宽阔的战线”,他认为有关这个战略的论战,早已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可是现在,蒙哥马利不仅又一次为他的理论辩解,而且提出直捣柏林。一向镇静而安详的艾森豪威尔现在发火了。

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是为他和这位深孚众望的英国将军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而深感不安。他决定过几天去会见蒙哥马利。他预定九月十日星期天动身。

当艾森豪威尔的飞机在布鲁塞尔机场着陆时,蒙哥马利怀着焦虑而坚定的心情在等待着他。由于艾森豪威尔最近扭伤了膝盖,不能下飞机,于是会谈就在机舱内进行。蒙哥马利几乎立刻就开始责难最高统帅“宽阔的战线”的战略。他争辩说,眼下正在让巴顿继续向萨尔河推进,只要这两方面愚蠢的、相互脱节的推进继续下去,把物资供应在他和巴顿之间对分,“谁也打不了胜仗”。蒙哥马利说,他和巴顿何去何从,由艾森豪威尔自己来抉择吧。蒙哥马利的语气是如此狂暴而任性,以致艾森豪威尔立刻伸出手来,拍拍蒙哥马利的膝盖说,“安静一点,蒙蒂!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我是你的上司。”蒙哥马利的火气立刻烟消云散。他平静地说:“对不起,艾克。”

虽然蒙哥马利在语气上不再那么尖刻,但仍然顽强地为他的“挺进”计划进行辩护。艾森豪威尔聚精会神地听着,同情对方的论点,然而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的“宽阔的战线”还得继续下去。他清楚地告诉蒙哥马利其中的道理。据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当时他说:“你所提出的建议是这样,假如我按照你的要求,把物资全部供应给你,你可以一直打到柏林,直捣柏林,对吗?蒙蒂,你真是个疯子。如果你想在一次挺进中把战线拉得那么长,那你就得投入一个又一个师来保卫你的侧翼。蒙

蒂，你不能那样干。”

艾森豪威尔的拒绝是坚定的。他强调，甚至在仔细考虑进入德国的任何重大行动以前，必须开放安特卫普港。于是蒙哥马利推出了他的王牌。新近的发展（从荷兰基地向伦敦发射V-2飞弹），有必要采取行动，立即进入荷兰。他的作战计划是根据前一个计划进行大大补充修改的，前一个需要一个半师的、叫做“彗星行动”计划已经取消了。蒙哥马利提出在一次使敌人晕头转向的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中，把刚成立的由刘易斯·海德·布里尔顿中将指挥的第一空降军团三个半师全部用上去。空降部队在他的陆军部队前面夺取荷兰一连串河流的渡口，主要目标是占领下来因河上的阿纳姆大桥。这个突然袭击将为迈尔斯·登普西将军的英国第二军的坦克部队向北打开一条走廊，第二军的坦克部队将迅速越过已占领的大桥开往阿纳姆，越过来因河。然后蒙哥马利希望挥师东进，从侧翼包围齐格菲防线，直捣鲁尔。一旦越过来因河，蒙哥马利就看不出最高统帅怎样叫他半途而废了。

这段话给艾森豪威尔的印象很深，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是一个大胆的、充满丰富想象力的作战计划，也正是他自己一直在为他那空闲已久的空降师寻求大规模突击好机会的作战计划。但这位最高统帅现在却是进退两难：如果批准这次进攻，安特卫普港的开放就得推迟，并且还得把给巴顿的物资转交给蒙哥马利。但是，如果他拒绝蒙哥马利建议，他就丧失了复活迅速推进的机会，而且也许会失去越过来因河追击敌人的机会。为这项大胆计划所吸引，艾森豪威尔批准了这个作战方案。

祸根不少

这种早期的战略思想（以后产生了代号叫“菜园行动”）是以

很快速度发展的。蒙哥马利满怀信心地把九月十七日星期天定为D日。

在艾森豪威尔作出决定以后几小时内，布里尔顿就这次最伟大的、简直难以想象的空降行动，对二十七位高级军官下达了简要命令。为了从空中入侵荷兰，布里尔顿计划要空降约三万五千人（将近两倍于诺曼底登陆所用的伞兵部队和滑翔部队），配备着完整的车辆和大炮装备。为了有助于运送庞大的部队到三百英里外的目标，他将不得不把在他所指挥下的每架滑翔机都用上去——超过两千五百架的巨大机群。

滑翔机将运送三万五千人武装部队的三分之一，其余则将用降落伞空投。这将需要整个英国的战斗机群（超过一千五百架）为空投飞机护航。总共需要各种类型飞机近五千架。为了避免在夜间发生混乱，布里尔顿将军命令在白天发动这场进攻。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

布里尔顿任命布朗宁将军指挥这次巨大的行动。

最为命运攸关的决定是：布里尔顿不得不使他的行动计划适应于现有的空运能力。他必须分批运送部队，在三天内把三个半师空投到各自的目标。危险是极大的：德军的增援部队也许会快得出乎意料地到达“菜园”地带，恶劣的气候条件可能会推迟第二批和第三批空降。从布里尔顿看来，即使出现这种危险也不得不加以接受。

这次攻击其中有两个师是美军。

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横跨在下来因河上的钢筋混凝土的阿纳姆大桥。攻占这座大桥的任务指派给英国的“红魔”和波兰的部队——罗伯茨·厄克特少将的第一空降师和斯坦尼斯劳·索萨鲍斯基少将的波兰第一空降旅。最终目标是阿纳姆城。

厄克特的任务分配出现了一个特别恼人的问题。因为阿纳

姆大桥地区的周围不是沼泽,就是建筑物和居民区,并且有敌防空部队守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厄克特决定将阿纳姆以西和西北若干宽阔草地作为空降区。空降区样样都好,只有一个缺点:离阿纳姆大桥有六到八英里。

索萨鲍斯基将军有严重的忧虑。要到达阿纳姆大桥,部队将需要“五小时的推进;这样一来,怎么能收到奇袭效果呢?任何一个德国白痴也会立刻洞悉我们的作战计划。”他对布朗宁说,如果没有援军,要完成这个任务等于自杀。布朗宁回答说:“不过,亲爱的索萨鲍斯基,有了‘红魔’和勇敢的波兰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干得出来!”

疑团不足信

并非人人都是这样信心百倍。至少蒙哥马利的高级军官之一有理由产生焦虑。英国第二军军长登普西将军不象蒙哥马利元帅那样,并没有对荷兰抵抗组织最近的几份情报发生怀疑。情报表明,正是在计划中的空降区的埃因候温和阿纳姆之间,德国兵力正在迅速增加。甚至有一份情报说:“受到打击的德国装甲部队已奉命到荷兰休整”,据说它们就在“菜园”地区。登普西曾把这个情报送到布朗宁的英国第一空降军团,但由于它没有得到蒙哥马利或者他的参谋部的支持,在一派乐观气氛中,竟完全没有当作一回事。

布赖恩·厄克特少校同样被弥漫在第一空降军团的乐观气氛所苦恼。他刚从军团总部荷兰联络官那里也得到令人不安的类似消息。从登普西报告、再加上他自己的情报来判断,厄克特感到有理由相信,至少有两个德国装甲师在阿纳姆附近。部队番号不明,实力不详,因此,他无法弄清这支装甲部队究竟是来

休整,或者仅仅是路过。

九月十二日下午,厄克特少校要求皇家空军对阿纳姆地区进行低空侦察,如发现坦克,也许照片可以证实他的疑虑。

九月十五日,在“菜园行动”开始以前不到四十八小时,厄克特少校终于拿到了他所盼望的照片——五张从空中斜拍的照片,清晰地表明了阿纳姆地区确有坦克。

厄克特立刻奔到布朗宁将军的办公室,把照片放在写字台上说:“请看看这几张照片。”布朗宁将军把照片一张一张地端详了一番。“我不会为这几张照片自寻烦恼。”讲到坦克,他继续说下去,“这些坦克也许根本就不能用。”

几乎与此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法国,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瓦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正在听取他的情报首脑、英国的肯尼斯·斯特朗少将的汇报。斯特朗说,毫无疑问,在阿纳姆地区有德国的装甲部队。荷兰地下情报甚至辨认出德国党卫军第九和第十装甲师的番号。这两个装甲师受过重创,但未必就已经完全被歼。

史密斯立即去和最高统帅进行会商。由于英国第一空降师是在阿纳姆空降,他们“无法顶住两个装甲师”,因此,他对艾森豪威尔说,要增加“菜园”兵力。

艾森豪威尔向史密斯解释:“我既不能告诉蒙哥马利应该怎样部署兵力”,也不能“取消这次行动,因为我早已给他开了绿灯”。如果要变更作战计划,他一定会亲自处理的。

史密斯立刻去布鲁塞尔。他发现蒙哥马利又自信,又激动。

盟军第一空降军团集结在八个英国空军基地和十六个美国空军基地。九月十六日黄昏前,气象专家发布了预报:除了清晨有雾以外,后三天将是晴天。在盟军第一空降军团总部,布里尔顿将军迅速作出决定,通知“菜园行动”确定在十七日星期天。

飞越英吉利海峡

大编队机群雷鸣般的轰轰声震耳欲聋。在英国牛津郡和格罗斯特郡的滑翔机基地附近，田野里的牛马惊慌失措，脱缰狂奔。人们被弄得目瞪口呆，心惊胆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伟大的场面。历史上最大的一支空降部队起飞了，径直向目标飞去。

从旁观者来说，这次进攻的性质，已经很清楚地被泄露出来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安吉拉·哈金丝从火车窗口向天上一看，给吓楞了，飞机就象成群的“欧椋鸟”似的，铺天盖地地飞过去。

行动是在黎明前开始的，整整持续了一个早晨。先由一千四百多架的盟军轰炸机猛炸了“菜园”地区德国的高射炮阵地和部队集中地。然后，从九点四十五分开始，经过两小时一刻钟，二千零二十三架运输机、滑翔机及其牵引机，拥进这片领空。在较小的霍尔塞和瓦科滑翔机中间摆动的是细长的、载重八吨的汉米尔卡巨型飞机。在空中，上下左右，都是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到上午十一点五十五分，整个武装力量——两万多部队，五百十一部车辆，三百三十门大炮，和五百九十吨装备，全部起飞在空中。第一〇一空降师的尼尔·斯威尼上校回忆说：天上的飞机是那么多，以致于“我仿佛感觉到从机翼上出发，就可以一路走到荷兰似的”。

几乎立刻就发生了一些事故，当最后的空中列车到达英国海岸时，已经有三十架滑翔机失事。牵引机引擎发生故障，牵引绳索断裂，而且有些地方，浓厚的云层造成了事故。不幸的是，其中二十三架是属于厄克特将军要在阿纳姆空降的飞机。

在英吉利海峡的上空，有八架滑翔机被迫在海面降落。在这

八架滑翔机中，有五架是飞往阿纳姆地区的。

当荷兰海岸线遥遥在望的时候，第八十二空降营以及在北面飞行纵队中的英国伞兵，开始看见不祥之兆——德国高射炮火的一团团灰黑色的硝烟。护航战斗机开始离开大编队机群，攻击高射炮阵地。

虽然护航战斗机把绝大多数的海岸高射炮阵地都打哑了，但是还有几架飞机受创；另外，还有一架牵引机、它的滑翔机和一架 C-47 运输机在斯豪恩岛的上空被击落。这架牵引机毁机着陆，机务人员全部罹难。第八十二空降营的一架瓦科滑翔机在空中被炸得粉碎。

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夜间进行广泛轰炸，继续对阿纳姆、奈梅根和埃因霍温进行空中攻击，但德国人还是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奥斯特贝克总部的莫德尔元帅，一直在注视着这些轰炸机群。在他总部里，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这是空中堡垒飞行中队夜袭德国后返航；如同往常一样，另外的空中堡垒机群又飞向其他目标，对德国进行无休止的轰炸。至于对当地的轰炸，那是把在鲁尔上空没有用完的炸弹扔掉，往往就投到荷兰领土上来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在三个小时的接近饱和的轰炸中，阿纳姆全城一片大火，无数黑色烟柱腾上天空。在沃尔夫赫泽、奥斯特贝克、奈梅根和埃因霍温，建筑物被夷为平地，街道上弹坑累累，一片瓦砾和碎玻璃，伤亡人数时刻都在增加。荷兰人的情况是，躲在教堂里、地下室里和防空洞里，或者凭着一股勇气在街上兜来兜去，要不就在屋顶上睁大眼睛看着，一会儿惊骇恐怖，一会儿欣喜欲狂。

第一次遭遇战

第一〇一空降师的约翰·西波拉中士正在打盹，突然间他被尖锐的高射炮弹爆炸声惊醒了，接着，“弹片撕裂了我们的飞机”，就象其他人一样，西波拉被沉重的装备压得几乎无法活动。除了步枪、背包、雨衣和毯子外，肩上都挂着子弹带，军服的口袋里塞满了手榴弹，还有降落伞，再加上应急干粮。此外，在他的飞机上，每人还带有一个地雷。据他回忆，“在我们左翼的一架C-47运输机突然起火燃烧，接着又是一架燃烧起来了，于是我想：天哪，下一次要轮到我们的飞机了！我怎样才能跳出这架飞机呢？”

跳伞长发出了命令：“起立，用钩子钩住。”然后他镇静地开始检查装备。西波拉是这批伞兵中的最后一个，在他能大声报告“二十一，准备完毕”以前，似乎经过了长长的几个小时。然后亮起绿灯，伞兵们急忙跳出机舱，往下降落，降落伞开始张开。仰起头来校正伞盖，西波拉看见他刚刚离开的这架C-47运输机正在起火下坠。

尽管高射炮弹爆炸的弹片淹没了机群，但飞行编队并没有散乱。飞行员对准了航向。一架已起火燃烧的C-47运输机的飞行员赫伯特·舒曼少尉用无线电向飞行指挥官报告：“别为我担心，我准备把飞机上的部队准确地投向目标”。他实现了他的诺言。伞兵们安全地从飞机上降落。片刻之间，这架飞机就在烟火中坠毁了。

对泰勒将军来说，第一〇一空降师的跳伞“特别成功；好象是一场军事演习”。在最初的计划中，他的参谋部曾预计伤亡人数要高达百分之三十。

虽然官方原先估计格鲁斯贝克地区敌人的反抗是微不足道的，但在空降区四周的树林里却有相当数量的高射炮和轻武器火力。第八十二伞兵营着陆以后，没有等待集合，就个别地或成群地朝这些孤立的抵抗据点蜂拥前进，迅速压制了敌人火力，俘掳了敌人。与此同时，战斗机擦过树梢，用机枪扫射敌人的炮位。在这些低水平的攻击中，德国人的反抗是顽强的。

在十八分钟之内，第八十二师五〇五团、五〇八团的四千五百十一人，加上工兵和七十吨装备，都降落在跨越格鲁斯贝克城镇的空降区及其附近。再加上滑翔机的空降部队使总数达到七千四百六十七人。

厄克特将军被一片寂静吓慌了。据他回忆：“那是意想不到的寂静。是不真实的。”正当他的参谋长在树林的边缘建立起师作战指挥部时，他动身到四百公尺以外的伞兵着陆区去。现在快到杰拉尔德·拉思伯里准将的第一伞兵旅飞到的时刻了。

在全部空投着陆区，全师的五千一百九十一人已经安全到达，部队集合起来，然后开始行动。厄克特将军再也没有这样高兴了。

在一片混乱和惊慌失措中，第一个开始警惕的德国高级军官是党卫军第二装甲兵团司令威廉·比特里希将军。下午一点三十分，他首先接到报告说敌空降部队正在阿纳姆附近着陆。他立刻通知第九装甲师的瓦尔特·哈策中校戒备，并命令他对阿纳姆和奥斯特贝克方向进行侦察。同时，他命令第十装甲师向奈梅根前进，“占领，据守，或者保卫这座奈梅根大桥”。蒙哥马利所根本不予考虑的德国装甲部队，现在投入行动了。

不祥的迟误

在荷兰-比利时边界上，从默斯-埃斯考特运河附近的一家大工厂平坦的屋顶上，英国第三十军团司令布赖恩·霍罗克斯注视着最后的庞大空降滑翔机编队飞越他待命出发的坦克部队。判明空降部队的攻击已经开始，霍罗克斯下令“菜园部队”发起进攻。下午两点一刻，一阵轰鸣，约有三百五十门大炮一齐开火。

一吨又一吨的炮弹撕裂着前面敌人的阵地。纵一英里，深五英里，炮火的飓风使得开往攻击线的爱尔兰禁卫军坦克下面的大地抖动。在最前面坦克群的后面，几百辆坦克和装甲车也从停车场所开始出动。

坦克群以每小时八英里的速度隆隆地、铿铿锵锵地在公路上前进。大炮的弹幕严格地和装甲部队保持同样速度慢慢地向前延伸。坦克手们可以看见炮弹仅仅在他们前面一百公尺的地方爆炸。

在领头的坦克群后面，是乔·范德勒中校的敞篷装甲巡逻车。他站在车上，既可以看见前方，也可以看见后方。他回忆说：“轰鸣声是难以想象的，但一切都按计划在进行。”接着，突然间，景象大变。据他回忆：“德国佬真的开始向我们猛烈开火了。”

隐藏在公路两侧严密的隐蔽处所和加强的阵地上的德国炮手一直等到掩护炮火从他们那里延伸过去，让最前面的几辆坦克开过去，然后他们开火。在两分钟内，就击毁了九辆坦克。这些坦克起火燃烧，不能行动，零零落落地停在半英里长的公路上。

突击还没有真正开始以前就停下来，从后面开上来的坦克

无法前进。即使可以绕过燃烧的坦克，但隐藏的德国炮手也会把它们干掉。为了继续前进，范德勒召来发射火箭的台风式飞机在头上盘旋。他回忆说：“有一架飞机就在我的头顶上被炸得粉碎。实在是很难想象——大炮的射击，飞机的轰鸣，战士的叫喊和咒骂。在所有这一切震耳的嘈杂声中，师部在询问战况。我的助手刚刚抓起微音送话器就说：‘请你自己听听吧。’”

在一架一架驱逐机猛扑下来时，范德勒派出一辆装甲推土机把公路上燃烧着的坦克推开。然后步兵和两架装备布朗式轻机枪的运输机一同采取行动来肃清树林里的敌人。英国步兵开始把隐蔽在战壕里的敌人挖出来。爱尔兰禁卫军没有对敌人表示怜悯。俘虏们在刺刀下跑步前进。有一个德国俘虏企图逃走。他刚动脑筋就被打死了。

在指挥所里，霍罗克斯将军接到报告说，德国部队已经在侧翼运动。德国人顽强的抵抗远远超过意料之外。

霍罗克斯将军曾指望他的先头坦克部队“在两三个小时内挺进十三英里，到达埃因候温”。但是宝贵的时间已经丧失了，爱尔兰禁卫军在黄昏前后，大约只能前进七英里，到达法尔肯斯瓦尔德。“菜园行动”早已不祥地落在作战计划的后面。

停止前进

拉思伯里准将的第一伞兵旅正向阿纳姆前进。按照作战计划，要求这个旅的三个营各自从不同的方向到阿纳姆会师，主要目标交给弗罗斯特上校的第二营。他们奉命沿着通向下来因河北岸附近的二号公路，去占领这座最重要的公路大桥。在路上，他们还要在这座公路大桥十字路口以西占领铁路桥和浮桥。由菲奇中校指挥的第三营要从北面接近大桥，增援弗罗斯特。这两

个营一旦成功地发起攻击，多比中校的第一营就要沿最北面的公路推进，占领城北高地。

所有这三条路线的进军，都受到兴高采烈的荷兰人群的欢迎。

胜利的进军突然停了下来。赫里·卡拉汉军士长回忆说，半路上“一切都来得这么突然。一会儿之前，我们还是平平稳稳地向阿纳姆进军；一会儿以后，我们都分散到沟渠里。敌人的阻击手向我们开火，三名士兵倒在路上了。”很多人回想起德国佬第一次严重的抵抗是在我们进军一小时后开始的，约在下午四点半钟。三个营中的两个营（北路的多比营，中路的菲奇营）都受到敌人的猛烈袭击。多比的第一营进抵沃尔夫赫泽时，部队几乎完全停止了前进。

现在一切都要取决于弗罗斯特的第二营了。第二营正在稳步地沿着下来因河公路前进，这是德国人基本上没有加以考虑的第二条公路。

赫赫战功

虽然弗罗斯特的第二营有几次曾短暂地受到敌人炮火的阻拦，但他还是坚决地推进到第一个目标——稍稍位于奥斯特贝克东南的下来因河上的铁路大桥。按预定计划，维克托·多弗少校的第三连离开第二营朝来因河进发。在他们接近这座铁路大桥时，看上去桥上空无一人，没有设防。彼得·巴里中尉的一排人奉命要越过大桥。在巴里的一排人进入离大桥不到三百码时，他看见“一个德国佬从对岸跑上桥来。这人跑到大桥中间，跪下去，开始某种动作。我下令第一班开火，第二班冲上去”。

巴里回忆说，他们“冲上大桥，接着开始全速前进。骤然间，

轰然一声爆炸，铁路大桥在我们面前被炸毁了。”三座桥梁之一完蛋了。

更沮丧的事情还在后头。当他们到达浮桥时，发现浮桥中间那部分已经被拆除。在不到一英里之外，最重要的公路大桥的钢筋混凝土大桥映衬着落日的余晖现出黑色的轮廓。第二营的先头部队在接近公路大桥时，一连排长罗宾·弗拉斯托中尉对大桥的“很难想象的高度”大吃一惊。弗拉斯托看到“大桥两头的碉堡，甚至在被丢弃的气氛中看上去也怵目惊心”。在黑夜中，一连迅速占领桥北巨大支座下面的据点。从桥上传来隆隆的车辆声。

晚上刚敲过八点，弗罗斯特上校和营部到达。他立即命令一连进入大桥。当部队开始采取行动穿过大桥时，德国人复活了。部队受到北岸碉堡的炮火和南岸唯一的装甲车炮火的扫射。一排在麦凯上尉的携带喷火器的工兵支援下，开始穿过最上面的一层建筑物，建筑物的屋顶和它的最高一层楼同大桥坡面高度相仿佛。与此同时，弗拉斯托中尉的一排人正在艰难地穿过地下室和地窖。他们在适当位置向碉堡进攻。

喷火器开始行动时，弗罗斯特回忆说：“一片鬼哭狼嚎。天空通红，机枪声、连续爆炸声、燃烧弹爆炸声，炮声隆隆，交织一片。附近一幢木质建筑物卷进一片烈焰之中，还有痛苦和恐惧的尖叫声。”

突然间，这场短暂野蛮的战争过去了。碉堡枪声沉寂下来，弗罗斯特透过火光看见德国士兵蹒跚踌躇地向他的部属走过来。一连成功地肃清了桥北，北岸现在已被占领了。但在这大火和弹药的连续爆炸中，要再冲过大桥占领南面桥头就等于自杀。在半小时前，弗罗斯特原来是可以成功的。但现在一群党卫军装甲师的掷弹兵已经占有了南岸的据点。这天晚上，弗罗

斯特除了守卫桥北防止敌人进攻外，就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好干了。和下属军官们磋商以后，弗罗斯特认为，现在第一营和第三营都显然受阻。通讯联络中断，不可能通知目前的变化。但是，如果这两个营在天黑前不能到达阿纳姆，德国人就可能赢得宝贵的必要时间来封锁位于弗罗斯特和这个师的其余部队之间的地带。

但是阿纳姆大桥的北头是在弗罗斯特手里，他和他的临危不惧的部队，并不打算放弃这个桥头堡。

德军受挫

从柏林到西线，德国统帅部被盟军的突然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只有在阿纳姆（英国第一伞兵师几乎就空降在比特里希将军两个装甲师的头顶上）的反应，既强烈又迅速。在其他地方，被弄得又迷惑又慌乱的司令官都极力想弄清楚九月十七日怵目惊心的事件是否真的是对第三帝国入侵的开端。

在格尔德·冯·伦斯德元帅设于可布林斯的总部里，这位元帅的反应是目瞪口呆。执拗的、贵族气派的伦斯德对于这次进攻的性质倒并不太吃惊，使他吃惊的是，据他推测，指挥这次进攻的一定是这个人——蒙哥马利。伦斯德很久就确信，造成真正危险的是向萨尔河推进的巴顿和美国第三军。为了应付这种威胁，他已经把精锐部队投入击退巴顿快速坦克部队的进攻。现在，德国卓有声誉的陆军已经暂时失去了优势。他根本没有想到艾森豪威尔的主要进攻会由蒙哥马利来指挥，他总认为蒙哥马利“过分小心谨慎，生性鲠直，不乱来”。

在夜间，不可能估计盟军空降在荷兰部队的兵力，但伦斯德相信还有后续空降部队。他在总部发出命令，调动面对亚琛美

军的部队。这种调动是危险的，但却是必要的。这些部队必须立即向北出发，他们完成调防的任务至少需要四十八小时。他还进一步发出命令，要防御德国西北部边境，并要求一切可以动用的装甲部队和高射炮部队进入平静的死气沉沉的荷兰。他认为，目前在荷兰潜伏着即将降临于第三帝国的危险。

当参谋部车子载着比特里希将军从他在多廷切姆的总部到达阿纳姆昏暗的街道时，已是深夜了。他决定亲自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阿纳姆城里巡视时，大火仍在燃烧，满街瓦砾，但他仍然弄不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回到总部，他得悉阿纳姆大桥已被英国伞兵部队占领。他狂怒起来。在这以前，他对哈策所下达的特别命令就是要坚守大桥。

载着海因茨·哈梅尔少将的高速汽车从柏林接近阿纳姆时，城内大火映得满天通红。经过长途旅程后，哈梅尔又疲倦又焦虑。到达吕尔洛党卫军第十装甲师师部，才知道他的指挥所现位于阿纳姆东北约三英里的费尔普。在指挥所里，他发现他的参谋长面色疲惫。“谢谢老天爷，你可回来啦！”参谋长说。他马上简要地向哈梅尔汇报了一天以来所发生的情况，以及收到了比特里希将军的命令。哈梅尔回忆说：“我被惊得发楞，一切都似乎既混乱又捉摸不定。我非常疲倦，但局势是如此严重，我打电话给我的司令官比特里希，告诉他我马上就去看他。”

哈梅尔被引进来后，比特里希立刻开始在地图上勾画出目前局势的轮廓，他对哈梅尔说：“英国伞兵部队已经在阿纳姆以西这儿着陆，我们还不清楚敌人的实际兵力或者意图。”兵团司令指着奈梅根、埃因候温说：“美国空降部队已经在这两个地区取得了立足点。蒙哥马利部队是从边境向北进攻。我的看法是，他们的目标是占领几座大桥。一旦占领这几座大桥，蒙哥马

利就能够长驱直入荷兰心脏，从而进军鲁尔。”

比特里希摇摇手，添上一句，“莫德尔不同意。他相信敌人后续伞兵部队将在来因河以北，在阿纳姆东西两面降落，然后进军鲁尔。”^①

比特里希继续进行解释，哈策的党卫军第九装甲师已奉命肃清阿纳姆西北两个方向的英军。党卫军第十装甲师负责阿纳姆以东和奈梅根以南的全部军事行动。他还用手指戳戳地图，告诉哈梅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奈梅根大桥。阿纳姆大桥以及由阿纳姆一直到奈梅根的以南地区都由你负责。”

哈梅尔一面听着，一面吃惊地感到，阿纳姆大桥在英军手里，他的装甲部队就无法迅速越过下来因河到奈梅根去。他的整个装甲师将不得不从阿纳姆东南约八英里潘纳尔登村的一个渡口渡过下来因河。

离开比特里希总部时，哈梅尔问他的司令官：“为什么不在不太晚以前炸掉奈梅根大桥？”比特里希的声调是挖苦的：“莫德尔断然拒绝考虑这个主张。我们也许还需要这座大桥进行反攻。”

哈梅尔吃惊地瞪着眼。

“拿什么去反攻？”他问。

哈梅尔在黑夜中动身回潘纳尔登。他的装甲部队早已开始向渡口前进，一路上部队和车辆拥塞，而在潘纳尔登的车辆更是拥挤不堪。根据他部下一名军官的意见，如果这种缓慢的、运转不灵的摆渡不能加快，部队在九月二十四日以前，不大可能在阿纳姆到奈梅根地区采取行动。

^① 事实上，标明了空降区、目标和进攻路线“菜园行动”计划的详细纲要，已经落入德军手中。这份计划由于战争关系耽搁了几个小时才送给莫德尔。等送到时，莫德尔起初不相信。

哈梅尔知道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他将不得不重新夺回阿纳姆大桥，打开通向奈梅根的通道。当“菜园行动”的第一天结束时，德国人的全部挫折现在都集中到一个顽强的人——在阿纳姆大桥的弗罗斯特的身上。

大桥上的装甲车！

争夺阿纳姆大桥之战打了一个通宵。弗罗斯特部队有两次企图冲到桥南，每次都被击退。接着德国装甲车企图从桥上猛冲过去。弗罗斯特的士兵用喷火器把车辆烧掉。装甲部队的掷弹兵在熊熊的烈焰中被燃烧着，尖叫着，从一百英尺高的桥上掉进下面的来因河。

整个夜晚，英国第一营和第三营，三三两两设法通过哈策中校的防御圈，从北面和西面接近大桥。到十八日拂晓，弗罗斯特估计已经有六七百人到达北岸引桥。但给他带来更多部队的同时，也给敌人带来越来越多的机械化部队，因为哈梅尔装甲部队已经进城，并占领了据点。

甚至德国装甲部队也发现阿纳姆是个既危险又可怕的地方。阿纳姆城自豪而悲伤的老百姓，把朋友和仇敌的尸体同样地横在大街上，堆成五、六英尺高的尸体路障来阻止德国坦克接近弗罗斯特的阵地。

与此同时，在阿纳姆西郊，当英国第一营和第三营主力继续向阿纳姆大桥奋战前进时，一度曾是整洁的公园和干净的街道，现在被打得弹痕累累、满目疮痍。鹅卵石的街道上布满碎玻璃、瓦砾和栎树的断枝碎干。*

现在已经打到离阿纳姆大桥只有两英里的这场奇特的、殊死的战斗，似乎既没有计划，又没有策略。如同一切巷战一样，

它已变成大规模的、残酷的、在纵横交错狭窄人行道上的白刃战了。

刚好在上午九点三十分，唐·伦布下士在靠近大桥的屋顶据点中兴奋地喊道：“坦克！三十军团的坦克！”在附近的营部，弗罗斯特上校听见了他的观察员的喊叫。象伦布那样，弗罗斯特也感到片刻使人陶醉的振奋。查尔斯·斯托维伊中士咚咚地跑到楼上伦布的了望哨，向仍旧从南面通道升起的烟火中望去，看见了伦布所发现的坦克纵队。他的反应是敏捷的。赶紧跑下楼梯，这位前敦刻尔克身经百战的士兵大叫起来：“德国的！大桥上的装甲车！”

保罗·格拉布纳上尉突击队的先头部队以最高速度向大桥上冲过来。德国装甲车驾驶员以高超的技术，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转，不仅避开了冒着烟的、阻塞大桥的坦克残骸，而且径直穿过英国士兵在黑夜埋设的地雷区。格拉布纳领头的五辆装甲车中只有一辆触发地雷；这辆装甲车只受了轻伤，继续向前冲。

这种出其不意的突击，把英国士兵搞得目瞪口呆。但他们迅速清醒过来。从胸墙、屋顶、窗口和狭长的战壕里，把一切能用上的武器，从机枪到手榴弹，万弹齐发。工兵罗纳尔德·埃默里把桥上第一辆半履带车的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都打死了。当第二辆半履带车来到看得见的地方，埃默里又开枪把驾驶员打死了。这辆半履带车刚刚冲上大桥坡面就停下了。车上剩下的六个德国士兵在弃车逃走时，也先后被击毙。又有两辆半履带车慢慢向桥上驶来，但突然一阵混乱打乱了德国人的进攻。第三辆半履带车的驾驶员负伤。他惊慌失措，把车子掉过头来，向后面一辆半履带车猛撞上去。现在这两部半履带车死死地纠缠

在一起，横在路当中，有一辆半履带车起火燃烧。德国人顽强地从后面抢上来，想打开一条出路。他们加快速度，疯狂地想到达北岸，它们相互猛撞，冲进不断增加的、由炮弹和迫击炮弹所掀起的瓦砾堆里。由于失去控制，有的半履带车撞上大桥坡面的边石，冲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在边石上翻过去，落在下面的街道上。跟在半履带车后面的德国步兵被毫不留情地夺去了生命。除了到达大桥中心以外，无法再前进一步，幸存者拚命跑回南岸，陷入四面八方的苦战，格拉布纳上尉阵亡。

几乎就象是祝捷似的，英军第二营通讯兵突然收到了第三十军团清晰的无线电信号。这支满身污垢、疲惫不堪的部队以为他们所受的艰苦考验差不多快要支持不住了。但现在，毫无疑问，霍罗克斯坦克部队在几小时内就会开到了。

事实并非如此。从比利时边界往北到费格赫尔这条只有二十八英里的走廊，现在是掌握在英美部队的手中。第一〇一空降师异常迅速地沿公路推进了十五英里，占领了重要城镇埃因候温、圣乌登罗德和费格赫尔，占领了十一个渡口中的九个。但在松镇，大桥被德国人炸毁了，霍罗克斯的两万部车辆的大军，在大桥未修复前再也无法前进了。

废墟的海洋

受英国恶劣气候条件的限制，第二天的空降部队一直到下午两点左右才到达。机群是庞大的，甚至使昨天的飞行场面相形见绌。即使地面战斗仍在进行，但百分之九十的伞兵都在预定地区降落。着陆后，他们立刻就被卷入阿纳姆外围僵持的战斗。此外，预定为阿纳姆部队空投的八十七吨军火、食品和补给品，只有十二吨到达英国人手里。主要部分都落到德国人阵地

上去了。

遭受挫折和连续打击的英军第二营，以及那些勇敢的、掉队的、已经到达阿纳姆大桥的人，仍旧坚守阵地，但几小时以来，弗罗斯特的局势一直是危急的，并且正在迅速恶化。

比特里希的士兵占领了阿纳姆的北部；他的部队在阿纳姆大桥把弗罗斯特围困起来，并且成功地阻止了多比和菲奇两个营对弗罗斯特的解围。

师部和阿纳姆大桥弗罗斯特人数少得可怜的部队之间似乎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在阿纳姆城本身，战火硝烟弥漫到了内城。在阿纳姆大桥上，被击毁的车辆残骸突出在混凝土路面的边缘，并且零乱地散布在沿着下来因河的各条街道上。建筑物和庭院被浓烟抹上一层油膜。沿着整个滨河区，数以百计处的大火径自燃烧着。

地窖和地下室挤满了伤员。麻醉药差不多用光了，就连急救绷带药品也几乎用完了。到阿纳姆大桥去的人只带着四十八小时的口粮，现在也差不多吃光了，而且德国人又切断了水源。部队被迫搜寻食物，现在是靠储藏在他们所占领的建筑物地窖里的苹果和不多的生梨维持生命。

午夜左右，弗罗斯特离开他的指挥部前去察看情况。虽然自从早晨敌人装甲部队开始进攻以来，战斗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士气仍然是旺盛的。他对于他的又疲惫又肮脏的部队，感到骄傲。整整一天，他们顽强地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没有一名德国士兵，没有一部德国车辆到达桥北。但战斗已经变成一场持久战，弗罗斯特知道，如果没有增援，他的部队不可能打赢这场战斗。

到九月十九日，经过两天的苦战以后，哈梅尔将军知道，位于阿纳姆大桥的、决不会超过七百人的英国部队已经快到弹尽

粮绝的境地了；哈梅尔也知道，如果以他自己部队的伤亡为例，敌人的伤亡是极其惨重的。虽然英国士兵曾经一度占据了俯瞰大桥的十八处建筑物，但是现在坚守的已经不到十二处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用坦克和大炮的炮火，把英国人所占据的每一处建筑物夷为平地，”哈梅尔说。“但是考虑到他们目前的战斗状况，我觉得，我应该首先要求他们投降。”

英国人的回答是：“见鬼去吧。”

因而，哈梅尔对集合起来的坦克和炮兵司令官们所下达的命令是明确的：“因为英国人躲在洞里不肯出来，我们就用炮弹把他们炸出来。对屋顶下面瞄准，一公尺一公尺，一层楼一层楼地打，直到把每幢大楼炸平。我们干完的时候，除了一堆砖头瓦砾，就什么也不剩了。”

三十一岁的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相信，灾难终于降临到他的第二营的头上了。援军没有能够突破敌人的防线，因而弗罗斯特相信，援军是不会来了。弹药差不多打光了。伤亡是如此惨重，以致每处可用的地下室都挤满了伤员，战斗员已经没有间断地连续打了五十多个小时。

弗罗斯特知道，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猛烈的打击了。在他的周围的防线上，所有的房屋都在燃烧，建筑物倒塌了，阵地正被侵占。但是弗罗斯特并不准备投降。绝望之余，他决心坚守阿纳姆大桥到最后一个人。

夜幕降临时，弗罗斯特看到似乎阿纳姆全城都是一片大火。两座大教堂的塔尖烈焰飞腾，悬在两座漂亮的楼塔中间的十字架衬着浓烟，耸入天际。他注意到，噼噼啪啪木头的燃烧声，建筑物倒塌的奇怪的回声，这一切都似乎是人间地狱。

按照原来的作战计划，弗罗斯特和其他两个下落不明的营将占领阿纳姆大桥，其他的伞兵和滑翔部队将占领荷兰南部的

其他渡口。然后，在一次可能实现直捣柏林的突然袭击中，英国第二军的坦克将隆隆地通过比利时边界的狭窄的走廊。

但是现在，在弗罗斯特的楼上，坐在无线电收发报机前面的信号兵斯坦利·科普利绝望地放弃了发送密码，开始明文拍发。他连续不断地重复着：“快来，第二军，……快来，第二军。”

但是没有回答。

痛苦的决定

现在，在奥斯特贝克郊区哈坦斯廷饭店的师部里，厄克特正在想方设法拯救他的残余部队。粗略地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看出令人绝望的图景。十分简单，这里根本没有前线。无论哪儿，根据刚接到报告所标明的红色箭头，都有敌人的坦克和部队集结；有些敌人的部队看来实际上就在英国部队的背后。

用厄克特的话来说，“阴暗的、命运攸关的九月十九日是个转折点。”百事不利。从英国来的空降增援部队没有及时到达，原因是机场上空气候恶劣；按计划空投的补给物资消失了——除掉落到德国人阵地上的几乎是全部的空投物资以外；试图和弗罗斯特会合的其他两个营受到了敌人的拦截。厄克特残部的经历，说明了可怕的真相。九月十九日通夜，这些营仍然和师部保持联系，报告兵力。所报告的人数虽然既没有说服力，又不精确，但是他们提出了一张严酷的清单：厄克特的一师人已接近于全军覆没了。

作为协调部队，现在只有弗罗斯特的第二营正在作战，但是他并不知道第二营还有多少人。第三营大约还剩五十人，营长阵亡。第一营总共有一百一十人，营长先是负伤，然后被俘。第十一营的兵力下降到一百五十人，南斯塔福德郡的第二营下降到一

百人。这两个营的营长都负伤了。第十营现在还有二百五十人，第一百五十六营据报告有二百七十人。虽然厄克特全师的总人数(包括工兵和后勤部队)还有一些，但是他的进攻部队几乎是全部被歼。而且就连这些部队也都分散成小群小股，又惶惑，又震动，并且常常没有领导。

九月十九日夜，对部队下达命令，撤到奥斯特贝克周围防线；九月二十日清晨，约翰·哈克特准将奉命放弃向阿纳姆大桥的进攻计划。“作出这个决定是痛苦的，”厄克特后来说。“这就意味着放弃在阿纳姆大桥的第二营。”照他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建立一个防卫区，坚守下去，直等到第二军的坦克的到来。

九月二十日上午八时，厄克特有机会和阿纳姆大桥的弗罗斯特和弗雷迪·高夫少校通话。利用一部临时拼凑起来的无线电设备，高夫终于和师部联系上了。自从九月十七日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和厄克特通话。高夫把阿纳姆大桥的局势概略地作了汇报。“士气仍然是旺盛的，”他说，“但是我们什么都用光了。”然后高夫问能不能获得增援。

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我告诉他”，厄克特回忆说，“根据现在的情况，究竟是我朝他们那里靠拢，或者是他们朝我这里接近，还不能肯定。”然后是同弗罗斯特通话，厄克特就他们的杰出的战绩，要他向全体官兵传达他个人的祝贺。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正如荷兰人所预料，英国第二军的坦克从一开始就碰上了麻烦。挖壕固守的德国部队的火力，使蒙哥马利所设想的快速挺进成为不可能。此外，在松镇，德国人炸毁了威廉米纳运河上的大桥。一直到九月十九日，在厄克特进入最困难时期，才搭起一座应急便桥，恢复坦克的前进。这样，他们就落后于作战计划三

十六个小时。

在走廊地带，还没有任何人能够设想，这种宝贵时间的丧失对于最终结局所包含的全部意义——更糟的事情还在后头。在北面三十五英里，瓦尔河上的奈梅根大桥仍然在德国人的手里。

随着坦克隆隆地前进，第一〇一空降师泰勒少将的警卫部队对于他们所取得的进展，有理由感到骄傲。空降以后，抗击了意料不到的敌人的顽强抵抗，美军已经占领并且保持从埃因候温到费格赫尔绵延达十五英里的公路。然后以蒙哥马利所规划的那种迅猛速度挺进，装甲部队长驱直入，道路两旁是旗帜招展的、欢呼的荷兰老百姓，上午八点半，到达格拉弗。他们的坦克部队在这里和加文准将的第八十二空降师会合。

他们迅速前进，当天中午，坦克的先头部队就推进到奈梅根近郊。现在已经越过了生死攸关的走廊地带全程的三分之二。

但是沿着泰勒所占领的十五英里公路沿线，敌人的压力正在增加。敌人显然是以贝斯特为基地，想切断坦克的先头部队。九月十九日下午，泰勒将军终于把整个第五〇二团投入肃清德国人的战斗。出其不意的攻势打垮了敌人。打死敌军三百多人，俘虏一千多人。

在阿纳姆和奈梅根之间最后一道水上障碍是四百公尺宽的瓦尔河。这里有两座大桥，一座是铁路桥，一座是公路桥。在九月十七日只有不多的德国士兵守卫引桥。但是到十九日下午，加文将军估计，和他对抗的是占据有利地形、得到炮兵和装甲车支援的五百多人的党卫军掷弹兵。

加文将军对集合起来的英美指挥官们说，“占领大桥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得从大桥的南北两头同时发起进攻。”

加文的计划是在下游一英里的地方投入一支兵力，乘船抢渡瓦尔河，同时继续攻取南岸的引桥。在坦克炮火的掩护下，在

德国人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以前，就摧毁敌人的北岸阵地。

全面的突然袭击是办不到的。瓦尔河太阔了，运兵船无法逃避敌人的侦察，而且北岸太开阔，部队一旦渡过河，还必须越过二百码的平地。虽然在开始阶段预料有严重的伤亡，但是根据加文的想法，这样做仍然要比单独继续从正面进攻南岸引桥的伤亡要小。

二十日早晨，整装待发的伞兵部队挤在奈梅根铁路大桥下游离渡口不远的地方。整个夜晚，英美士兵都在拓宽通向河边的地面，为的是第三十军团的重炮可以占据火力位置来支援这次进攻。事先安排台风式飞机在H时以前三十分钟在北岸用火箭和机枪低空扫射全部敌人阵地。在地面上，坦克和大炮将进行另外十五分钟的猛烈轰击。然后在坦克施放的烟幕掩护下，由二十七岁的朱利安·库克少校率领下的先头部队将从事最危险的抢渡。

正两点三十分，台风式飞机攻击开始。在头顶上一掠而过，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离开编队对着目标呼啸着俯冲下来，对敌人的阵地倾泻着火箭和机枪炮火。十分钟以后，载着小船的三轮卡车开到，库克的士兵平生第一次看见那种又轻又薄的、可以折迭的绿色小船。

工兵迅速把小船装配起来。小船一装配好，分配上船的伞兵就把装备搬上船，做好冲上对岸的准备。在打到对岸的掩护炮火的轰鸣中，小船集合起来，一声令下“出发！”每个人都抓住船舷的上缘，把船拖下水。

敌人的榴霰弹在这支小小的船队中间爆炸开来。詹姆斯·梅格尔拉斯中尉一排人的一半所搭乘的那只船沉没得无影无踪，无一幸存。在莫法特·伯里斯上尉船的周围，子弹象冰雹一般打过来，最后，驾驶这只船的工兵说，“抓住舵，我受伤了。”在

他向船外跌下去时，他的脚给船舷绊住了，身体就象船舵似的，让船打起转转来，伯里斯不得不把他的尸体丢到河里去。这时又有两名坐在前面的伞兵被打死。

先头部队终于到达北岸。范德勒中校注视着登陆行动，他“看见有一两只船冲上滩头，马上又有三、四只船跟上来”。

向阿纳姆大桥前进

在硝烟、轰鸣和混乱当中，先头部队有些人并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离开滩头的。通讯兵杰克·博默下士带着沉重的装备一个劲儿往前冲。他知道他必须爬上堤坝，然后等待进一步的命令。到达堤坝顶上，他看见到处都是尸体，德国士兵有的是不到十五岁的孩子，有的则是六十岁的老人，在几分钟之前，他们还在屠杀我们，眼下却在求情讨饶，准备投降。对自己所受的折磨感到震动，对朋友的死亡感到愤怒，大家不愿意抓许多俘虏。有些德国士兵立即被就地枪杀。

并不是所有的敌人阵地都被占领，但是现在伞兵们已经进入德国人原来的机枪掩体，掩护后续部队的到来。在第二次渡河时，又有两只船被击沉。仍然处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之下，精疲力尽的工兵用剩下的十一只船，作了五次以上的横渡，把全部美军都送过了血染的瓦尔河。现在压倒一切的问题是速度。在德国人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以前、还没有来得及炸掉大桥以前，库克的士兵必须抢占北岸的桥头堡。

且连在铁路大桥发现德国人的防御炮火是如此猛烈，以致看上去就象是美军的攻势就要停滞不前了。接着在英美部队从南面，以及在奈梅根本身不断增加的压力下，敌人突然开始崩溃。叫卡佩尔上尉大吃一惊的是，敌人开始大规模地越过大桥

撤退，直接进入美国人的火网。美军让他们过来，到达大桥的三分之二距离，然后开火。敌人二百六十多人被打死，很多人受伤，在停止射击以前，大批敌人被俘。对瓦尔河发动进攻不到两小时，德国的第一座大桥陷落了。

现在卡佩尔上尉用无线电通知库克，强烈要求他尽可能迅速地使英国的坦克部队通过大桥。有坦克作为支援，他和伯里斯相信可以拿下主要目标——公路大桥。部队毫不迟疑地继续向前推进。

在微弱的火光下，滚滚的浓烟遮蔽了远处的瓦尔河。在靠近伦特的前沿阵地，从阿纳姆南下而来的哈梅尔将军从双筒望远镜中了望着远方。在他的周围，枪炮不断地进行射击，部队不断地通过乡村撤下来，占据新的阵地。哈梅尔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完全出乎意料，美军在作出大胆地、胜利地越过瓦尔河的行动已经成功。在奈梅根，卡尔·奥伊林上尉曾发来最后一分简要的电报：他被包围，全部兵力只剩下六十人。现在哈梅尔显然知道，前面的几座大桥已经失守。他不知道铁路大桥是不是已经破坏，不过，假如他要炸掉奈梅根公路大桥的话，就得立即动手。

靠近雷管引爆器，站在工兵的旁边，哈梅尔仔细地了望着大桥。开头他看不到什么动静。接着，突然之间，他看见“一辆坦克开到大桥中间，然后第二辆坦克跟上来，开到它的右边，”哈梅尔对工兵说，“准备。”又有两辆坦克遥遥在望，哈梅尔一直等到这几辆坦克到达大桥的正中央，才下命令：“炸掉它！”

这个工兵把引爆器的活塞拉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英国的坦克继续前进。哈梅尔叫了起来，“再来一次，”工兵再一次把引爆器的手柄拉下来。但是哈梅尔所期待的大爆炸仍旧没有发

生。

哈梅尔厉声地对军官们发出命令，要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弄到的反坦克武器和大炮，封锁埃尔斯特和伦特之间的公路，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它们将一直开到阿纳姆。然而，叫他沮丧的是，他得悉铁路大桥仍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那儿。他赶紧跑到附近一个指挥所的无线电台，和他的前进总部取得联系，对他的作战处长说：“向比特里希报告，”哈梅尔说，“敌人已经越过了瓦尔河。”

这时是九月二十日下午七点一刻。距离阿纳姆只有十一英里。

“上帝保佑！”

在阿纳姆大桥，英国部队人数不多的抵抗差不多已经接近尾声了。黎明时分，德国人重新开始令人恐怖的轰击。在早晨的阳光中，那种光秃秃的、百孔千疮的、曾经一度是房屋和办公处的断墙残壁，再次遭到猛烈的炮击。中午前后，这位顽强地同德国人战斗的指挥官负伤了。当弗罗斯特和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碰头时，“轰然一声爆炸，”弗罗斯特被掀了起来，然后面朝下地被抛到几码以外的地方。一枚迫击炮弹差不多就在这两人之间爆炸，两人都奇迹般地没有死，但是弹片撕裂了弗罗斯特的左踝骨和右胫骨。担架兵把两人抬到挤满伤员的地下室里。

下午七点左右，弗罗斯特醒来，气恼地发现他终于睡着了。挤满二百多人的地下室里是酷热的。营卫生队长詹姆斯·洛根医生跪在弗罗斯特身边。“是应该把伤员弄出去的时候了，”洛根说。“我们必须和德国人安排一个停战协定，阁下，”洛根坚持说。“我们不能再等了。”

当英国伤员用惊奇、警惕的眼光注视着德国人的时候，德国人特别友善地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拿出香烟、巧克力、白兰地。英国伤员辛酸地看到绝大部分的供应品都是他们自己的，显然是在空投时落到德国人阵地上让他们拾去的。

但是弗罗斯特顽强的、体格健全的士兵并没有终止抵抗。当最后一名伤员从地下室被弄出来以后，战斗重新开始，激烈程度和一小时以前不相上下。“这是一场恶梦，”高夫说。“不管你转到哪儿，都有德国鬼子，正面、背后、左边、右边。在停战协定当儿，敌人已经设法把大量部队渗透到作战区域。现在德国人实际上占领了每幢房屋。我们确实实是被打垮了。”

德国人知道这场战斗是过去了。现在所剩下来的只是扫清战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英国坦克就在奈梅根大桥上，但是它们过不来。堆积起来的路障得花很多时间才能清除。一直到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才终于清理出一条单行道，于是坦克开始越过奈梅根大桥。

星期四凌晨，当东方透出一线曙光时，高夫以及残存在防线上的分散的士兵，从隐蔽的掩体中冒出来。救兵未到。

在最后时刻的某个短暂瞬间，在阿纳姆大桥附近，有人用无线电发出最后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厄克特的师部没有收到，英国第二军也没有收到，但是在德国党卫军第九装甲师师部里，瓦尔特·哈策中校的监听兵却清清楚楚地收到了，最后两句是，“弹尽粮绝，上帝保佑。”

几乎遥遥在望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上午十点四十分，爱尔兰禁卫军的罗兰·兰顿上尉的第一连奉命冲出新拿下的奈梅根桥头堡向阿纳

姆前进。范德勒中校告诉他，H时将是上午十一点。

上午十一点正，兰顿上尉在他的巡逻车上拿着传声筒大声地说：“出发！出发！出发！无论如何不要停下来！”坦克隆隆地越过伦特邮政局，驶上公路。

爱尔兰禁卫军的坦克平平稳稳地前进。兰顿上尉从他的巡逻车上可以听见坦克先头部队的指挥官托尼·塞缪尔森中尉说，前面的第一辆坦克正在临近埃爾斯特近郊。但是正当爱尔兰禁卫军的坦克大约到达距阿纳姆一半路程时，兰顿突然听见右边轰然一声爆炸。他抬头一看，看见一个坦克的链轮飞上前面的树梢。他立刻知道先头部队的一辆坦克被击中了。在更前面一点的塞缪尔森很快证实了这一点。

坦克纵队突然停了下来。一片混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似乎到处都是喊叫声。

兰顿上尉沿着停下来的装甲部队，来到一个转弯的地方。他看见前面四辆坦克，包括塞缪尔森的坦克在内，全部被击毁，有的正在起火燃烧。敌人的自动火炮炮弹是从埃爾斯特附近左边的树林里打来的。

在范德勒看来，攻势显然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除非有新的步兵到达。直到那时为止，范德勒的坦克部队在高高的、毫无隐蔽的公路上搁浅了。

满目疮痍

奥斯特贝克的厄克特师部，现在变成了战斗的中心。城镇的平静生活秩序已经过去了。这里是一片被蹂躏的、可怕的景象，坑坑洼洼的弹坑，狭长战壕的瘢痕，杂乱的钢铁和木头的碎片，厚厚的红砖粉和灰烬。街道上塞满了烧毁的吉普和各种车

辆、树木、门板、沙袋、家具，甚至还有澡盆和钢琴。在半炸毁的大楼和小屋的后面，在街道的两旁，在变成废墟的花园里，并排地躺着士兵和老百姓的尸体。

在所有防线的周围，打的是一场猛烈的、混淆不清的战斗，攻守双方的车辆和兵力犬牙交错，英国的伞兵常常发现他们所用的武器弹药是从德国人那里缴来的。德国人的坦克却被他们自己的地雷炸掉。德国的士兵驾驶着英国的吉普，并且用缴获本来是空投给英国伞兵的补给物资作为支援。双方的阵地是如此频繁地占领和被占领，以致一时几乎谁也不知道谁占领了旁边的阵地。

在被近距离炮火打得支离破碎的、回荡着爆炸回声的哈坦斯廷饭店里，厄克特并不知道他们同哈策的第九装甲师的对抗还能支持多久。第九装甲师现在又得到汉斯·冯·特陶中将的部队和泽普·克拉夫特少校的装甲掷弹兵部队的增援。

几乎在这同时，在圣乌登罗德的通路上，第三十军团司令霍罗克斯将军、空降部队总司令布朗宁将军、英国第二军军长登普西将军三个人碰头了。霍罗克斯有一个新计划，在德赖尔全面两栖渡过来因河。但是登普西拒绝考虑。“不，”他对霍罗克斯说，“把部队撤出来。”他转身对着布朗宁，“你觉得怎么样？”布朗宁沉默而屈服地点点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六点四十五分，厄克特将军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在阿纳姆的作战计划中曾经约定，援军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到达厄克特将军的防区。布朗宁将军曾指望第一空降师的坚守，最多不超过四天。在前所未有的赫赫战中，他们坚守的天数超过原计划的两倍。对于无畏的斯科特来说，撤退是痛苦的。但是厄克特知道，这是唯一的出路。眼下他的全师不足二千五百人，他无法向部下再提出更高的要求。把英勇的部队撤出阿纳

姆的时候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撤退被命名为“进军柏林”。

撤 退

只有一条出路——越过可怕的四百码宽的来因河到德里尔。作为向导的滑翔机驾驶员将带领部队撤退，有些地方用白布条标明去河边的方向。在来因河边上，滩头勤务队长将用小小的撤退船队运载部队：十四艘动力船，由两连加拿大工兵驾驶，每只船可以搭乘十四人；还有一只上次渡河留下来的小船。

晚上九点正，第三十军团密集炮火的闪光划破了夜空，沿着整个防线周边的炮火，就象是弹雨似的倾泻到德国人的阵地上。四十五分钟以后，厄克特的部队开始撤退。这个星期以来，曾经阻止增援部队和补给物资迅速到达的恶劣气候，现在却帮了大忙；风雨交加，第一空降师的幸存者脸变黑了，装备捆扎了起来，皮靴包上东西以免发出声响，列着队，危险地艰苦跋涉，朝来因河前进。漆黑的夜晚和恶劣的气候，不可能看清前面几英尺的地方。部队组成长长的活的链条，手拉着手，或者紧紧地抓住前面一个人的伪装。

在来因河上，抢渡已经开始。部队一到，滩头勤务队长就尽快让他们上船。德国人虽然还不知道敌人正在撤退，但是透过照明弹，可以看见渡河行动。迫击炮火开始延伸过来。船只被击毁，沉没。挣扎在河里的人们尖声呼救。另一些早已死去的人则随波逐流地飘走了。负伤的人紧紧抓住破船，极力想游到南岸。一个小时之内，撤退的船只有一半被击毁，但是抢渡继续进行。

黎明来临时，撤退的船队差不多完全被击毁了，但是冒着敌人迫击炮、大炮和重机枪的火力，加拿大和英国的工兵继续用剩

下的船只运送兵员渡河。

渡河以后，厄克特将军被护送到奈梅根南郊的一处房子。布朗宁的随从参谋哈里·凯特少校把他们引进一个房间里，并且建议把湿衣服脱下来。高傲的斯科特拒绝了：“我偏偏不脱，让布朗宁以前看见我们是什么样子，现在看见我们还是这个样子。”后来，在分配给他的卧室里，厄克特发觉他久已渴望睡眠，但现在却怎么也睡不着。

要想的事情确实是太多了。第一空降师牺牲惨重。厄克特原来的兵力是一万零五人，现在渡过来因河回来的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三人。经过九天以后，大约有一千二百人阵亡，六千六百四十二人失踪、负伤、或者被俘。以后弄清楚，德国人也受到沉重的打击：伤亡三千三百人，包括一千一百人死亡。

盟军在“菜园行动”中所蒙受总的伤亡，超过了规模浩大的诺曼底登陆。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承认，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诺曼底D日的二十四小时之内，盟军损失人数总共大约为一万人到一万二千人。在“菜园行动”的九天里，包括伞兵部队和地面部队的死亡、负伤和失踪的总人数超过一万七千人。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号、十二月号美国《读者文摘》香港版 余杰译）

美国财团和对苏政策

谷 陵

编者按：本文是根据美国柯·塞尔所著《权力转移》一书以及有关材料译编而成。

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代表垄断资本的一小撮金融寡头控制的。美国私人垄断财团为数不少，目前一般按地区把美国垄断财团划分为三大系统：东部财团，西部、南部财团和中西部财团。

东部财团又称“东部权势集团”，主要包括洛克菲勒、摩根、第一花旗银行、梅隆、杜邦、波士顿等财团。东部财团资格最老，大部分在第二次大战前就已形成，势力强大，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多年来主要由它控制。

西部、南部财团，主要包括美洲银行财团、南加利福尼亚财团、得克萨斯财团、旧金山财团等。它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崛起的财团，是目前美国的第二权势集团。

中西部财团，主要包括克利夫兰财团和芝加哥财团。它们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形成的老财团，但势力较小。

从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起，摩根财团一直是左右美国政局的最大财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八大财团兴起，仍旧以摩根

为首。当时的八大财团是摩根、库恩-洛比、洛克菲勒、梅隆、杜邦、波士顿、芝加哥、克利夫兰等财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洛克菲勒财团由于掌握了石油工业，其经济实力增长的速度极快。到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逐步赶上了摩根财团，于是引起了两大财团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激烈斗争。此外，原来名列八大财团第二位、主要财产是铁路的库恩-洛比财团，在战后由于铁路运输长期不景气，实力大大下降，终于降为洛克菲勒财团的附庸。波士顿财团也一度实力下降，和库恩-洛比财团一样，被挤出八大财团之列，但到了六十年代，波士顿又东山再起，重新进入八大财团的行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财团实力最重要的变化，是西部、南部相继出现了一些由大暴发户组成的新兴财团，和东部的老财团分庭抗礼。首先是在西海岸出现了一批在大战期间发了横财的资本家，其中以凯塞家族最著名。他们组成了美洲银行财团、旧金山财团等新兴财团。以后在南部又出现了格蒂、亨特、理查逊、麦基逊、休斯等新的垄断资本家，组成得克萨斯财团。他们依靠战争经济的刺激、尖端技术的推动以及政府财政开支的喂养，建立了许多庞大的公司和联合企业集团。他们和西部财团一起形成一个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与东部财团相抗衡的新兴财团体系。它们是两大党的保守派在南部、西部活动的各种组织的后台。尼克松、戈德华特、里根的竞选经费大部分就是这些新兴财团提供的。目前，这些暴发户所拥有的大公司已基本上控制了南部、西部的各个经济部门。

新兴财团的崛起

西部、南部财团实力的增长，是和近二、三十年来西部、南部

的经济增长分不开的。

1. 国防工业是新兴财团赖以起家的支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战争经济的刺激,特别是自六十年代起军界、工业界集团的全面勾结,五角大楼军事订货的重点逐步从枪炮、坦克转向导弹、核潜艇,使西部、南部的军事企业迅速膨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军火开支花费在南方十四个半州(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到佛罗里达州)的数目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目前有好几个州,如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田纳西、新墨西哥,军火工业是当地雇用人数最多的工业部门。在南部有好多工业城市,军火工业和宇宙工业所雇用的职工高达当地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洛克希德公司、利顿工业公司、北美-罗克韦尔公司、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休斯飞机公司、波音飞机公司等设立在西部、南部的著名军火公司,每年都列在五角大楼军事订货的最前列。其中有些公司虽为东北部财团所掌握,但和当地财团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十多年来,新兴财团的代表人物,夺取了白宫、五角大楼以及参、众两院有关委员会的关键职位,使军事订货的分配,长期来有利于西部和南部。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已有多年占了订单的头一、二位。

2. 尖端技术工业在西部、南部地区的发展特别突出。

包括宇宙航行、电子计算在内的新兴工业部门,目前的年总产值达四百二十亿美元,相当于汽车制造业产值的三倍,占美国工业产值的首位。这些工业企业主要设置在美国的西部和南部。美国政府现每年提供科技研究发展资金约一百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六十为南部获得。近三十年来,这一地区科技人员队伍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在那里,宇宙航空业产值占全国百分之七十。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是宇宙航空工业的总部。加利福尼

亚州是美国最大的科技中心。亚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是火箭中心。洛杉矶北面的圣克拉拉县是美国新兴工业最密集的地区，拥有八百家科学公司，十五万技术职工，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半导体、激光、电子计算机磁盘的研制和生产的首府，医疗器材、微型电子计算机、磁带公司的总部以及二百个尖端技术工业大亨的家乡。

3. 南方的石油蕴藏对美国经济具有极大影响。

美国南方是石油产区。早在三十年代，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和梅隆的海湾石油公司就在南方经营石油企业。战后石油在美国能源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一九五〇年占百分之五十七，一九七五年上升为百分之七十八。随着石油重要性的递升，美国南方资源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据一九六八年的调查，有三十三南方石油资本家，他们的财富都在七千五百万美元以上。他们在联邦政府“石油枯竭津贴”的资助下，建立了各种类型的石油公司，形成一个同东部国际石油财团相对立的新兴石油集团，他们的代表是格蒂和亨特。

南方新兴石油资本，原来都是东部财团轻视的所谓独立石油公司和油田拥有者等资本较小的企业。据统计，目前仍有六千三百多家，经过二十多年的兼并，也组成了一些较大的石油公司，如洛杉矶的格蒂石油公司、联合石油公司、西方石油公司，得克萨斯州的坦尼科天然气公司，俄克拉何马州的菲利普斯公司等。在一九七四年，它们的销售额和资产额都达到三十亿至五十亿美元。其中发展最快的西方石油公司，在一九七四年同苏修签订了一项承建化肥厂的合同，规定十年内交易额为二百亿美元。它还伙同得克萨斯州巴索天然气公司修建一条从黑海到巴伦支海长达一千五百英里的天然气管道。

4. 农业是南方经济力量的基础，工农业综合企业现正在发

展势头上。

南方本来是美国的重要农业区域。近二十多年来，该地区新兴财团以大量资金用于农业。据美国农业部统计，在一九五〇年，这地区农场的资产为一千三百二十亿美元，一九七五年增为三千五百亿美元。农场利润也从一九五〇年的一百三十七亿美元增为一九七四年的三百二十亿美元。近五年内农产品出口额增加了一点五倍。

南方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同其它经济部门一样，日益走向兼并集中，小型农场为大公司所经营的工农业综合企业和大农场所并吞。一九四五年以来，已经有三百万个中小农场被消灭，有一千六百万人被排挤出农业。

南方的农业虽也有东部财团的大公司插手，但大部分仍为该地区新兴财团所掌握。他们建立了许多庞大的工农业联合企业，如加利福尼亚州的迪乔治奥农产品公司、石竹花奶品公司、台尔蒙水果蔬菜公司、得克萨斯州的联合牛奶生产公司、安德森-克莱顿公司。这些公司的营业额都在五亿美元以上，有的高达十多亿美元。俄克拉何马州的“平安之路”食品公司和佐治亚州伍德拉夫家族的可口可乐公司，营业额都达几十亿美元。此外，一些大联合企业如休斯敦的坦尼科天然气公司兼营农场、化肥生产和实物销售，营业额在五十亿美元以上。亚利桑那州的“灰狗”公司，兼营肉类生产加工，营业额达到三十四亿美元。这些大公司又都依靠农业贷款银行周转资金，所以，美洲银行、洛杉矶的安全太平洋银行和菲尼克斯的峡谷国民银行等大银行往往成为它们的太上皇。

此外，军火、尖端技术、石油、农业的增长，也带动了其它生产事业的发展。近年来，西部、南部的建筑业、纺织业、木材加工业（木材、纸浆）等加速增长。

工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银行金融事业的增长。东部银行一向在美国西部、南部有很大势力，控制也很严。但当地银行经过不断的竞争也兴起来了。它们主要是利用了银行持股公司这样的组织。当地较大的银行，通过持股公司收买了一些小银行，增加了自己的竞争力量，从而在金融市场上能够和东部大得多的银行相抗衡。银行持股公司是在五十年代开始的，到六十年代中期大为风行。目前在美国最大的二十五家银行中，西部、南部只占九家，从比例上看，还是比较少的，但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例如其中的美洲银行已成为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最大银行，洛杉矶的西方银行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州际银行组织。洛杉矶地区目前已成为美国第二金融中心，实力仅次于纽约，远远超过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的银行资产加在一起，已达到纽约全部银行资产的四分之三。

对苏政策分歧

目前，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正发生对苏政策的剧烈争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财团利益不同引起的。以洛克菲勒财团为首的东部财团，大部分主张对苏绥靖，坚持缓和。西部、南部的新兴财团主张对苏强硬。东部其它财团和部分中西部财团由于利害关系，也参加到对苏强硬这一面。

洛克菲勒财团，目前是对苏缓和政策的主要鼓吹者。洛克菲勒财团资金雄厚，在其控制下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和六大石油公司，一九七四年底的资产就达一千三百多亿美元。该财团在国内虽有较大投资，但其主要部门的石油和金融业，遍布全球，海外收益超过国内收益。由于担心它的海外利益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因而目前力主对苏缓和。该财团的海外投资主要不在欧洲

而在亚非拉,因此对于第三世界各国联合抗霸的斗争怕得要死,把所谓“南北之争”(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矛盾,前者大都在北半球,后者很多在南半球)看作对美国的主要威胁,为其推行对苏缓和政策制造理论根据。

东部财团中的一些二流财团的一部分企业和中西部的克利夫兰财团,在国外也有部分利益,但主要投资在国内,集中在民用工业、公用事业和房地产等方面。它们受美国经济危机的打击较大,因而,具有“新孤立主义”倾向,要求美国从国外作更大的收缩,力主减少国防费用,削减国外驻军和援助,把更多款项用于满足国内的需要。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支持洛克菲勒财团推行对苏缓和政策,在对苏妥协方面,有时比洛克菲勒财团走得更远。

西部、南部财团是对苏强硬政策的主要鼓吹者。该财团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依靠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大发横财,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具有暴发户特点。西部、南部财团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兴军火工业、地方石油、尖端技术和农业企业,而且该财团控制的石油公司目前正以亚洲为重点大事向外扩张,因此,该财团力主扩军备战,对苏强硬,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同苏进行激烈争夺。

在东部财团中的第一花旗银行财团,摩根财团的部分企业以及华尔街的一些小财团,他们在新兴军火工业、尖端技术等方面也有巨额投资,和西部、南部财团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也主张对苏强硬。此外,中西部财团中的芝加哥财团,近年来大力发展军火工业、地方石油,支持西部、南部的对苏强硬政策。

希罗多德

(约公元前四九〇至前四三〇年)

关于这位“史学之父”的生平事迹，我们所知甚少。我们除了能从他本人所著的《历史》^①以及其他古典著作中那些偶尔提到他的地方掂拾到一鳞半爪以外，竟没有一件事是知道得很确实的。希罗多德约于公元前四九〇年至前四八〇年间出生在小亚细亚西南角哈利卡纳苏城的一个贵族之家。公元前四五四年，在他的父母之邦发生党派斗争而他的一位叔父（一说是他的堂兄弟）被杀以后，他就被放逐出来了。显然，希罗多德曾一度到过萨摩斯岛，后来辗转来到雅典，据信即定居于此，直到公元前四四四年才离去。那时，他加入了雅典的移民队，到意大利半岛南端去建立条利城殖民地。在公元前四六五至前四四四年这二十年间，希罗多德曾漫游各地，足迹遍于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色雷斯，并且远游到巴比伦以及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之地。公元前四三〇年左右，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②爆发后不久，他在条利城逝世，但也可能是死在雅典的。

① 即《希腊波斯战争史》。——译者

②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所进行的长期战争。始于公元前431年，结束于公元前404年。——译者

在其所著的《希腊波斯战争史》中，希罗多德殚心竭力“要把人类所完成的事业记载下来，永志不忘；以免希腊人以及那些蛮族^①的丰功伟业湮没不彰，失去其应有的光辉。”但远不止此，他还进一步推求“希腊人和那些蛮族结怨的原因，将之载诸史册”。诚如他自己所说，他所依靠的是他亲眼的观察，理智的判断，以及那善于探索事实原委的才能。希罗多德把希波战争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叙述得清清楚楚，文字晓畅可诵，而且大部分是可信的。在其研究希腊方面的战况时，他几乎没有什么文献资料可资参考。在古希腊，历史是以说故事的方式口头相传的。希罗多德本人也一定在雅典和条利城把其所著《历史》中的某些章节向听众们朗诵过。在波斯方面是有不少文献资料的，然而他却不懂波斯文。希波战争期间，希罗多德年事尚幼，未能亲眼目睹那些惊心动魄的事。因此，他就只能从希波战争时期幸存下来的父老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那里搜集一些口碑或活的证据。

在致力于这项艰巨的工作时，他具有敏锐的理解力，经常保持着清醒的怀疑态度，并且从他所熟知的史诗作家、历史家、科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广泛而又深刻的教益。他把那些见证人所提供的说法一一加以估量，并且仔细地加以核对，使之互相参证。他使他的读者们知道：这些口碑传说中所说的事迹，哪些是不容置疑的，哪些是有问题的，哪些是可能发生的，哪些是不可能发生的。他根据他亲身的经历引用了一些事例，说明人种和地理环境的因素对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有影响。诚然，正如库特·封·佛里茨那样令人信服地所指出，希罗多德首先是一位地理学家，后来才成为史学家。凡是它能够去的地方，希罗多德总是亲临那些事实发生的地点，访问当地的居民，来验

^① 希腊人把本族以外的人都叫做“蛮族”。这里所说的“蛮族”，主要是指波斯人。——译者

证那些口头传说是否属实。他在他的著作中采用了一些显然是来自神话或史诗的故事，那并不是因为这些故事有什么历史真实性，而是因为这些故事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从而也就和历史有关联了。他往往不厌其详地说些离开本题的话，因为这些离题话从艺术上说来是允许的（所有的史诗无不充满着离题话），而且从效果上说来是必要的。用他的赞美者之一的的话（这段话曾被约翰·布蕾^①引用过）来说，“希罗多德懂得：如果喋喋不休地专谈一个题目，描述得很冗长，无论如何总会使人生厌的；但如果在适当的地方停顿一下，夹以他语，就会使人觉得妙趣横生。于是，他就想模仿荷马^②，使他的著作显得丰富多采。因此我们读起他的书来，自始至终都觉得津津有味，而且越读越想读。”同样，他吸取史诗的体例，给其所著《历史》中的人物写了许多演说词，使这些人物说出他们在其所处环境下一定会说出来的话。

希罗多德是怀着目的和满腔热忱来写《希腊波斯战争史》的。尽管他是个爱奥尼亚希腊人^③，而且甚至会被说成是“亲近蛮族的”，但希罗多德却坚信：雅典人朝气蓬勃、热爱自由、实行民主制，这便是雅典之所以能独当大任，在击败波斯人的战争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原因（“雅典人是希腊的大救星”）。而由于雅典有这些特点，后来它用雅典帝国的方式来主宰希腊的政事，也是理所当然的。希波战争几乎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公元前五〇〇

① 约翰·布蕾（1861—1927年），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家，著有《希腊史》、《古代希腊史学家》等书。——译者

② 古希腊诗人。相传古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他编纂的。实际上，这两部史诗决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经历了好几百年，由许多民间歌手先后加工，到公元前六世纪中期才编成的。荷马的生卒年代不可考，希罗多德说他生活在公元前九世纪。——译者

③ 希罗多德是出生在小亚细亚西南岸爱奥尼亚城邦的希腊人。——译者

至前四七九年)。希罗多德给我们描述了许多事，其中有居鲁士^①在位时波斯帝国的崛起，那骄横不可一世的克罗伊斯^②的败亡，波斯人先后两次侵入希腊：第一次在公元前四九〇年，大流士^③率军入侵，结果在马拉松战役中被击退；第二次在公元前四八〇年，薛西斯^④率军入侵，初则受阻于温泉隘，最后被击败于萨拉米。在萨拉米海战中，波斯舰队全军覆没，于是希腊得免于受奴役。而希腊的“黄金时代”就开始了。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就是这一系列的大事。他要使之传诸永久，供后代人去思考评论。然而，希罗多德还有一层更具有哲学意味的想法。他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希腊的自由制战胜了波斯的君主专制。因此他竭力美化希腊的历史，特别是美化雅典的历史，歌颂其丰功伟业，用来进行精神教育。希波战争给他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使他得以写成这部史诗般的作品。

不过，希罗多德虽然深受当时文风的影响，却没有被传统势力所束缚。他跳出了前人的窠臼，不是单单讲究文词的华美，不是单凭想象，而是要用希波战争这个主题写出一部比史诗更有价值的东西。他力图理解事实发生的真相，并理解事实之所以发生的原因。而他清楚地认识到：要得到这种理解，靠希腊神话或荷马史诗是不行的。希罗多德兼有学者和诗人这两者之长。在搜集史料、考订史料方面，他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态度谨

① 居鲁士大帝(约公元前600—前529年)，波斯国王。当其在位时(公元前550—前529年)，波斯发展为一个拥有广土众民的帝国。——译者

② 克罗伊斯，吕底亚的末代君主，公元前560—前546年在位。相传是当时最富有的人。公元前546年受波斯侵略，国亡身死。——译者

③ 大流士一世(约公元前558—前486年)，波斯国王，公元前521—前486年在位。——译者

④ 薛西斯一世(约公元前519—前465年)，大流士一世之子，波斯国王，公元前486—前465年在位。——译者

严而且善于存疑；而在纪事抒情方面，他又有一种诗人的情怀。这样，他就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信史”了。希罗多德逐渐地然而却是自觉地背离了荷马和神话诗的那一条思路，他尊重史诗传说但不轻信，他显示了史学的尊严。

（摘译自彼得·盖伊等所编《史学家的业绩》第一卷，
一九七二年纽约版 郭圣铭译）